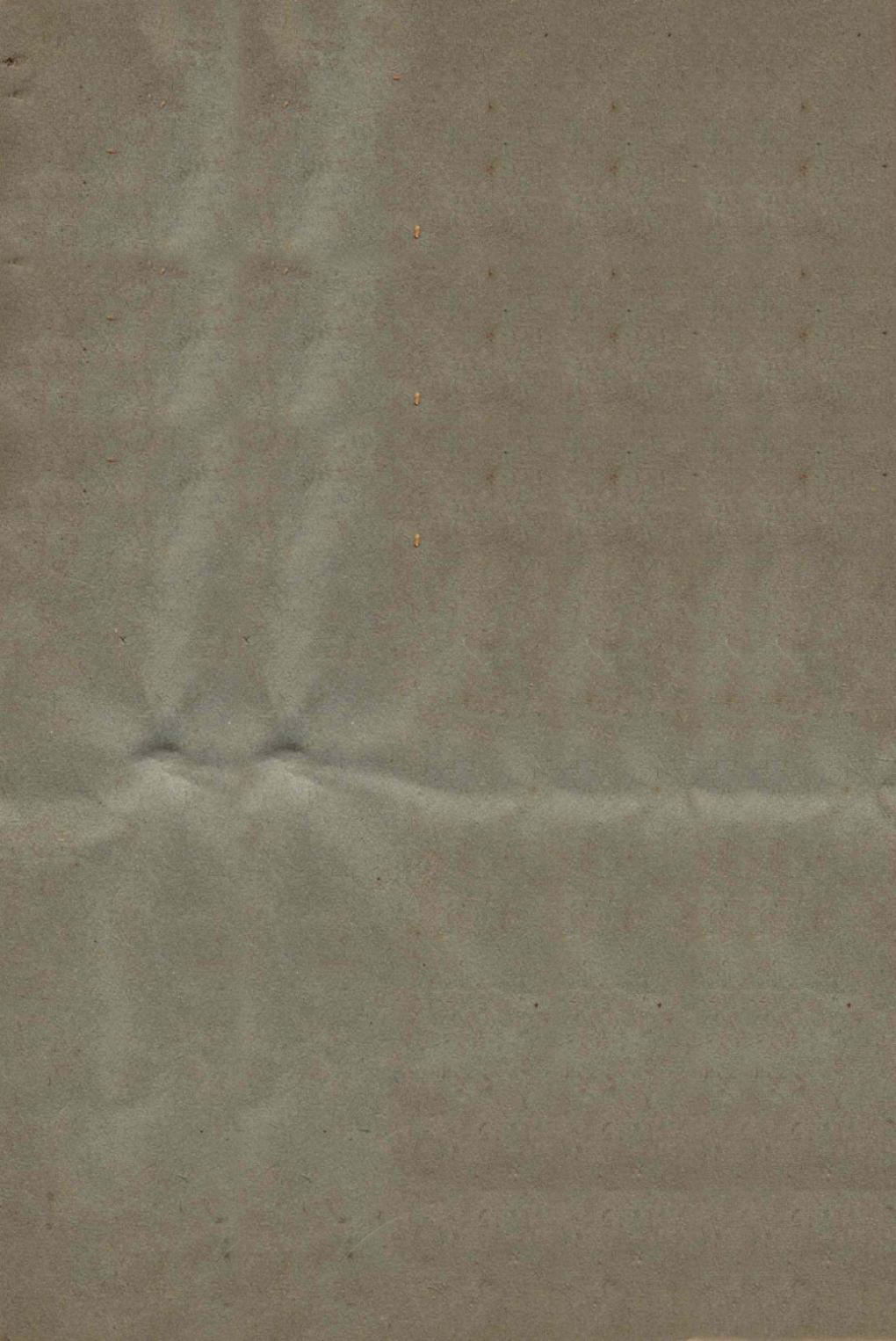


日本研究叢書

查士驥訳

六十年來日本經濟發達史



書叢研究本日

查士驥譯

六十年來日本經濟發達史

上海華通書局發行

■書叢研究本日■

史達發濟經本日來年十六



■實價大洋一元五角■

譯者查士驥

發行者王懷和

印刷者中行印刷所

總發行所

華通書局
上海四馬路望平
街口五二九號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初版

編譯凡例

一、本書的編譯，係根據高橋龜吉氏新著最近日本經濟史（平凡社版）的第四，五及六三編，及周氏所著收於經濟學全集（改造社版）第三十卷卷首的明治大正經濟史而成。關於費解的名詞（例如「飛脚」）的註解，則引用本莊榮治郎的日本經濟史。

二、除第一編與原文略有增減外，第二編起係最近日本經濟史第四編起的直譯。

三、編末附加最近日本經濟史年表，以資參考。

四、高橋氏關於日本經濟史的著作，除上述二種外尚有下列數種：

(一) 明治大正產業發達史。（昭和四年刊）

(二) 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昭和三年刊）

(三) 日本資本主義經濟之研究（大正十三年刊）

(四) 末期之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及其轉換（大正十四年刊）

六十年來日本經濟發達史

(五) 日本經濟的樺壁及無產階級的對策 (大正十五年刊)

(六) 明治大正農村經濟的變遷 (大正十五年刊)

(七) 日本財閥的解剖 (昭和五年刊)

六十年來日本經濟發達史目錄

編譯者序

第一編 明治維新與經濟革命

第一章 明治維新的資本主義革命.....	一
第一節 幕末封建制度下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達及其範圍.....	一
第二節 維新革命的經濟史的意義.....	三
第三節 明治維新的經濟革命.....	五
第四節 維新政府的產業政策.....	一五
第二章 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之確立.....	一七
第一節 由封建的產業保護政策至資本主義的產業保護政策的轉變.....	一七
第二節 交換資本主義經濟的發育.....	一九

第二編 經濟發展時代

第三節 國民經濟的農本主義的凋落.....二十五
第四節 農村經濟的資本主義化.....二六

第一章 中日戰後的經濟發展.....一九	
第一節 中日戰後的企業勃興及其機緣.....二九	
第二節 中日戰後企業的發展及其內容.....三七	
第二章 日俄戰後的產業發展.....四五	
第一節 日俄戰後企業勃興的機緣.....四五	
第二節 日俄戰後企業的勃興及其特色.....五二	
第三節 日俄戰後企業的發展及其內容.....五六	
第三章 歐戰戰時及戰後的產業發展.....六一	
第一節 歐戰戰時及戰後企業勃興的機緣.....六一	

第二節 歐戰戰時及戰後投機的白熱化.....	六七
第三節 歐戰戰時及戰後的企業盛行及其內容.....	七四
第四節 反動之襲來與歐戰戰時及戰後的結尾之產業發達.....	七八

第三編 產業革命的進展

第一章 產業革命的進行.....	八九
第一節 產業革命進行的概觀.....	八九
第二節 供給產業革命以食料的資本的調度.....	九八
第三節 產生產業革命的商品銷路的膨脹.....	一一四
第四節 產業革命的直接動因.....	一二六
第二章 產業革命及其影響.....	一四二
第一節 日本產業革命的特性及其影響.....	一四二
第二節 產業革命與農村經濟的劇變.....	一四六

第三節 勞使問題的產生.....一四九

第四編 經濟的整理改造時代

第一章 歐戰後日本經濟的撞壁.....一六三

第一節 歐戰後日本經濟撞壁事情.....一六三

第二節 日本經濟發展撞壁的三斷面.....一六八

第二章 歐戰後的「財界整理」.....一八八

第一節 「財界整理」的必要及其實況.....一八八

第二節 「財界整理」及其破綻.....一九四

第三節 決價暴落之意義與其整理之犧牲.....二〇五

第三章 產業發達的撞壁及其第一次整理.....二一二

第一節 產業的撞壁與資本家的對策.....二一二

第二節 「產業合理化」運動的產生及其成績與限度.....二一八

第三節 經濟的全面的整理改造

二四五

第四節 經濟的撞壁及階級對立的激烈化

二五六

附錄

最近六十年來日本經濟發達史年表

二七一

六十年來日本經濟發達史

第一章 明治維新的資本主義革命

第一節 幕末封建制度下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達及其範圍

明治維新時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達，從經濟的正規的發達史上說，是很畸形的。它並不先受孕於德川封建經濟胎內，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胎兒，然後此胎兒發育長成，由母體分裂出來，作正則的發展。當時的日本，因欲抵抗來勢愈形猛烈的歐美資本主義的壓迫，覺得爲自衛起見，除把西洋資本主義移植過來外別無可施之策。而此移植政策的得以成功，實因當時日本國內的資本主義已有相當的發育，已築起了能收受泰西資本主義的根底。那麼，日本資本主義是怎樣在幕末封建制度內發達起來，又發達到了怎樣的程度呢？

原來封建制度下的交換經濟的發達，內部由都市經濟的發達，外部因貿易上的刺戟，兩者互為因果，遂把自足自給經濟導入了破壞之道。這是經濟發展的正常的程序。日本德川時代一方由「參觀交代」制度，〔註〕在政治上建設起了前代稀有的大都市大江戶，（即今日之東京）大大促進了交換經濟的發達；然而到了三百年之後尚未能發達至克服及否定封建制度的資本主義經濟者，其原因可說全在於當時的鎖國政策，把對外貿易全部封鎖起來的結果。倘無此鎖國政策，則日本封建制度的變革，從而資本主義制度的實現，也必能依程序地步隨泰西先進國已走過的常道的罷。惟其雖在鎖國封建制度之下，尙能促進交換經濟的發育的最大動因，是所謂參觀交代制度。此制度最大的功勞，便是促進各都市的發達。如江戶、大阪，儼然有商業大都市的風範，由此二大都市的發達，便產生了一種新的階級，即所謂「町人」，蓋即「商人階級」之意。他們漸漸發達長成，乘當時各地藩侯之貧窮，逐一躍握財貨的需給調節，物價的支配等實權；且次第積蓄其財富，經濟的及社會的地位愈形鞏固。

〔註〕「參觀交代制」者，是德川幕府深恐各地諸侯有獨霸行爲，隔年使其至江戶「參觀」一次，以免彼此的隔膜。因各諸侯的朝覲，由各藩領至江戶間的道路均加修理，交通大被促進，都市得以形成。

本來在封建制度之內，身分的階級頗嚴，可說是一種門閥的社會。可是都會生活，却是金錢霸占的社會。到了幕末之際，各藩侯貧困交集，都有向所謂町人屈膝求貸者。此新勢力的發生，不必說是標榜着「階級權力」的封建制度的一大威脅。

對此金力的傍若無人的橫行除袖手傍觀外別無可施之策的封建爲政者，知事實如此，決非用高壓政策所能解決。結果遂屈節自投於貨幣經濟之門下。所以當時各大名，（即藩主）祇有二條路可走。（一）是屈膝向富商求貸，（二）是爲欲掙得金錢，大名自己去做商人。

如上所述，幕末交換經濟的發達的漸次使封建的自給自足主義解體，是很明白的了。但因了鎖國制度，其發達階段尙未能獨行打破封建制度，而具實行經濟革命的實力，被封建的政治的梏桎所束縛，未能成爲積極的革命動因。但在消極方面，却已築起了破壞封建制度的根底了。

第一節 維新革命的經濟史的意義

維新革命的發生，簡單一句話，實不外封建支配階級內部的一種政權爭奪。即在經濟方面與政治方面均受異常的壓迫的下級武士，與被德川幕府成立當初起就疏忽了的「外様大名」等相結

合，結果把幕府推翻了。這是維新革命的直接原因。可是維新革命以後的展開，却又變質轉化爲了資產階級革命。此變質轉化的原因，爲外國資本主義壓迫的外來的強制；國內資本主義經濟的發達，決不是主動要因，這一點，讀者看了上面所述的就可容易明白的罷。假若沒有此「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則即使維新革命革成了，結果還不過是破壞了第一個德川，建設起第二個德川的政權的移動罷。又就算起因於國內的資本主義要素的封建制度的倒壞遲早是不可免避的歷史的必然結果，若僅靠此力量，則實現的時期一定大爲落後，其完成則更需悠久的歲月。總之，幕末時的資本主義經濟雖時時刻刻在加深封建制度的否定，還不過是一種傾向，未曾長成爲能動搖封建制度的基礎的革命勢力。這一點，是維新革命的研究者所當特別注意的。

嘉永六年（一八五三），美國水使提督貝利（Perry）來浦賀，要求通商。以後歐美各國的來日強求通商者續起，乃把日本從鎖國的迷夢中喚醒，覺欲與歐美諸國對抗，舊日的封建制度，無論其在軍事上或經濟上都已不中用了。於是向日揭起「尊王攘夷」的標語而奪得了政權的明治政府，遂不得不改揭起「開國進步」的新招牌。

日本封建制度的倒壞與資本主義化的決定要因，全在於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所以當時即使

沒有維新革命，依然由德川幕府維持政權，起因於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而日本的資本主義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命運。這一點，由幕末時許多資本主義的設施及制度已先後被採用一事上也可容易想見。維新革命，不過把它促進罷了。但若無維新革命，則封建制度的倒壞與資本主義化，必被因習及傳統所妨害而迴避遠道，牽延歲月，也是不必多說的。

第三節 明治維新的經濟革命

(A) 日本經濟革命的特殊性

如上所述，維新的經濟革命，其得力於歐美資本主義的壓迫之部份，較大於所得於國內經濟的資本主義的發達的結果遠甚。但其經濟革命進行的道路，却不是預先把持着資本主義組織的全體系而組織的地把它移植過來的；是被當時的必要所迫，或被一部份的企業所引導，或先實際的要求而發生的。所以日本的資本主義的革命，有下述各點是和歐美的完全異其性質的。

(1) 維新經濟革命的實行者，不是資本家階級及「町人」階級自身，而為當時的支配階級武士階級。

(2) 經濟革命的內容，與其說是出發於日本自己的經濟的要求，無寧是富有以對外的要求（政治的，軍事的以及經濟的）為主眼的傾向。

(3) 當時的新經濟政策，與其說是根據了當時日本的經濟的客觀條件而樹立起來的，無寧是以外國資本主義文物的「輸入移植」為目的的。

我們說「變態」「畸形」，是對與先進國相比較時而說；至於由後進國自身的發展看，則就不能定說它是變態，畸形：因為後進國的發展，常和先進國的不同。

(B) 促進經濟革命的各制度的變革

慶應四年（明治元年）的「王政維新」，不過把封建的霸權歸還了朝廷，於經濟史上無甚重大關係。明治四年的「廢藩置縣」，則使置基於中央集權制度上的統一國家確立，明治政府的基礎得以鞏固。自那時以來，明治政府的社會的經濟的大改革，如決河之勢地次第實行。其重要者約有下列數項。

(一) 武士階級制度的撤廢

武士階級的撤廢，並不是因了明治政府的資本主義化的意識而斷行的。原來維新後貧窮的財

政，決無力量再給與達五十萬戶的武士階級以家祿。加之西洋軍器的輸入與對外武備並中央集權維持的必要兩者，使徵兵令的實施成爲不可免避，因而必然的產生了解除向來的武士的常職的結果。武士階級的撤廢遂在此種事情之下見諸事實。即明治三年，先開使有祿者歸返農商之途，同年十月制定國民皆兵主義的徵兵令，翌年十二月，對於非現任官的普通貴族士族（士族即武士族），許可其作農工商的經營。至六年十二月，對於士族以下凡官祿在百石以下者，分別一時給以六年份或四年份的俸祿。其後經數次的修正，至明治九年八月，依一定的比率，以公債證書代替以前的家祿，其次更許可了公債證書的買賣。至此，武士階級的撤廢，至少在制度上已告一個段落了。但其結果，武士的家祿收入，較維新前約激減三分之一，而斯時米價約高漲二倍，結果，武士階級的貧窮，遂成爲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當時政府所取的對策，約有下列數端。

- 1 以公債爲資金，設立國立銀行。

2 翟荒事業的官營助成。

3 官辦工廠，鐵道的職員職工，均儘量採用武士。

4 於各地設「士族授產場」，授士族以職業。

5 貸與產業創辦上必要的資本。

政府由社會政策的見地，施行了此種士族生產階級化政策。適巧維新後泰西式產業猛興，此種士族不期然地形成了必要的且優秀的新產業軍。

(二) 產生了職業的自由的諸制度的變革

在武士階級制度撤廢的前後，政府又承認了農民的職業之自由。往日因「農業第一」的封建經濟政策，以阻止農村人口的商人化為目的，凡農民的棄農從商從工，固不必說，即欲以商工業的經營為一種副業，也遭禁止。明治政府解除了此種限制，當時占日本人口的大部份的農民，乃得在產業發達上大肆活躍。此外「穢多非人」等名稱（按：「穢多多人」云云，為一種作屠牛及牛皮的販賣的人，因其「穢」，向被禁止轉入他業）也廢去，此階級也得到了職業的自由，至五年更解放從來的一切階級的雇傭關係，嚴禁人身的賣買及與此類似的行為。

(三) 產生了交易自由的諸制度的變革

第一便是「開國」。原來開國政策，發端於貝利的東來，於安政四、五年（一八五七、八年）間，幕府已與美、荷蘭、俄、英、法等五國締結條約，開放了橫濱等商港。但畏於攘夷黨的氣焰

範圍尚甚有限。然自「王政復古」以來，朝議決定放棄鎖國政策而採「對等交際」，開國至此才普遍化了起來。且向來由幕府獨占着外國貿易，祇許得有特許的人營特定的商品的貿易；至此把此等獨占與束縛一切撤廢，認可了一般人的交易自由。

第二，政府又撤廢了舊日的「驛傳制度」。「驛傳制度」，是舊時幕府時代的陸上交通制度；一方因驛傳制度是一種獨占制度，結果把運輸的發達全然封住；他方幕府諸藩主及武士所付的所謂「定貨銀」又極低廉，且在參觀交代等時常徵發多數的人馬，強迫農民作過重的負擔犧牲。明治政府經數次的小改革之後，至四年十一月，便公佈使一切人民使用設立於政府的獎勵之下的「私立陸運公司」的人馬，付相對的貨銀；且解放了道路運輸機關等的傳統的獨占。至此往日的惡弊已連根除去，運輸機關乃俄然進步，成爲了促進產業發達一大工具。

（四）產生了遷居及居住自由的諸制度的變革

明治元年五月，禁止了列藩的設置「關所」，（按：「關」的最初設立，起源於大寶令，無官司的通行證，不能通過；至中世則純係出於徵收關稅之目的，至幕府時代，更爲各藩主一大財源）。二年一月撤廢了各道關門，全國交通始告自由。但其實質的確立，則非待諸「廢藩置縣」不

可。交通的自由和居住的自由同時被確認之後，國民乃得自由流動，往生產條件最善良的地方求職業，給了日本產業發達上一大影響。

（五）土地改革與私有財產權之確認

既撤廢了往日的封建政治，樹立了中央集權政治，稅法的改革遂亦所難免。因為舊日的「物納」稅制，（即以實物納稅，如我國往日的「還糧」，也可說是米納）。在封建的地方權制度之下，因為最合理的方法；但在中央集權之下，則因（1）運輸的損失費，（2）貯藏販賣的困難，（3）價格的變動等缺點，已難維持，故新政府的租稅政策，便取了以「金納」為基本，把向日的紊亂的稅法加以一大整理。其改革的具體方法，為對地價課以一定的租稅。此定額的租稅，當然需要先把向目的把租稅基準置於收穫額習慣廢除，而置之於地價之上。因欲把租稅的標準置於地價之上，又產生了改革以前的土地制度的必要。因為以前的土地制度，是依「米納」本位而成立的；對「米納」雖無甚不便，但耕種，賣買的自由却受其拘束，田地的地價頗受壓迫。故新稅法施行之初，就感到了撤去此種束縛地價的一切制度的必要。維新政府的土地制度改革，起始於五年土地賣買禁止的解除，後經過了地券之發行，等等數次的地租之改正，至十年方告完成。

此土地制度改革在經濟上發生了怎樣的結果呢？一言以蔽之，曰農村經濟的資本主義化。但在階級關係上，則由地主方面說，有下列的各種變化。

(1) 向日的地租納稅者，是耕作人，現在則改爲地主。因之地主得到了政治的保護及特權，換言之，即農業政策已悉數變爲地主本位。

(2) 向來的「米納」，常因年歲之兇豐而有增減，現在使與年歲之兇豐脫離關係，用一定的金錢徵收，因之給與了地主依米價之高低之射制之餘地，起了資本家化的作用。

從佃戶方面說，則有下列的變化：

(1) 耕作權被奪（註：往日地主無權收回耕作權，改與他人）政治上的庇護失去。

(2) 租稅雖已改爲「金納」，佃租依然是「米納」，依然是封建時代的苛斂誅求。所以非但享受不到維新後米價昂騰的利益，實質上佃戶的生活反有低下之勢。

(3) 一方又對工業發達供給了低廉的勞働者，形成了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初期發展的最大原因。

如上所述，維新的土地改革，其根本原因是出發於中央財政上的必要，但却不期然地築起了

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發達上理想的基礎。

(C) 經濟組織自身的變革

(一) 交通機關的革命

使維新的日本打破了三百年來的封建割據的習弊，現實地建設起統一國家而成就了資本主義經濟革命的物質的基礎的，第一是（1）海運（2）通信的發達普及。當時若無此等交通機關之發達，則中央集權恐終難實現，急速的經濟的資本主義化也屬不可能的罷。

先看（1）的海上運輸，則利用洋式船舶的海運革命，形式上是發端於幕末；但當時的洋式船舶，專供軍用，對一般海運的貢獻，尚極有限。至三年一月，明治政府把向舊幕府及各藩主沒收來的洋式船舶借與民間，使設立「回漕會社」，（意即海輪公司）開始東京橫濱與大阪神戶間的定期航路。後來內外汽船漸在日本沿岸航行，海運的改革乃告完成。

（2）的陸上運輸，則政府受內外商人的敷設鐵道的請求的刺戟，自政治上及經濟上的必要，早已決定鐵道官營，借外債以充資本的方針。自五年九月東京橫濱間的鐵道開通以來，遂樹立了全國鐵道網的計劃。但其實現，當然更需要十餘年的歲月；不過此種海上陸上的交通革命，不必

說已大大減低運費，短縮距離，保全運輸，其有資生產力之發達，頗為重大。

其次是（3）的通信：在維新以前，通信的主要機關是所謂「飛腳」（按：飛腳是一種專送信件的人夫，定期往來於江戶大阪之間，往往把書信敷於交通路旁，任收信人自取）。其不完備與不方便，自不必說。新政府於明治四年三月先在東京大阪間官辦新式郵政制度，後漸次擴大至全國。郵費最初是分區制，至六年四月改為現在的均一制，八年開辦匯兌貯金業務，並創外國郵政，確立了近代的郵政制度。又電報的發達，發端於嘉永六年貝利的以莫利師電報機一座的獻於幕府。後維新政府向英國購雇電機及技師，二年八月，先於橫濱燈塔與橫濱地方法院之間試架電報線，專收發官用通信，得告成功。同年十二月又在橫濱東京之間架線，遂收發民用電報。不久全國重要都市與港灣間，架線漸告普及。

（二）貨幣經濟的完成

貨幣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可是維新前日本的經濟，因（1）貨幣制度之紊亂與不統一，及（2）米穀之貨幣代用二原因，貨幣經濟的完成受了一大阻害。

新政府在革命後首先着手於紊亂的幣制的整理。即明治元年四月，決定鑄造劃一純正的新貨

幣，着手大阪造幣局的設立。二年十一月，廢除舊幣制，發布新貨幣法，翌年造幣局竣工，開始新貨幣的鑄造。

米穀的貨幣代用，其基礎本建於封建的稅制及祿制之上。即在維新以前，租稅悉數以「米納」徵收，故對於藩士的俸祿及其他費用，亦以米穀支付。明治政府對米穀代用最重要的改革，為（1）六年七月的地租改正，與（2）八年九年的廢止「華士族平民祿賞典錄」的米穀的稱呼，改為「金祿」。

（三）公司銀行制度的移植

明治政府欲對抗歐美，謀振興近代的殖產興業；但第一就感到困難的，是自國商人資力的不足。當時歐美方面，已依近代的公司組織，大規模經營頗為發達。政府自早就留意及此，果斷地斷行了新式企業組織的移植。明治二年，召集全國的富豪，政府自為發起，使組織匯兌公司；至四年更由財政部發行頒布立會略則（濫譯榮一著）及公司辯，（福地源一郎譯）傾全力於公司組織之獎勵。可是實具今日的公司組織的形態的組織的出現，是六年六月第一國立銀行創立以後之事。且亦僅止於萌芽於銀行事業；在明治十八，九年以前，銀行以外尚未有可道的公司組織。直

至經過了二十年前後的企業勃興期，公司企業才漸漸一般化了起來。

這裏應得注意的，是：歐美的公司組織，大致是以貿易業爲先驅而發達起來的；日本則異此，公司制度是以銀行業爲前鋒，本隊而發達起來的。成爲此種發達的直接動因的，是（1）明治政府因欲整理維新時濫發的不換紙幣，感到設立銀的行必要；（2）九年把華士族的祿制改爲金祿公債後，銀行的設立，大可利用此種公債等等政治的及財政的理由。其結果，不僅大有貢獻於政府的財政整理，更進而給日本產業資金的供給方法一大變革，成爲了產業發達的原動力。

第四節 維新政府的產業政策

維新政府當初的產業政策，一言以蔽之，曰「保護干涉政策」而已。自開國以來，新日本便感到了泰西式產業的移植的必要。照例，此種工作，是應得由商工階級去努力的。但當時他們尙沒有具備足以移植利用泰西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實力；加之因幕末的政治的及經濟的波瀾，大受創傷，且安逸慣於三百年來的傳統生活，頗爲保守。因之政府迫不得已，乃自己起來負泰西式產業移植的責任。樹立了先用「官辦」的形式，由政府去嘗試之衝，使之逐漸普及於民間的計劃。即

自明治元年至十一年之間，各種機械製造工廠，及用西式新法的礦業開創，均在官辦模範工廠之名下成立起來的。同時對於自上述的匯兌公司起以至各種產業，交通等民間殖產事業，或貸以資本，或與以保護金，作半強制式的獎勵。但這不外是當時的派生的形態，政府的根本產業方針，還是官辦主義。

決定此種官辦方針的思想的背景，是封建傳統的餘臭「富國強兵」。所以維新政府的產業保護干涉政策，是帶有不少的封建遺臭的。但此種互相矛盾的兩種思想所以能成功地使當時產業大大發達起來的原因，為此種產業政策的在什麼時候已與德國式的資本家的保護政策合了流。而使此保護干涉政策成為可能的，是當時被大勢所迫的對外的抵抗。

第二章 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之確立

第一節 由封建的產業保護政策至資本主義的產業保護政策的轉變

如上所述，維新初期的產業政策，是取了由封建的干涉保護主義的立場，在官辦模範工廠制度之形式下，由政府自己直接地移植泰西式產業，以之漸次普及於民間的方針的。財政上因此雖作了巨大的犧牲，在開了泰西式產業的普及及發達的起點的一點上，大致可說是成了功的。但至明治十三年末，政府的此種舊產業政策早已難於續行，已非得讓位於新的產業政策不可了。而促進了明治政府的產業政策的變更的，是被不換紙幣的暴落的威脅所逼迫出來的「紙幣整理」。其具體的表現，是十三年十一月的官辦工廠出售方針的決定與十四年四月農商務部的創設。

『凡於農商工之獎勵，官家或率先開設其事業，或指示其實利，從來已用種種方法，藉作誘導；今日事業漸開，已至人人各自奮鬥之時，故應使人民脫離依恃之念，擴張其自奮之氣

象。故今日管理上之要務，在於以法規之公平不偏善為保護，詳察地方之實情，圖公衆之便利，加以獎勵。各府縣宜據此起旨，各自施行」。

這是明治十四年四月農商務部將創立之際發給府縣的諭告。其內容，已表示出明治政府的產業政策已由「保護干涉主義」轉變為「自由放任主義」了。此放任政策，直繼續至廿七八年的中日戰役，現且列舉此時的自由放任主義的特色如下。

(一) 放棄模範官辦工廠主義，改取民間事業的保護助長政策。

(二) 由泰西資本主義制度的直譯的移植中心政策，改變至適合日本的經濟情況的現實的資本主義化政策。

這裏應注意的，是當時的所謂自由放任政策，名雖曰「自由放任」主義，實在呢，在財政的理由上，與政府本來的產業保護助長政策或許有多少程度之差。也要不外是形式上所起的變化。原來政府的直轄的產業固然沒有了，政府依然在下述各種形態上給各種產業以不少的保護。

1. 與汽船公司以莫大的補助金。(三菱，共同運輸及兩者合併後的日本郵船等)。

2. 對於日本鐵道，山陽鐵道，及九州鐵道等公司，保護其紅利率，且與以國有土地無償提供

等特別庇護。

3. 把已費巨大的資本的，乃至前途有望的官辦工廠，造船所，礦山，煤山等和棄物一般的售與「政商」。

4. 為圖商人的外國貿易的發達起見，政府利用正金銀行或其他方法，給與不少的保護。

5. 把鐵道，交易所等利權的獨占給與政商，助長其發達。

總之，從保護助長的觀點上看，則政府的產業政策已由向日的封建的方法轉化為資本主義的方法了，兩者之差，如此而已。

第二節 交換資本主義經濟的發育

先進國的資本主義的發達，常在生產部門先有前驅的發達，然後漸次及於交換部門。但後進國則不然，交換部門的資本主義化的占先導的地位，無寧是常道。因後進國的資本主義化，常因與先進國的接觸而得促進，所以常先在於資本主義化的速成上較為容易的流通行程或交換部門內起資本主義的變化。試觀日本的產業，則大致至中日戰役為止，是以交換部門的資本主義化為正

流的，若農業（第四節詳述）等生產部門的資本主義化，在那時不過是傍流。此期間（資本主義經濟發達的準備期）內交換部門的資本主義發達的中心，是金融及運輸兩者；因了所謂「商權收回」運動，開了由國人握外國貿易權的端緒，在明治商業史上，這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A）金融制度的發達

維新以來政府所採的過度的歐化政策，在短期間內產生了巨額的物質的消費，且此消費，遠超過了當時日本的經濟實力。此破綻，於十一年至十四年間的不換紙幣暴落的一形式上暴露了出來。至此，如何整理此不換紙幣的暴落，遂成爲政府的當面問題。上述明治政府的產業政策的「方向轉換」，也是直接以此不換紙幣整理爲目的的財政緊縮爲動機的。此時政府所採的方法，要不外強制官民雙方節儉省約，努力於新事業的經營，藉以積蓄正貨，使不換紙幣能有變爲兌換紙幣之一日，藉能作所期的整理。其實行方法，對官則斷行財政緊縮之消極政策，同時改正稅制，增加歲入；對民則利用依通貨的收縮及物價之下落，使引起不況之年歲，藉以抑止消費的資本主義機能。但此政策的實現，却需要巨大的犧牲。自明治十四年至十八年間的日本經濟界，備嘗苦痛，莫可言狀。斯時一方爲紙幣整理的積極方法，一方爲兌換制度的樹立準備起見，於十五年六

月公布日本銀行條例，同年十月遂見日本銀行之設立。

用了如此方法，紙幣的整理着着進行，明治十四年的國庫正貨準備僅不過一千二百七十萬圓，至十八年末增至四千二百三十萬圓弱；反之，同時期的政府紙幣，則由一億一千九百萬圓減少至八千八百三十萬圓。所以紙幣的價格漸次回復，於十四年曾慘跌至一角九分的，至十七年回復至九角二分，銀紙之差殆已消滅。以十九年一月一日的兌現開始為最後，由維新以來政府所採取的急激的資本主義化政策所引起的財政的破綻才完全修復。

總之，在十四年以後，國內利用國立銀行紙幣及政府紙幣的活用的資金的動員餘地，已告枯渴；及至日本銀行創設，以兌現開始的正貨充實為原動力，設定了七千萬圓（廿三年又擴充至八千五百萬圓）的保證準備發行制度。日本銀行設立之後，資金供給的增加尚不僅止此；當時二百餘的國立銀行及許多私立銀行，均執有所謂銀行業務；但各銀行間缺少連絡，無有無相通之路，且因無「再貼現」(Redeemount)的制度，有阻止生產者的資力的活動等弊病，資金的流通大受阻害，利息便不得不增高起來。可是到十五年日本銀行設立之後，此金融流通上的大障礙已被除去。其最顯著的實例，如明治十年左右一百圓須付二角半乃至三角的高率匯水的，至日本銀行設

立後便飛跌至四分。不僅此也，日本銀行設立的結果，向日存在爲發券銀行的國立銀行的機能，也生加以變更的必要。因之，十六年有國立銀行條例的修正，於是國立銀行便變爲了存款銀行，開了日本銀行界吸收存款的端緒。廿年橫濱正金銀行條例制定，改向日受國立銀行條例適用的正金銀行爲特殊銀行，與以特權，使之確立了對外貿易金融機關的地位。至廿六年銀行條例制定實施；結果，銀行的組織均有一定，其信用受法律上的保證與監督。後各銀行存款增加，業務擴張私立銀行的面目得以一新。

試觀明治廿二年末的金融機關的概勢，則在銀行類別之中，有日銀正金二特殊銀行，一百三十四家的國立銀行，二百五十五家的私立銀行，六百九十八家的與銀行相類似的公司，合計達一千另八十七家，公稱資本總額爲一億一千二百萬圓，已收資本金八千一百餘萬圓。

(B) 交通制度的發達

若視明治十一年至十八年之間爲金融整理時期，則十九年至廿六年之間可稱之曰交通整理時期。自十九年的兌現制實施以來，被紙幣整理所引起的憂鬱的不況空氣，爲之一掃，企業界頓呈活氣。當時的企業，專限於鐵道及紡績。當時乘鐵道熱而計劃起來的鐵道公司，其中計劃得以

實現的，至十九年至廿六年的八年間已有十九家，至廿六年方能營業的九家，再加上日本鐵道公司，共十家。

至廿六年末，既已開通的私鐵路線，爲一千六百六十七哩，對總哩數的一千九百廿四哩，約占十分之七，建設費爲五千二百萬圓。以此與十年前的總哩數二百四十五哩中官辦的約占十分之九相比，奚啻隔世。應特加記明的，是廿二年七月近江的湖東線開通，至此新橋神戶間，即東海道線方告全通。同時運輸的內容，也有變化：向來鐵道的利用專偏於旅客，至此貨物運輸亦漸旺盛。

此期間內除鐵道之外，汽船的發達也頗著大。例如明治十六年至廿六年的十年間，全國汽船只數激增至三百九十艘，登記噸數由四萬五千噸突增至十一萬噸，內地沿岸不必說，朝鮮中國方面，也有活動。其中廿六年十一月起開通的孟買航路，實爲日本遠洋航路的嚆矢。

鐵道汽船的發達，使補助交通，機關的牛馬貨物車，小車的需要激增起來，尤如貨物馬車，十年間由五千輛增至四萬輛。

與運輸機關的發達同時，更有郵政電報等通信機關的普及發達，日本的國民經濟，乃急速地

脫離了自給自足的狀態，具備了加入交換經濟的中心的物質上的條件。即日本資本主義化的基礎工作，已著著進步。

(C)「商權收回」運動及本國商人的外國貿易的發展

原來日本自實行所謂「開國」以來，國際貿易悉被住於居留地（即租界）的外人所獨占，國人自己的貿易商，不過間接與此等外人往來而已。即所謂買辦制度者是。外國商人則在巨大的資不及治外法權的擁護之下，壟斷巨利，極專橫之至。

日本的朝野識者，目擊心傷，乃有收回此輸出入的商權之運動；自明治十三年以來，政府就已利用正金銀行，竭力保護助長「直接輸出入」；但因商業習慣，賣買關係金融，以及航線等均不利於日商，尚未有可道的效果。

可是自明治廿年前後起，風靡於朝野的不平等條約修正運動，和今日的中國一般，極度煽動人心，其餘波乃及於貿易上的外人商權收回。政府當然竭力支持了此運動。在此空氣之下，日本貿易商人與各種不利不便苦戰奮鬥，漸次築起了根底，開了商權收回的端緒。但其完成，當然在中日日俄兩戰役之後。

第三節 國民經濟的農本主義的凋落

自維新以後以至十九年的紙幣整理完成期，日本的工業除生絲織絲業外殆無可道者。但紙幣整理之後，企業突興，生絲之外，如紡績，織物及鑄業等，均乘機而起。若一視由十九年至廿六年之間的工廠工業發展的概狀；則職工人數（除去官業）在十九年為約十一萬三千人，至廿六年激增至卅八萬一千餘人；更由使用蒸氣機關的工廠數看，則由十八年的五十三工廠，至廿六年激增至六百七十五廠，工廠消費的煤量，（官民合計）也由十九年的十四萬六千噸激增至廿六年的一百十八萬八千噸。可是在全體上，則當時的工廠工業尚未脫離工廠手工業時代。例如徵於廿五年的蒸汽機使用工廠，對於全工廠數的二千七百六十七廠，僅占一成八，即不過四百九十三廠，也可明白。

那麼國際貿易關係是怎樣的呢？在中日戰役以前，有若干由明治政府移植輸入的產業，不僅在國內驅逐了舶來品，且已發展至能作為輸出品的地位了。最顯著的為火柴，硫酸，洋紙，汗衫等等，在十一年左右，已有一千圓以上的輸出。廿年後的輸出工業品，則有手套，襪，皮皂，洋

傘等雜貨，均是手工業的產物。因為當時的日本工業，是以低廉豐富的勞動為唯一的武器而出入於國際市場的。

維新以後日本經濟的急急取了資本主義化的道程，且不必說它；在中日戰役以前，其國民經濟在大體上却是農本經濟。可是至十九年以後的企業勃興期，此農本主義已大受威脅。至廿二三年頃，日本經濟的商工立國主義，早已在「棉花羊毛輸入稅廢止」的形式上公然提唱了。因為這運動，不啻以日本的主要農產品棉花農業為犧牲，藉以促進紡織業的發達。其目的的得能貫徹，固在數年後的中日戰役之後，但既有此種運動的勃發，已可證明國民經濟已實踐地由農業立國主義轉向商工立國主義了。

第四節 農村經濟的資本主義化

維新當時的日本人口，其大部份為農民；其經濟生活，悉以「自給自足」為基礎。故日本國民經濟的資本主義化的前途如何，可說是由農村經濟的交換經濟化如何握其決定權的。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為以交換經濟為基本的「商品生產」，故若國民的大部份所營的是自給自足經濟，

則其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國內是不可能的。（祇有輸出是可能的）。

日本農村的交換經濟化，是被

（1）國際上，外國貿易的解放。

（2）國內，地租及其他封建的財政制度的撤廢及運輸機關的發達。

二項促進的。關於（1），則因輸出入貿易解放的結果，生絲，茶，米等農產物輸出得以促進而生產更屬有利後，日本的農業乃集中於上述各物的農作。一方價廉物美的紗布等輸入品滔滔然流入市場，農村的該項自給自足品，逐漸廢棄，他們都向都市去購買，成爲「商品需要」化，其餘賸的勞力，均用於輸出農產品的生產之上。故維新以後日本農村生活的交換經濟化，最早是被輸出入貿易方面促進的。但於明治十年，輸入品的農村壓迫尙祇限於工業的製品，尙未影響及於農產品自身。例如，棉花，白糖，藍，菜種等農產物的生產，在二十年以前尙有增大之傾向。但自二十年左右起，外國的棉花，白糖，人造節料，煤油等之輸入，漸次壓迫上述的日本的原料品產業，雖有政府的各種保護政策，此種原料生產品的生產大爲衰退，農業乃特集中於稻及養蠶，頓時增加了農村的交換經濟的趨勢。

其次是(2)的國內的原因：更細分之，可得(一)六年的地租改正，(二)運輸機關的發達及(三)國內工業的發達等。(一)之地租改正的結果，向日的「糧米」，改為貨幣，於是占全產額的半數的「糧米」，便成為了商品。用資本主義的方法處理。農村經濟，乃因政治的強制，不得不資本主義化起來。可是加由地租改正而來的農村經濟的資本主義化以一大原動力的，是發生於鐵道等運輸機關的發達的運費低廉，距離縮短，運輸安全正確等等。沒有此種改善，則地租雖已改正，農村經濟也不一時就會資本主義化起來的罷。運輸機關的發達，又促進了工業生產品對於農村的供給，且當初專依舶來品的工業品，也因國內生產而能廉價供給，加速了農村的自足自給經濟的解體；一方則供給農民以較為有利的工作，促進了農村勞力的分業。故日本農村的資本主義化，實先為工業的產業革命敷好了國內的康莊大道，而工業的發達，又促進了農村的交換經濟化，兩者互為因果，使實現了資本主義的發達。故這裏所謂農村的資本主義化，專就流通過程而講，並無農村的生產形態的資本主義化之意。至於生產形態的資本主義化，如使用工銀勞動者的農村生產及大農經營等，日本至今尚未有可道的發達。

第一章 中日戰後的經濟發展

第一節 中日戰後的企業勃興及其機緣

(A) 中日戰後企業勃興的中心原動力

近代型態的產業發達的根基，由明治維新以來二十餘年間的官民的努力及經驗，在中日戰役前早已進步至相當程度了。及至受到了明治二十年前後的企業勃興期及二十三年的反動期的洗禮後，近代型態的產業的發達，已完成了它的由試驗期轉入大規模的實行期的準備。

此時中日戰爭（一八九四年六月開戰，翌年和議成立）勃發，結局為日本的「大勝利」。這結果，又從新給與了許多更能刺戟及促進日本產業的發達的好機會。簡言之，即日本依此接受到上述的產業發達上的主要刺戟。

(一) 由戰費所產生的消費的增加及富之資本之集中。

(二) 賠款三億六千萬圓的流入。

(三) 由戰勝得來的「信用」之增加及外資輸入路的開通。

(四) 由於戰勝的帝國主義的膨脹及銷路的擴張。

(五) 戰勝的廣告的效果及海外本國商人需要之增大。

適於斯時前後，世界銀價暴落，給了當時尚為銀貨本位國的日本一個產業勃興的大刺戟。因銀價暴落的結果，在對外關係上就是日本的物價較廉於歐美的金本位國的之意，因之顯著地促進了對外輸出，阻止了輸入，給日本產業，招來了一個大發達的餘地。又從國內方面說，則銀價的暴落，使物價飛漲，一方導建設於銀價高貴之際的鐵道工廠等入於十分有利的位置，一方對資本家的前途預約了一個大利益。以上二事相待相俟，遂大大促進了產業的勃興。

中日戰後的日本經濟，既如上述，以由戰勝得來的各種好影響及銀價暴落的二大原因為原動力，捲起了企業勃興的大漩渦。那麼，以上的二大原因，是依了怎樣的作用，經過了怎樣的經路而成為了企業勃興的原動力的呢？我覺若把其真相歸結至下述各點而觀察於讀者的理解上最為方便的罷。

(一) 資金供給的增加及利息的低下。

(二) 商品需要的增大。

(三) 物價騰貴——利潤的增大。

關於這三個現象各自的詳細，我想在後面另項論述。現在且先把這三現象相互間有怎樣的關係，且其關係給了產業界怎樣綜合的作用的大致情形觀察一下罷。即下揭第一表是數字的表示。

依第一表看，則鐵塊價格在明治廿三年爲四十七辨士又四分之三，至廿六年竟突落至三十五辨士，廿七年至廿九年間爲廿八至三十辨士，至日本金本位實施的明治三十年，竟崩落至廿七辨士十六分九。適於斯時前後，政府因在戰中消費了莫大的物資，及至由戰勝而得到了三億六千萬圓餘的賠款後，乃以之實行大規模的所謂戰後經營，繼續地需要着莫大的物資。至此，日本的物價，也不得不和銀價的下落相比例而暴騰起來了。例如第一表所示的物價指數，由明治廿三年的一二三，廿八年飛漲至一四二，廿九年一五三，三十年一七〇，卅一年一八〇。即資本家此時進了大發橫財的時代。這時日本財界的實力，由以戰費爲根源的信用的膨脹及賠款流入的二方面，告了一大膨脹，在企業勃興上爲必要的資金的財力，豐富地具備着。例如依第一表，則紙幣

〔註〕 日銀即日本銀行。東株即東京株式取引所（即東京股票交易所）自家的股票。（即本所股票）。

至此，企業的投機熱乃猛然而起。最代表的，爲東株（東京股票交易所的股票）的市價。例如依第一表看，則廿三年的最高價一百八十二圓及最低價一百二十三圓至廿八年爆漲爲六百四十二圓，廿九年六百五十八圓。由此已可看到投機熱的爲如何白熱化了之狀貌。又中日戰後的企業勃興的如何哄哄烈烈，由工銀的飛漲的側面也可看到。例如表內的工銀指數，在明治廿三年至廿八年之六年間，繼續着一三〇，但到了廿九年，便飛躍至一六〇，三十年一八五，卅二年二四七。

（B）表現於資金，需要及物價中的企業條件的改良

如上所述，中日戰後企業條件好轉的諸現象，若更歸納之至資金供給的豐富化，商品需要的增大，及物價騰貴的三大要目而觀察於理解上較爲便利。因爲任其產生任何的資本家可大發其財的事情，若資金不足，企業便不能發起；又資金任是如何豐富，若資本家無由掙錢，企業也不會產生。即此一條件的合致與否，是最能簡單地表示企業的勃興與否的尺度。

（一）企業資金的豐富化

中日戰後，企業資金增大的原因，已再三說過，爲因戰費的關係而產生的信用膨脹及賠款的流入，但其他增大企業資金的供給的原因，尚有不少。試列舉其犖犖大者，可如下述。

(一) 戰費約二億圓的散佈。

(二) 賠款約三億六千萬圓的流入。

(三) 外資約一億九千萬圓的輸入。

(四) 日本銀行保證準備發行限制額三千五百萬圓的擴張。

(五) 銀行制度之整理發達。

(六) 公司制度之整理發達。

由以上諸原因，中日戰後之日本財界，得巨大的企業資金之惠，更應了利潤增大的刺戟，得具備了能自由振興企業的財源。

(二) 商品需要的增大

中日及日俄戰爭以降，日本商品需要的增大的事實及其重要的理由，依說明的便利起見，預備在次編第一章第三節產生產業革命的商品販路的膨脹中詳敍，詳情請參看該節，這裏僅止列舉

中日戰後使商品需要增大起來的諸理由。大致中日戰後使商品需要增大起來的諸理由，可歸結爲下列諸點。

(a) 內地需要的增大

(1) 龐大的戰時需要的突發。

(2) 對於由賠款及公債財源產生的巨額的政府的戰後經營的需要。

(3) 根源於後述的民間事業勃興的需要的增大。

(4) 由於上述的資金散佈，民間需要的增加，並戰爭的臨時賜金，以及由其他發生的購買力的增進。

(b) 國外輸出的增大

(1) 藉戰勝得來的帝國主義的發展及銷路的擴大。

(2) 對於戰勝的本國貨幣的廣告作用及需要增加。

(3) 銀價的下落及輸出條件之好轉。

(4) 國外的海運及金融機關，由政府的保護而得到的整理發達。

(5) 和美間的不平等條約修正，對華治外法權之獲得。

由於以上諸原因的商品需要的增大，其中不少部分，是仰賴於輸入品的；但其大部份，不必說是仰求於內地生產品的。

其結果，則一方招得了如後述的發源於資金的流出及固定的資金的不足；他方由商品需給的關係，招來了物價的暴漲，增大已設企業的利潤，終於成爲了使新企業更加勃興起來的刺激。

(三) 物價的騰貴

中戰後的物價騰貴的原因，發生於由上面(乙)項中所述的各種原因產生的需要的增大及已述的銀價暴落的二方面。

不管它起因於那一種，結果的得給與了爲資本家的企業勃興的唯一刺戟的利潤增大，更預約你一個將來，是不必說的。試依日本銀行的調查而觀以明治二十年一月爲一〇〇的物價指數，則明治二十年的一〇二，至廿八年飛躍至一三五，廿九年一四五，其次的二年竟至一六一，一七〇，更三十三年暴騰至一八三。即十年之間，已暴騰了十分之八，其中自廿七年以降的六年中，由一二六至一八三地暴騰了四成餘。由此已不難推想到當時企業的勃興是如何被物價騰貴的。

刺戟所誘掖了罷。

第二節 中日戰後企業的發展及其內容

(A) 中日戰後企業的發展及其中心產業

中日戰後產業的發達，是描出了廿八九年的企業的勃興，三十年及卅一年的反動，三十二年再度之良年，卅三及卅四年第二次反動後的事業界的整理等波瀾而進行的一幅好畫。其中廿八九年的企業熱，十分猛烈。而中日戰後的企業的勃興的爲如何空前絕後，由明治卅五年公司數共八千六百十二之中的七千二百十七即其八成四均於明治廿七年以後設立起來的一事已可說明其大致了。又觀其工廠數，則三十五末的七千八百餘廠之中的約半數，即四千三百廿八廠，都是創立於二十七年以後的。不過這裏所說的「創立」，並不是「工廠」的創立，是事業的創立之意。所以向來從事於家內工業的人至中日戰後的企業勃興期改革之爲工廠工業的人雖多並沒有算入於中日戰後的創立工廠之中。因此之故，與其由工廠數觀察，無寧以由公司數觀察較能簡明地窺知中日戰後的企業勃興之狀。

可是說是中日戰後的機業勃興，其大部份還是計劃於明治廿八年至三十年之間的，以後的產業發達的大部份，其計劃可說着着均能實現。試據當時斯業所調查的，則新於明治廿八年至三十年之間計劃起來的企業，實達十四億六千萬圓之巨額。而為當時的企業勃興的中心產業的，是鐵道，銀行及棉紗紡績三項。其中鐵道實占新企業計劃全體的百分之五八，銀行約百分之一五，殘餘的百分之二六，為各公司其中有不少是棉紗紡績公司。此外諸公司的重要者，如電氣，煤氣，及保險等所謂製造業以外之公司，也復不少；製造業中則除已述的紡績業以外，僅製糖及鑄業稍稍引人注目而已。

(B) 資金的涸絕及企業的整理

欲實現如上之企業計劃，自然需要多額之資本金，而此種資金的大半，或成爲鐵道，或成爲工廠，都已固定起來，因而發生了使國內資金涸竭的作用。例如依當時財政部的調查，則明治廿九年及三十年二年度內的公司企業資本約二億四千萬圓中，其五四%，均屬於固定資本。當時企業的如何使許多的資金固定起來，由此也可窺知了罷。

不僅此也，中日戰後企業的大多數，其鐵道工廠等建設上必要的材料的大部份，都不得不仰

求於輸入。且不僅是民間企業當時的政府，也正如上述，在『戰後經營』之名下，投下巨額的費用，進行其軍備之擴張，製鐵所之創設及其他計劃，其所需材料的不少部份，也仰給於輸入的。結果，輸入突然膨脹，廿九年及至卅一年三年間的輸入超過額，對於當時輸出年額僅在一億六千萬圓內外，實達三億一千三百二十餘萬圓的巨額，更加入至卅三年的二年，則五年內的入超總計竟達四億二千七百七十五萬圓之巨數。（特別輸出入在內）

中日戰後的財界，由資金的固定及輸入超過的二方面，消耗了不少的資金。其結果，當時雖有巨額的賠款的流入，財界已被相當的資金逼迫所襲擊。詳細說，即中日戰後的民間企業及『戰後經營』的政府事業，和當時的財力相較，未免過大，故隨計劃之進行，曝露出了資金不足的破綻。故鐵道工程進行至十分之七，其餘之三成，因無資金調度之途而放置了起來；或工廠雖已成立了，但沒有原料及其他流動資金，不能開工，諸如此類的破綻，層見續出。例如依前財政大臣片岡直溫氏在其著作經濟組織的改革中所說的，則當時大阪的紡績公司十八家，固定資本及缺損合計爲一千四百三十萬二千圓，已收資本及公積金，及公司債合計也不過一千四百〇一萬四千圓，故雖依藉臨時借款及期票等借入了四百七十餘萬，流動資本仍大告缺乏，陷入停止狀態；至

此大坂財界遂面臨一大危機，引起了政府的救濟運動。當時資金缺乏的狀況，由此已可容易窺知了罷。

及至以上的資本不足的傾向漸漸明瞭後，政府乃轉緩乃至中止其財政計劃；又日本銀行則頻頻擡高利息，警告財界，計自廿九年以降至卅一年三月，共作五次的利息抬高，把貼現日利由一分九厘抬高至二分四厘。同時或收回保管於外國的賠款，或輸入外資，或利用勸業銀行等，竭力努力於資金的流通的結果，至三十一年秋季，利息重又下落，至卅二年七月遂跌至一分六厘。但隨了已述的民間企業及政府事業的進行，資金的固定及流出續出，至卅三年，資金又告涸絕，利息又吊高至二分四厘，（這和義和團的影響也有關係）財界乃不得再度把產業計劃收縮至資本所允許的範圍以內。

最後，關於中日戰後企業投機熱的爲如何白熱，如何以如上的資金枯絕爲中心，而投機熱慘起恐慌，則我們不妨一觀當時權利股票市價的和暴風雨一般的暴騰暴落的一端，藉明實情的一般。即在廿九年的企業投機白熱時代，像東洋汽船的連一個小錢也未收過的權利，竟值十五圓，但至三十年初，則已收過六圓半的股票，反而突破額面，暴落至六圓。凡此數項，可算是榮枯盛

衰的最甚者；此外如武相鐵道，保證金五角的權利股票，在廿九年以二十五圓半買賣於市間，但至三十年初，既已收過五圓的，反暴落至十圓。

(C) 中日戰後企業發展的內容

中日戰後的企業勃興，既如上述，是十分猛烈的，但資金的調度却有限制，因之，因了限度的破綻，在三十年及卅三年，財界兩次被反動所擊襲。這是已經說過了。因此之故，當時的企業計劃中，其籌得了資本而終於得成立的，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這原是自古以來投機旺盛時代的通有現象。其中事實上成立於卅一年五月前的，為不及半額的六億六千七百萬圓，其中鐵道公司占三五%，銀行三四%，以上約占全體的七成，其餘的三成，為各種企業公司所分占。

故中日戰後企業勃興的中心，依然是為產業發達的基礎事業的鐵道銀行二業。在其他的產業中，其可數為當時的企業熱的中心的；僅有棉紗紡績廠而已。但即此與鐵道銀行一比，其地位也十分微小。但中日戰後的企業勃興的中心，不妨說是銀行鐵道及棉紗紡績三業。所以依順序講，這裏理應把此三事業的發達的事實加以說明，但為本書的著述的便利起見，銀行事業的發達事實在次編第一章第二節 C 項中敍述，鐵道則在次編第一章第三節 D 項中敍述，此處僅止於關於最後

的棉紗紡織事業的發達加以一瞥。

棉紗紡織事業，在明治二十六年，平均的運用鍾僅不過三十八萬二千鍾左右，但至卅一年，約增至三倍的一百十四萬六千餘鍾，職工人員，在同期間內也約增至三倍，由四十四萬餘人達一百三十三萬餘人。以此與此期以前的發達相比，固不必說，即以之與以後至明治四十年間的發達相比，此期的發達也是可驚的飛躍。

如此紡績事業的長足的發達的結果，遂陷入所謂生產過剩。事實上，中日戰後的紡織事業，竟因之沈淪於慘憺的苦境；但紡織業者或藉政府的保護突破此難關，或以卡推兒(Kartel)之力舉全力於輸出銷路之開拓，紡織事業乃於此築起了培成後日的大發達的國外發展的基礎。以上紡織事業的經緯，即對其他的各種工業的發展，也多少可以適用的。

已反覆說過了，中日戰後的企業勃興，是以鐵道銀行及紡織三業為中心的。但這麼說時，並不是說當時的其他產業全無足以一道的發達。否，此期內工廠工業一般之發達，是頗值得注目的。試根據農商部及財政部的調查而一觀各年末的依產業類別的公司資本金，則在由明治廿七年至三十六年的中日戰後的九年中，公司已收資本的增加額，總計約為六億三千八百圓的巨額，

以此和廿七年末的約二億五千萬圓相比，實為二倍餘之增加。其中水陸運輸公司（以鐵道為主）所增加的約為一億八千圓（和廿七年相比約增三倍），銀行所增加的約為二億七千三百餘萬圓，（與廿七年相較約增二倍六成半），工業公司所增加的約為一億二千六百萬圓，（與廿七年相比約增二倍八成），商業公司（除去銀行）的增加，僅不過五千六百萬圓，農業則祇有二百萬圓。工業公司的已收資本金增加的約一億一千六百萬圓中，屬於紡織公司的約不過二千一百萬圓，故殘餘的約一億圓，是有負於範圍廣大的各種工業及礦業公司的勃發的。試一視其主要產業，則除去了棉紗紡績的約三千五百萬圓外，其他僅有一千萬圓內外的製紙及造船，此外則為造酒四百二十餘萬圓，水泥近四百萬圓，麥酒三百廿萬餘圓的順序，除此以外，都是二百萬圓以下的小產業。

但以上是以公司的資本金為基礎而觀察的，若更從中日戰後的工廠數及其職工數來通覽當時的工業內容時，則卅五年時工廠數，為七千七百四十九家，和廿七年的五千九百八十五家相比，是一千七百六十四家的增加。而增加中的一千〇廿二工廠即約六成，實是屬於染織業的工廠的增加，其中織物工廠的增加，為九百十四家最為明顯。此外，工廠數增加之顯著者（示五十工廠以上的增加的）為捲煙業，印刷裝訂業，窖業，紡織業，金屬器具業，繩絲業及火柴業等。唯產業

之發達，除工廠數之增加外，常依規模的增大而發展，故在中日戰後的近代企業的勃興期內，尤有由此觀點觀察之必要。但不幸當時的工廠統計中，缺少可知明白規模之增大的材料。但雖覺不完全，我們由了上面所述也可大致了解發達於中日戰役後的工業種別大體上為如何之物了罷。

最後，若依使用職工數之大小而概觀卅五年工廠工業中的重要事業，則繅絲業擁有十二萬六千餘人，獨立羣首，次之為紡織業之約七萬九千人，發火物製造業（以火柴為主）之五萬四千人，織物業的五萬三千餘人，船舶車輛業的一萬九千餘人，捲煙業的一萬六千餘人，窯業的一萬三千餘人，印刷裝訂業的一萬人等等，此外均在萬人以下。即以上數者，可說是當時日本的重要工業。且如織物業那樣的重要產業，由工廠工業的側面看起來，是在火柴業以下，故當時工業的多數的尙屬於家內工業，也可窺知的罷。

第二章 日俄戰後的產業發展

第一節 日俄戰後企業勃興的機緣

日俄戰爭（一九〇四年二月——一九〇五年九月）的『勝利』，又如中日戰爭的『勝利』一般，給與了刺戟日本企業的勃興的直接間接的許多新事情。加以由中日戰後承繼下來的產業發達的諸條件，也於此期內顯著地長成了起來。彼此相俟，乃產生了日俄戰後的企業勃興。其內容，和中日戰後的有不少事情是不同的。例如中日戰後企業勃興的中心原動力，在於賠款的流入及銀價的下落。但日俄戰後，却以外資輸入，保護政策及帝國主義的發展三者為中心原動力。以此三大原因為中心，更加上其他大小各種原因，日俄戰後的企業勃興乃得培植了起來。以上依說明的便宜上，把它歸結至（甲）資金關係，（乙）保護政策，（丙）商品銷路的擴大，（丁）產業技能的發達四點而概述之。

(甲) 資金關係

無論在什麼時候，企業的勃興，是以資金的供給豐富為前提的。在日俄戰後，以巨額的外資輸入為中心，依了上述的諸事情，企業勃興乃得產生。

(一) 外資之輸入。

(二) 根基於戰費的信用的膨脹。

(三) 金融制度的發達，

(四) 鐵道國有及收買代價的散佈。

(五) 以產業發達的促進為目的的政府的低利政策。

第一，(一)的外資的輸入，則在中日戰後的企業勃興及為其結果的資金涸絕之時，其必要當然是一般人所承認的。至此朝野乃一致努力於『外資輸入』，但因中日戰後的三國干涉及日俄關係的危機等等不安，引起了外國資本家的警戒，結果在日俄戰爭之前，終無可道的外資的流入。但在日俄戰爭之前，有英日同盟之締結，(一八九七年)且日俄戰爭，也以日本之勝利結局，於茲一切不安都一掃而盡，外資乃源源流入日本。且政府以國家的信用，不時在外國募集公債，更促進

了外資的輸入。明治三十六年末的外資輸入額合官民兩者尚不過一億九千五百萬圓，至四十年末竟達十四億圓，在大正二年，實膨大至十九億六千九百六十八萬餘圓。即激增了十七億七千五百萬圓。當時日本的怎樣依藉了源源的外資之流入而資金的供給得以豐富由此已可窺得了罷。

(二)日俄戰後，也使財界的企業資金增大了不少。因日俄戰費，為十九億八千二百萬圓，其中含有民間資金的減殺及來自增稅及捐助的合計僅不過一億三千八百餘萬圓，其他或藉公債及臨時借款，或依藉剩餘金轉借，其大部分，均含有金融市場的信用膨脹之意，一時乃引起了相當於此額的民間企業資金之膨脹。

惟第一表中的『公債及臨時借款』中，其八億圓是依藉四次的外債募集的，這數目，已算入於前記(一)的外資之輸入中了，故觀察戰費給與財界的信用膨脹的影響時，是應把此數扣去的。但他方由於增稅的一億三千六百萬圓的資金，也由多數國民的懷中取來，使集中於少數的『戰時暴發戶』之手中，這數目，我們應了解其在實質上是營了企業資金增加的作用的。

其次應是述說(三)的金融制度的發達的提高了資金的利用效率，及如何由此產生了企業資金的增大的結果的順序了，但這一點，為本書著述的便利起見，讓至次編第一章第二節C項中論

述，這裏僅概說（四）的鐵道國有的結果使民間企業資金膨脹起來的事情；政府在日俄戰後，以軍事上及民業上的理由，樹立了收買私有鐵道的計劃，通過於卅九年春的議會，因之由明治卅年至四十年間所收買的私有鐵道，實達四億七千九百三十二萬餘圓，此外兼業收買額為二百六十六萬圓，合計竟達四億八千餘萬圓的巨額，其大部份即約四億五千六百萬圓，是以公債支付的，但在日本銀行制度下，若是公債擔保，是能自由出借資金的，故仍能使信用膨脹，企業資金膨大了起來。同樣的事例，是由專賣制度的實施而收買來的捲煙。

關於（五）的政府為產業發達促進起見而有目的地意識的地採取了低利政策的說明，則把前日銀總裁井上準之助氏在其所著戰後我國的經濟及金融中如下所述的引用一節，最為有力罷。

『……例如我尙記憶到，日俄戰爭後關於戰時告借了非常巨額的款項一事，依當時的政府當局者與與金融有關係的人的見解，則欲償還如斯巨額的公債，便非得大大振興日本的產業不可。他們斷然地決定此意見。因而着手了各式各樣的設施，如鐵道國有，便是一例，但到了卅九年的正月，產業却與政府當局的期待相反，更其不振，這是因了Pengonoo條約〔註一〕給人心以非常的打擊，萎靡不振，什麼事業都不振興。至此乃覺日本決不能償還因戰爭而負

擔起來的巨額的公債，承認了有採取何等積極的方針的必要，日本銀行的當局者，乃於卅八年三月減低利息，作為積極方法的一種。但也沒有什麼效果，至五月重又減低利息。……至是年年終，非常的，極端的好景氣【註二】突然而起，這裏說突然，僅是表面上的突然，在看不到的裏面，當然必定早有可發生非常的好景氣的潛勢的，自卅九年年底至四十年，遂出現了非常的極端的好景氣。……

【註一】「景氣」二字，當英語 *The tone of market* 用我國的俗語說，即「年歲」，好景氣即好年歲，不景氣即年歲不佳，近因各種報章雜誌均襲用日本原名，這裏也一任原文。

【註二】Portsmouth 條約係俄國被日本戰敗後，由美國總統羅斯福脫之調停而締結之條約。依此條約，則（1）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之優先權，（2）以旅順大連，長春與旅順間之鐵道，及樺太南部（北緯五十度以南）讓於日本。

同樣在明治四十三年以降，桂內閣為欲把所謂『四釐利息時代』搬至日本而採用的四釐公債借換政策及由此派生出來的各種政策，也復如此。

要之，日俄戰後的財界，在如上的諸種事由之下，被異常的資本金增加所惠顧，招得了滔滔的利息的低下。例如日本銀行的利息，在明治卅八年六月為二分二釐，至四十四年出現一分三釐

的日本金利史上未曾有過的低利息。但中日戰後的企業促進的刺戟，不是利息低下，主要是物價騰貴。可是日俄戰後，物價騰貴無如是甚，僅有利息的低下刺戟着企業，是其特色。例如日俄戰後物價指數的騰貴，最高僅不過一成乃至二成（中日戰後約六成）日本銀行的利息，也由卅八年的平均二分一釐一毫跌至四十三年平均的一分三釐二毫，四十四年的一分三釐五毫，前後共跌三成七。由上所述，我們可以容易地看到日俄戰後的企業勃興及企業發達的如何依存於資金供給之增加（主因為外資之輸入）了罷。

（乙）產業的保護政策

培成日俄戰後之企業勃興及產業發達的第一個原動力，是高標榜着商工立國主義的政府的企業保護政策。但其詳細，為本書著述上的便利起見，讓之於次編第一章第五節論述，這裏僅止於引起讀者對於日俄戰後軍事企業關係，國有事業關係的各種事業因此政策而立即作了長足的進步，及其次在藉明治四十四年之閱程修正的保護主義之下各種輸入品企業的突然勃興二事的注意。

（丙）商品銷路之擴大

日本的商品銷路，在日俄戰後，國內國外均仍能把中日戰後的擴大原因更加開發。即在輸出方面，因日俄勝仗的結果，朝鮮完全獨立，在滿蒙扶植起了特別勢力，其他在東南洋諸國，也有長足的進展。他方，國內需要，則遇到戰時之非常需要，及用上述的莫大的資金來充當的官民的「戰後經營」上必要的大需要，加之因了鐵道的發達及輸出產業的發展等等，國民生活更其成爲交換經濟化，從前自足自給之貨品的商品需要化的傾向，十分盛烈。更發源於戰費的散佈及官民之「戰後經營」的國民購買力之增進等，在政府的保護政策的庇蔭之下，其大部分的商品，遂能仰求於內地產業。但詳情則讓至次編第一章第三節說。

(丁) 產業技能之發達

日俄戰後之企業勃興及產業發達，所負於是時產業技能的發達，即由於明治二十年頃以來的久長的經驗，漸漸發達到了經濟上的「獨人步行」的程度的事實之所，也復不小。例如棉紗紡績事業，此時已完成了能在中國市場上能與英美印度競爭而不敗之經營技能。軍艦，汽船，機車頭之製造技術，也已達到了若有某程度的政府保護，便能自給的技能。其他在各種工業中，多少也有相同的事情。加之，及至明治四十四年保護關稅實施後，外國資本家爲謀抵抗起見，在實施之前

後或自設工廠於日本，或改之爲與日人之合辦事業，外國技能之移植至日本者，正復不少。例如芝浦製作所的電氣機械，東京電燈公司的電泡，日本製錫公司的鐵工業，村井的紙煙，等等，爲其顯而大者。

以上祇關於工業方面，在礦業中，其技術之發達也頗可觀。農業亦然。其中如生絲貿易的大發達，頗有負於品質之改良之處。更在商業方面，其於匯兌業務，輸出入業等國際的活動上爲必要的技能修養，也漸臻完備。

第二節 日俄戰後企業的勃興及其特色

(A) 日俄戰後企業發展之經路及其形式

日俄戰後企業之發展，是採取了卅九年及四十年初的企業熱之勃興，四十年後半及四十一年之反動，四十三——五年之再度之企業發展之順序而進行的。第一次的企業熱，即卅九年的企業熱，大概起源於由戰勝而來的投機熱的勃興；第二次即四十三——五年之企業發展，是以根基於外資輸入的低利及保護關稅之實施爲機緣的。試從代表的統計一觀當時企業熱的潮流，則最簡明

地表示出投機熱的東京股票交易所股票市價，由卅八年的最高二百九十六圓半，暴騰至卅九年的五百十四圓九角，四十年的七百八十圓。但此時的物價指數，却不過由二三三漲至二四八，至若利息，則僅有日本銀行的利子在已述的人為的低利政策下由二分一厘一毫吊低至一分八釐二毫，市內利息，僅由二分五釐二毫跌到二分三釐五毫。又如紙幣發行額，民間存款及貯蓄金額，此時尚未發生可道的膨脹。

可是經過了四十年的反動，在四十二——五年間的第二次企業發展期中，東株市價最高僅達二百四十六圓二角，利息（日本銀行的）則由四十年的平均二分跌至四十三及四年的一分三釐餘，如紙幣發行額，則由四十一，二年的三億五千萬圓膨脹至四億三四千萬圓，民間存款及貯蓄金額也由四十年前後的十四億圓內外飛增至二十億圓內外。由此，已可不難看到第一次的企業勃興和第二次的企業勃興在道程上的大不相同了。

總之，由上述的經路，於日俄戰後（由一九〇五年七月至一九一三年）計劃起來的事業，實達三十八億四千一百餘萬圓的巨額。其中於第一次企業勃興期的自卅八年至四十年末的二年七個月中計劃起來的，實達十八億二千八百餘萬圓，即約為四成八，足與計劃於以後至大正二年的六年

中的相匹敵。由此可知第一次企業熱，實旺盛於第二次。

中日戰後的企業勃興的全部，殆均屬於新創。但日俄戰後的企業勃興，其屬於擴張的很不少。例如在至大正二年止的累計中，全體企業計劃中其屬於擴張的，實占四〇%八，在明治四十二年及大正二年，擴張占五一至五二%。此傾向，第一次的企業勃興期中較小，第二次較大。這是日俄戰後的企業熱得到了中日戰後的反動中的幼稚的體驗的教訓而集中於既已經驗過來的已設事業的發展中的反映。是日俄戰後的企業勃興和中日戰後的不同的特色之二。由此派生出來，且被抵抗當時用大資本作後盾的獨占傾向（如美國）的被動的必要所刺戟，日俄戰後的企業的另一特色，在於大規模化，在於「聯合」的傾向。但關於是等具體的事實的說明，依本書著述的便利上，讓到次編第二章第三節詳述。

（B）外資輸入政策及其反動

正如反覆說到的，日俄戰後企業發展的最大原動力，是外資輸入。但藉依外資輸入的借款政策的企業政策，當然要受到許多限制的。第一，借款借到某程度，則確實的事業，以及抵押品都告涸竭，失去容受新外資的力量。第二，由藉依外資的企業發展，其材料大部份仰求於外國，一

會其資金復又流出。第三，外資的本息，是非付不可的，因而國內之資金更感枯竭。加之，第四，日俄戰後的外資，其全部並不投費於產業投資，其大部份即十數億圓的外資，是消費於日俄的戰費中的，故對於本國的產業，其本利的支付更覺負擔之重，結果當然是資金的相當的流出。

因此之故，自卅七年以來，日本被滔滔的輸入超過所威脅。各年之傾向，此處略而不述，僅觀由三十七至大正二年的十年間的入超額，實達約五億四千四百萬圓之巨額。且僅是商品的輸入超過，此外尚有外債的本利支付。故雖有上述的巨額的外資輸入，日本的正貨額，內外合計，以卅九年未的四億九千五百萬圓為最高，至大正元年未，激減至三億五千一百萬圓。

此種正貨的減少，不必說壓迫着國內的金融。此時利息暴漲，明治四十三，四年為一分三釐的日銀平均利息，至大正二年重又飛漲至一分八釐。其後每年的輸入超過及外債的本利償付的必要正貨的如何籌集，是當時朝野的一個急迫問題。當時朝野的高呼「兌換制度的危機」的事實，便是此。

即大正初年的財界，可說是自日俄戰爭以來藉借債政策而繼續着好景氣已久的反動，巨額的借款用完，於元本的支付困難。為謀補救起見，乃不得不作利息之提高，財政整理，物價低落，

及官民消費的節約等，遇到了大不景氣。這是以明治四十五年明治天皇的崩薨為轉機而向日本襲來的大正初年的一大不景氣的根本理由。

第二節 日俄戰後企業的發展及其內容

(A) 日俄戰後企業勃興的中心產業

日俄戰後（一九〇五年七月至一九一三年）企業計劃的總額，實達三十八億四千一百萬圓之巨額。現且一觀其產業種類，則其中心為工業（紡織及製造工業的合計）之二九%，運輸（鐵道，軌道及航運）之一八%三，商業及其他的一六%，銀行之一四%九。電氣之一二%三等等。若照中日戰爭前後的分類那樣地把開礦電氣也加算入工業之中，則工業實占日俄戰後企業計劃的四六%八之巨額。這和中日戰後的企業計劃的以鐵道銀行為中心，（二者合計七三%二）除去紡織外，工業便無足道者相對照，已不難看到日俄戰後的企業的已漸入資本主義經濟的正道了。是的，在日俄戰後的企業中，和從前的企業不同，鐵道，銀行，商業等等，簡言之，即屬於產業發達的補助機關的事業，已不是它的中心；為真正的產業的紡織，電氣，開礦，水產。製造工業等，形成其

中心，它們所占的比率，達全體的百分之四八。可注目的是雖同樣說是鐵道，此期中電氣鐵道大爲勃興。

以上專由產業的區別而觀察日俄戰後的中心企業的種別；爲當時的經濟批評雜誌的權威的東洋經濟報，——明治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號——更由別的觀點作下述的分類。

(一)電氣事業——這是以極度低廉地供給各工廠，電氣鐵道及一般電燈以電氣爲目的的事業，東京電燈，東京電力的桂川的利根川水力電氣及宇治川水力電氣及其他設計均屬此。

(二)新領土及滿韓間的企業——目的在於新領土及滿洲朝鮮的經營；樺太礦業公司，南滿鐵道公司，營口水電公司，大連製鐵所，韓國起業公司，韓國興業公司等，均屬此。

(三)國外輸出事業——即製造運銷滿韓東洋諸國以及歐美各國的輸出品，大則如既設紡織業之擴大完成，及東洋方面紗絲紡織公司之新設，小則如水泥製造及羽二重(日本特產)製練公司等，均屬此。

(四)發生於戰後關稅率增加的輸入防制事業——屬行於「戰後財源」名下的現行保護關稅率，一方釀成了輸入品的騰貴，同時內地之舶來品相競爭之事業之振興，也被促進，如製糖，製

粉，煤油，製紙等諸公司，均屬此。

(五)適應內地需要的一般事業——這是隨了經濟界的發達，國民消費的增進而其需要也增進起來的事業如鐵道，船舶，保險，銀行及諸製造業等，均屬之。

又依事業的性質分類起來，則

(一)舊日事業的擴張與增加——如紡織業製糖業及製紙業等，其對舊日既已存在的事業加以增大者，均屬此。

(二)新設事業的創辦——或舊日完全沒有的，或屬於試驗時代的，至此均大大地計劃了。來，賽璐洛特 (Celluloid 即俗語牛筋之物) 炭化石灰 (○○○) 玻璃製造，肥料製造及水產事業等，均屬此。

由上已可大略看到日俄戰後的企業的中心爲怎樣的產業了罷。但以上均關於公司企業，個人企業，沒有列入。銀行，鐵道，保險等等所謂產業之補助事業，已全爲公司企業，但小規模工業之大部份，仍爲個人企業，當時小規模的工廠工業，達可觀之數。(明治四十二年使用職工在五人以上三十人以下的工場數爲二萬七千〇六十四所，使用職工達廿七萬八千六百餘人) 倘若把此

種個人企業也加算進去，則日俄戰後的企業勃興；很容易看到廣義工業的占半數以上罷。

(B) 日俄戰後企業發展的內容

以上在(A)項內所觀察的，專關於企業計劃，那麼其計劃到底成立及實現至如何程度呢？欲明此點，可看事實上資本已全繳的公司數及其已收資本金額之推移，及其產業種別。因為由此可以得到了解日俄戰後產業發達之大勢的指標。

現為欲達到以上的目的起見，更把農商部調查的公司統計的業類別加以再分類，觀其主要業類中公司事業的推移：（惟此觀察的應得注意的，是明治卅九年鐵道國有的結果，其後達數億圓的鐵道公司的資本，被由公司統計中削除，因之陸運上的資本發生了大減少，延而給了全體的均衡上一個大變化）。自明治卅五年至大正元年的十年間，已資本金最增大的，為商業的四億二千四百萬圓及工業的三億九千三百餘萬圓二者。回顧明治卅五年的商業的四億四千萬圓與工業的僅僅一億五千三百餘萬圓，則日俄戰後的產業發達在工業方面如何的旺盛，可不難窺知了。次於商工業，在日俄戰後有長足的發達的，為礦業，由三十五年的約二千萬圓，至大正元年增至一億三千萬圓。再次為水運，由三千八百萬圓增至六千九百萬圓。又自其絕對金額雖小，發達程度則

頗大一點上說，則農業及漁業也未可輕輕略過。即在此時期中，前者由一百六十七萬餘萬十圓倍至一千六百五十四萬圓，後者由僅僅的八十七萬五千圓十一倍至九百七十八萬八千圓。由此我們可以推想到日俄戰後，礦業，漁業及某種農業，漸在近代的產業型態中作長足之發達的狀態了罷。

但一觀對於大正元年末的公司已收資本金額全體的各產業種類別的比率，則農業漁業尙未足一%，水運不過三%九五，礦業不過七%四五，其大部份為工業的三一%一四，及商業的四九%二一兩者。（其間陸運方面，則因鐵道國有，由三十五年的二五%五六，大正元年落至六%七五）。

第三章 歐戰戰時及戰後的產業發展

第一節 歐戰戰時及戰後企業勃興的機緣

(A) 歐戰戰時企業勃興的機緣

以歐戰為發端的企業勃發，不僅在戰時，即在戰後，亦頗盛行。但促進此企業的勃發的重要機緣，戰時的和戰後的之間却有不少的差異。故此地也把兩者區別了觀察。

歐洲大戰始於大正三年（一九一四）七月，以大正七年的休戰條約的締結而實質上告了終。在戰爭勃發當時，經濟界受異常的驚振，財界也顯然沈滯了起來。自大正四年頃起，交戰國方面的軍需品的定貨漸增，以此為轉機，日本遂產生了四，五，六，七年的前代所稀有的企業勃興時代。而在歐戰交戰時期中促進日本企業的勃興的機緣，為下述諸事。

(一) 歐美貨物的輸入杜絕及激減。

(二) 作歐美品的代用的輸出的激增。

(三) 交戰國的軍需品的輸出的激增。

(四) 世界船舶之不足及日本海運與造船需要的激增。

其結果，物價及水腳飛漲，諸事業均恣於巨大的利潤，股票市價狂漲，喚起了企業的勃興。

第一，關於(一)的歐美貨物的輸入杜絕：歐戰爆發後，一向依賴於歐美的輸入品之處多而且大的日本經濟，因輸入之杜絕及激減，產生了對於此種商品的飢餓的困難。產業界看到了戰爭一時不易收束的情勢，覺必得自己供給此等商品的代用物才好，新企業，乃和暴風雨地興了起來。那麼，在歐戰當時因了歐美品的輸入杜絕及激減而感到了飢餓的困難的主要商品爲什麼呢？當時的當局者，列舉下列各物。

矽鑑石，硫酸亞摩尼亞，智利硝石，加里鹽類，鐵板，鐵類，亞鉛板，生橡皮，膠水，鹽素酸加里，磷，撒里矢兒酸(Salicylic acid)，石炭酸，苛性曹達，曹達灰，過酸化蘇打，甜油(Glycerine)顏料，洋紙，板，玻璃，火藥等等。

此外，向來因有歐美貨的輸入而在競爭上困難的地位的各種產業，例如紗布的精工品，毛織

物，金屬製品，機械類，化學工業品等等，不必說也在此機會中受了一大刺戟。

其次代替了歐美貨而在東南洋方面作了巨額的輸出的主要貨物種類，大體和上述的相同，而以紗布關係品及雜貨類為尤著。（三）的軍需品，則有軍器，軍服，銅，澱粉及豆類等。但當時爲了此等大量輸出，自己國內物質的消費上，就非得加以大大的限制不可。結果在物價暴貴之形式上表露了出來。又一方面因了對外國的現金輸出禁止，對輸出金融若不設定特別方法，輸出之途便將迂塞，政府乃以輸出獎勵爲目的，自當輸出金融之衝，因之由大正四年至七年之間，遂能有約十五億圓的輸出超過。結果，一方遇到了極度的物資的涸竭，（其最代表的現象，爲住宅的大缺乏）他方被異常的貨幣資金過剩的大洪水所惠顧，釀成了培成後來大正九年的大投機熱的一大禍根。因此之故，研究歐戰戰後的經濟史的時候，戰時政府的全不顧到國內物質的大缺乏而徒然採用輸出偏重政策，是一個值得至大的批評的重大問題。但關於此，讓至第四編產業的整理時代中再述，此處僅止於喚起如上的注意，不提及此等問題。

以上之外，歐戰給財界以企業勃興的刺戟的，是前述的（四）之船舶需要的激增。因爲由此結果，一方則如後所述，收得了巨額的貿易以外之收入，因之黃金洪水更形猛烈；他方則使造船事

業勃興，與之有關的凡百產業都繁榮了起來。例如欲知當時船舶需要的如何多而大，可一觀世界海運水腳的推移：孟買——倫敦之間，在大正三年七月爲十五先令六便士，至四年六月暴騰至六十二先令六，五年三月一百三十三先令，同年十二月二百廿五先令，六年五月至七月間至三百先令內外，船舶業者均占巨利，甚至產生了所謂『船舶暴發戶』一語。內外的船主均爭先恐後地進行造船計劃，產生了日本造船事業史上未曾有過之勃興。

(B) 歐戰戰後企業勃興的機緣

根基(A)項內敍述的機緣而產生的戰時企業之勃興，及至大正七年十一月休戰條約成立，遂以此爲轉機，遇到了一大反動。但當時日本已在所謂戰時景氣中積蓄了巨大的資金，財界的企業中心，動輒因強大的刺戟而狂動。加之當時掀動世界的投機心的『戰後之大景氣』的人心，自大正八年的後半年起漸漸爆發起來，投機心與資金關係互相併合，遂勃發了大正八九年的『戰後大景氣』。原來形成戰時企業勃興的機緣的，大致是以因戰時的變態事情，內外的物資需要激增，物價暴騰等爲中心的。但戰後的企業勃興，是後述的發源巨大資金積蓄的投機的刺戟及誘惑兩者和世界的『戰後的大景氣』之人心之勃興相迎合後而釀成其機緣的。

例如歐戰戰時的貿易，則既如上述，輸出激增，且歐美貨的輸入大減，因之輸出超過，在大正四年至七年之間達十四億七千四百萬圓，即約十五億圓的巨額。更乘世界船舶之缺乏（自以英國封鎖為目的德國潛水艇的商船擊沈政策以來，缺乏更形膨大）日本的商船漁得高貴的水腳，活躍於世界舞台之上。其結果，由外國收入的水腳及傭船費的金額，在大正七八年達四五億圓，加之，如保險費收入等的所謂貿易以外之收支，在大正四年至八年之間產生了十八億九千三百萬圓的收入超過。若把輸出超過額也加入，則可知實已有約三十三億圓的正貨，流泛於日本財界。

遇到了此黃金洪水的日本官民，深恐與如此通貨膨脹俱來的財界的投機白熱化起來，或貸協約國以軍費，或用於對華借款，或獎勵國外投資等等，竭力圖對外的消化，但正貨總額仍有增無減，由大正元年末的三億五千一百萬圓，至大正八年末實達二十億四千五百萬圓之巨額。

故當時金融市場雖得異常的資金潤澤之惠，而得有大正四年至七年間的戰時事業之勃興，利息仍滔滔下落。例如一觀日本銀行的利息，則由大正三年七月至五年四月，繼續着二分，但至是年七月，便跌至一分六厘，至六年三月，落至一分四厘的低利，此價約持續一年半，即持續至戰後的企業熱勃興為止。

此時上述的『戰後的大景氣』的預感，支配著當時的人心。現且借當時的日銀總裁井上準之助氏的嘴來說一說戰後即大正九年的投機熱爲如何之物罷。氏在其所著戰後我國之經濟及金融中第二五——二六頁上說道：——

『……但其時（戰爭終結後）日本人會想到：現在已種了他日大難之禍根了，但實際上也是不得已的。即世界各國通貨非常膨脹，此通貨之膨脹，不是在短時間之內所能整理的。所以外國也決不能整理，必與日本以戰爭時相同的影響。其次，在戰爭中，已用去了三千有餘億圓。金錢的力量，是在世界中任何部份都會活動的，決不會因了戰爭告終的一簡單的事實，金錢的力量的活動就告消滅。這是和我的意見及希望相一致的忖頭，日本的大多數人也這麼忖。此外在日本尚有一個非常有力的忖頭，這是被我在那時否定了的，但此忖頭却很強而有力。中日戰爭後的景氣如何？日俄戰後的景氣如何？不是在戰爭時間，雖然非常的財界不況，但一到戰後，兩者都出現了非常好的景氣嗎？此次世界大戰，既如此使通貨膨脹，如此用去了戰費，則世界大戰之後，一定會產生好景氣的。不能產生好景氣的理由在那裏呢？此種議論，當時非常之多。……』

他們在如上的經濟的背景及人心的薪木之上，更注以火與油，遂終於喚起了大正八九年的白熱化的投機熱，而刺戟了企業的勃興的，是由於交戰國的『解散軍隊復興計劃』的巨額的財政支出，及美國的戰後景氣的出現。例如井上準之助在前書中又記述如下道：——

『……至大正八年五月止，誰都不能預測將來，是事實概觀大正八年六月前的世界的財政的經過，則在歐洲交戰國方面，軍隊雖一般退却了，但和戰時全無些少的變更。到後來雖然已什麼人都不再期待像戰時那樣的好景氣了，但由實際上的船舶的行動食料的缺欠，等事看起來，殆仍無兩樣。此事實直接給日本的貿易一個影響，輸出因而得以增大。其次給日本以另一個直接影響的，是正如各位所熟知的，美國因戰後的好景氣，適在是時起漸漸高價購買日本的生絲。此事實一發生，大多數的日本人又覺戰爭後的好景氣確非出現不可一定會出現，我們應得乘此好景氣作勇敢的活動啊。此事實非常被人利用，因之自大正八年六月起，產生了全無根據的空景氣。……』

第二節 歐戰戰時及戰後投機的白熱化

(A) 物價的暴漲及商品投機的盛行

述於第一節中的歐戰的影響，第一在物價暴漲之形態上最尖銳地表現了出來。而作物價騰貴的先驅的，不必說是一向大部份依賴於歐美的輸入品的種類。即工業藥品，藥品，顏料，鐵及在第一節中說到的各種的物價，都暴漲了數倍乃至數十倍。例如苛性曹達，由戰前的四圓七角半，至七年七倍有餘地漲至三十五圓，同期間內曹達灰則由三圓半漲至十七圓四角。漂白粉則由戰前的五圓七角半，至五年三月漲至十七圓八角。尤如衣料所必不可缺的顏料，更如下地告了五六十倍乃至二百數十倍的狂騰。

	戰前價	大正七年五月價	比戰前
Paintblue	(百斤)二五〇圓	一五、〇〇〇圓	六十倍
Rhodamine	(特等百斤)一五〇圓	六二、〇〇〇圓	二百四十八倍
Acid Violet	(百斤)一〇〇圓	六、〇〇〇圓	六十倍

前二者綢絹用，第三種毛絨物用，最後的紗，綢毛三者並用。

此外當時因了輸入激減及輸出激增等而在物資供給上產生了多大的不足的各種的商品市價，

均已在大正五年之際顯然騰貴起來，但其達到最高點的時期，却有二大區別。即示現於大正五六年之間（戰爭中）的及示現於大正八九年（戰後）的區別。例如銅，鐵，曹達，顏料，藥品類等，為前者之代表物，或因歐美貨物供給杜絕，或戰時的軍需用為基因而騰貴起來的；至休戰條約成立，預料到了供給增加及需要減少，市價乃驟落。此外，為屬於此部類的市價而值得注意的，有海運水腳。例如為日本海運的標準運費的門司橫濱間的煤的水腳，（每噸）在大正二年平均為一圓〇六分二厘，至六年九月暴漲至十圓九角半；迨七年十一月休戰成立，翌年平均遂暴落至四圓七角八分九厘。這是煤價（其大部份為水腳）在大正七年作最高記錄的特殊理由。反之在大正八九年留下最高點的，是以發源於戰後大景氣到來的人心的投機的物資為中心的？大部份以和平需要及再建設需要為中心。

如上之物價暴漲之勢，不必說是發源於輸入激減，輸出大膨脹，物資的缺乏等等實質的經濟原因的。可是此種物價連續的昂騰的結果，祇要買入商品，則便可靜待其漲價，莫大的利益便流過來的事實，大為明顯，因之對於商品的投機熱，遂加速度的地白熱化了起來。但當時企業界在計劃的實行上必要的機械及材料之輸入，因歐美供給力之不足，非常困難，因之企業熱被減殺不

少。但此事却不料竟起了二重地煽熾商品投機的作用。即第一此結果更堅強商品供給增加困難之預料，刺載着商品投機家；第二使企業投機家走入商品投機一途。

故物價現在已離去了實需關係，因投機商品的操縱而昂騰了起來，而昂騰更引起商品操縱，商品市價乃竟因了操縱，而加速度地狂騰。此商品操縱，雖有多少程度之差異，當時差不多一切重要商品的都受其光顧。例如開戰之後，此種操縱第一實行得最大規模的，是顏料，鐵，船舶等；到後來則及於棉紗，棉布，糖，生絲，豆粕，小麥，米等等重要商品之全部。結果，此等重要商品之市價，乃奔騰了起來。

以上的重要商品中，其中如米紗布等等的物價奔騰，當然使一般商品市價共同飛漲起來。加之，戰時因物價之高昂而極度被阻止了的住宅及衣服等之需要，至戰後仍久未見物價有下落之傾向，遂忍無可忍，（或被房租的暴騰所刺載）遂起作滿足此種需要的建築與製造，物價的暴漲，在戰後乃普遍化了起來。試一觀東洋經濟新報社所調查的物價指數，則戰時總平均指數，（以大正二年一月的爲一〇〇），大正七年僅爲二三三；八，及至戰後，反而昂貴，九年初實已奔騰至三一五，八之高位。而視其類別指數，其各類指數的最高額，也僅以金屬一項在大正六年八月示二

八九四之最高額爲例外，其餘均在大正九年一月至三月之間示現最高額。其價格如紙，織物，及織物的原料類等，與戰前相比，各暴漲至四倍七至四倍五，其他除去了如穀類及食料品的農產品類的二倍七成外。均爲三倍四成餘至三倍六成餘的暴漲。請以此與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的平均一八一二，對比一下罷。由此，戰時戰後物價的暴漲，和戰前相比，固不必說，即與昭和的現在相比，也容易看出其爲異乎尋常的罷。如次項所詳述的，此異常的高貴物價，給了產業主莫大的利潤，受此刺戟，戰時戰後的企業遂勃然而興。

（B）事業利潤的膨大及企業熱的勃興

如上的物價暴漲，（包含海運水腳船價等）其給事業公司以巨大的利潤，是不必說的。例如戰前的事業公司的標準利潤，由各業的不同，均爲對已收資本金的一成左右至二成左右，平均不過一成五。及至歐戰開始，大正五年竟鑛業九成一餘，紡織七成三餘，海運毛織各五成餘地舉了巨利，至六年，海運，造船，均舉十六成餘之巨利，鑛業十二成餘，紡織近十成，機械造車近八成，其他製麻，毛織，製紙，肥料及化學工業製糖各業，也得了五成左右的利潤。後來，由年份及產業的不同，有多少的變遷，不過至大正八年止，尙續示好成績。這時僅有鑛業，機械造車，

肥料及化學工業，例外地在戰後失去了「戰爭利潤」罷了。

於此，各種事業的股票價格暴騰，對於股票的投機，白熱化了起來，結果遂產生了如次節所述的戰時戰後的企業的濫興。這裏且由當時的股票價格暴漲的實況起漸次嚮導讀者罷。

依東洋經濟新報社的以大正二年末的平均市價爲一〇〇而調查得的事業種別的股票現貨市價指數，則其總平均指數之最高者，至大正五年上半期止，僅不過一三〇左右而已，至六年一時昇至二一〇，但後又因停戰到來的脅威，落至一六〇，及至七年，漲至一八七，六，八年更飛漲至二四一，一。由此可知對於一般事的業股票投機熱的勃興，以大正七八年爲最旺盛。

以上是關於股票價格的總平均，若由各個事業的類別觀之，則就大不相同，例如此股票價指數，對大正二年平均的一〇〇，在大正五年早已奔騰至三〇〇的，有交易所股票船舶股票，煤礦股票，製紙股票的四種；達四〇〇的，有鑛業精煉及造船二事業其中鑛業精煉及製紙，以大正五年爲最高。此外，上面的暴漲中雖未提及，但在五年中現最高價的，有製麻股票的二三六，三〇，煤油股票的一七四，八〇，漁業及罐頭的一六〇，二〇的三業。所謂戰時事業而在翌六年示現其股價的最高價的，爲船舶（三九八，四六）煤礦（三三七，九三）造船（八〇四，一〇）之三業，

其股票價格的地位，由戰前的三、四倍達至八倍之高所。此外在六年中示現最高價的，有水泥的二三三，三六，七年中示現最高價的，僅有信託（二三二），五六一項。由此可以窺得大正五六年當時作企業投機勃興的中心的產業爲什麼，且此等企業的投機熱爲如何熾烈的一斑了罷。

可是此種對於所謂「戰時事業」的企業投機，一至媾和成立，便得立即失去其繁榮的基礎的。且什麼時候方能停戰不能預知的恐怖，不時威脅着人心。故當時的業企投機，雖亦熱至異常之程度，尚不得不限於一部分少數的冒險的投機家的範圍內。在這種狀態之下，休戰條約突然於大正七年十一月成立，所謂戰時企業的投機熱，乃遇到了一個大頓挫。

但到了大正八年後半期，在上面第一節（B）項中所述的事情之下，所謂「戰後之大景氣」之人心沸騰，商品市價如上述地暴漲，且與投機熱之亢進同時，是甚至連一年半後的生產也都預先定下的狀態，工場能力未能接受新的定貨，僅能收受預定的幾分之一，甚至數十分之一。於是欲實在得到一百的商品，便不能不作數倍，數十倍的預定不可。在這種意味之上，例如真實的需要爲一百的時候，對工廠的定貨非得用數百數千的數量不可，對於事業利潤的現在及將來的預期，真太樂觀了。

不必說，其結果是股價的暴漲，股價的暴漲，更煽起了股票投機熱，於是股價更其上昂，股票投機熱更加白熱化。股價乃加速度地奔騰了起來。例如所調查的二十二事業中，在大正八年，達到股價的最高點的，實有十三種事業，以煤礦股，紡織股的四一〇為最高，其下為交易所股的三四〇，保險，電車鐵道，毛織，土地建築物的二八〇至二九〇，製糖，牌酒，製粉的二四〇至二七〇，肥料的一七二餘，電燈電力的一五六餘。且以上在戰時戰後，或由增資，或由特別分紅，一時與股東以巨利，故雖有表面上使股價的地位大大降落的事實，尙能續現以上的暴漲。總平均指數，對戰時的最高一八七，六三，大正八年的最高數實達二四一，〇一，大大更超過戰時的投機熱，已是論述過的了。

第二節 歐戰戰時及戰後的企業盛行及其內容

歐戰戰中及戰後的企業盛行，已如上述，是乘物價暴漲，股價奔騰，利潤膨大，投機熱勃興等等之波浪而起來的。但在『戰時景氣』的當初，不知媾和何時到來的警戒很嚴重，企業計劃自身，較物價股價等等之暴漲為遲鈍；就算企劃計劃實行了，其大多數也屬於已設事業的擴張，屬

於新創事業的新設計的，比較很少。例如事業計劃中屬於擴張的比例，在大正四年曾占六七%二七之高率的，至五年漸減至五九%〇八，六年四四%五三，到了八年，擴張遂跌至三四%一，事業計劃的六五%八九，激變為屬於新設者。因戰爭的撤退，隨戰後大景氣的人心的鼎沸，世人的戒心漸次寬弛，於是新設事業計劃急速地盛行了起來，這是很易看得的。

故於自大正四年至九年的僅僅六年之間計劃起來的事業資本額，實達一百四十三億七千一百萬圓的巨額。請以此與費去了自明治初年到大正二年的長時期而才發達起來的戰前（大正二年末）的公司已收資本或出資金的總計僅為十九億八千三百萬圓比較一下罷。戰歐戰中及戰後的事業計劃額，實為其七倍餘。其企業盛行為如何廣大之狀，想可推知了罷。上面的一百四十三億七千一百萬圓的戰時戰後的企業計劃費中，其八十六億餘圓（全體之五九%九七），屬於新設，五十七億餘圓（全體的四〇%〇三）為已設事業的擴張。而其中屬於大正八年至九年的計劃的，為新設六六%五，擴張六〇%，占新設擴張合計的六三%九。由此可知戰後的企業熱，如何較戰時的更為猛烈了罷。

更轉而由其事業之區別而視以上戰時戰後企業盛行之跡，則正如反覆說及的，歐戰戰時及戰

後的企業熱，戰時和戰後。其事業內容是大不相同的。例如觀大正四年至七年之間的事業計劃的產業的類別，則此期間中作企業熱的中心的主要產業，從以其對於全體的比例的大小為基準言，則為鑛業（占全體的一〇%八）海運（八%六）化學工業（八%四）電氣業（七%）機械及器具工業與金屬工業（兩者各五%餘）。更由以其對全體所占的比率雖較小，但和戰後（大正八——十年）的相比，此期（大正四——七年）的頗為觸目的為基準而言，則作為戰時的企業的中心的，有造船及船渠業，窯業（水泥，玻璃）保險業等。更從製造工業全體看，則其比率實占全計劃的三六%，可窺知其為戰時企業之主要者了。

鑛業是以銅，煤，煤油為中心而包含各種企業的，尤如亞鉛，在戰時示現了特殊的繁榮，是值得注意的。化學工業則以人造肥料，顏料，製紙，工業藥品，賽璐洛特為主，機械器具工業則及於各方面，其中電氣品頗有發展；又隨了鑛業的發達，鑛山器具機械業也頗飛躍，金屬工業，特以鐵工業，銅加工業為主。

以上是對於戰時中的事業計劃的內容的鳥瞰，戰後的事業計劃之內容，已如上述，頗有異其旨趣者。即若以此期中的企業的中心對於事業計劃全體所占的比率為標準而概觀時，則商業（其

中以國際貿易爲中心的所謂商事公司頗盛行）占一九%五，在第一位，其次爲銀行（大部份爲增資，多數爲補足資金的缺乏）的一四%八，雜工業之九%二，電氣業的九%，鐵道及軌道業之八%七等等，（戰時以海運爲主，戰後則以鐵道軌道爲主）。比戰時企業顯然有增加的，此外尚有紡織業的四%九，製織業之四%一，農林業的四%二等，其較戰時雖有不少的減少而仍古可觀的的比率的，有鑄業的五%九，化學工業的五%二等；戰時十分旺盛的企業至戰後大大凋落了的，有海運業，造船及船渠業，機械器具業，窯業，金屬業等。

因戰時及戰後之差，企業勃興的中心產業起了不少的移動。但在歐戰歐時及戰後的全時期中（大正四年至十年之間）作事業計劃的中心的，爲製造工業之三三%七，商業及其他的一八%七，銀行業（信託業在內）之一六%七，運輸業之一二%二，（其中鐵道及軌道七%二，海運四%二）電氣事業之八%四，工業之八%四等等。製造工業之中，其主要的業類，爲化學工業的六%二，紡織業的四%二，製織業的四%，機械器具工業的三%七，金屬業的二%七，雜工業之七%九，若得到了異常的繁榮的戰時事業造船船渠業，不過一%四。故企業計劃最旺盛的單獨的產業，當然是銀行，電氣業，鐵道軌道業及紡織業等了。

第四節 反動之襲來與歐戰戰時及戰後的結尾之產業發達

(A) 戰爭景氣及戰後景氣之反動

歐戰戰時及戰後的企業的勃興，正如已可由上述容易看到的是以戰時經濟的異常物價及戰後大景氣的幻想的暴騰物價為基礎的，二者都是建立於皮毛泡般的一時現象上的。以之和中日日俄兩戰後的企業勃興的受得豐富的資金的供給後而向具備着各種產業發達的恆久的條件之處作企業的勃興的經過情形一比較，則便不難推知到歐戰戰時及戰後的企業勃興的包含着如何的冒險的事實了罷。是的，一種遇到企業熱的反動期，其給與產業界之打擊之大，到底不是中日日俄兩役後的所可比擬的。

第一次反動，是以大正七年十一月的休戰條約之成立為導火線而襲來的。因休戰之成立，一朝之間把從前的「戰爭景氣」悉數覆滅了。但在實際上，是早是遲，「休戰之到來」，是大家所料到的，故也對此早有相當的準備。並且各事業均因了戰爭景氣而得到多大的利益，處理預期到的反動的實力，也已具備。因此之故，停戰後的物價下跌雖甚，其因此而受到瀕死之打擊的，僅有少

數的投機者。

因如上之理由，「戰時事業」，確不得不和「休戰之到來」同時作大大的整理了，但其打擊，是局部的，對於產業界全體，尙未有多大的影響。何況不久之後大正八九年的「大景氣」又勃發了起來呢。

可是發端於大正九年三月的「大反動」，實已把戰時戰後的產業繁榮的總果化爲烏有了。大正八九年的企業大盛行，正如在上面第二第三節中所詳述到的，大部份是以累積地在投機的壟斷之下膨脹起來的「臨時需用」爲基礎，而以在此幻影之下奔騰起來的異常之高貴物價（例如物價總平均指數爲戰前的約三倍）爲採算之根基而勃發起來的。在當時，財界的許多人，自信着此「大景氣」的基礎，是置於一時決不會動搖的大盤石上的。但事實上呢，此「大景氣」從二側面時時刻刻面臨着反動的危機。

第一爲投機資金的緊迫。

第二是銀行的由於戒心的，放貸限制。

欲繼續投機的盛行，巨大的資金是必要的。但投機熱繼續了若干時期後，或因被物價高貴所

誘起的輸入超過，資金流至外國，（當時的銀行中輸入匯兌之激增，早已知道此事了）或因企業計劃的進行與工廠及其他設備的進行，資金都固定起來。能煽惑維持投機熱的資金在大正九年初已如是缺乏故反動的危險早已刻刻逼近。並且銀行看到了物價股票價的軌外的暴騰，預怕到它的反落，便以此爲基礎而開始限制起對直接間接以股票爲擔保的諸事業的資金的出貸。發端於大正九年三月的「財界之大反動」是這樣起來的。當時的反動的用了怎樣的來勢襲來，及怎樣使財界震駭，可借當時在日本銀行總裁的責任地位的井上準之助氏的話，最爲簡單得要。氏在上揭所著的六六——七頁中述說當時的情形道：

『至大正九年三月十五日，股票交易所的股票大跌特跌。……結果以大正九年三月十五爲動機，在大正九年的四月五月六月之間捲起了非常的騷動。至其騷動爲怎樣一個騷動呢？原來大正三年戰爭開始之時，已起過非常的騷動了，但那騷動，僅限於與外國有關係的商人。大正七年休戰時的反動，範圍廣大一些，和大正八年後的受了空景氣之後的大正九年的狀態也大不相同。大正九年之時，日本全國一時變爲黑暗，爲什麼呢？因爲一切的交易所都停止了。以股票交易所爲始，苟是稱爲賣買之市場，全都閉鎖了起來。其次什麼棉紗，生絲，地

方的機業等等，均停工封鎖，數十日之間什麼事情都不做，祇是茫然裝一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面孔。……

事實上九年的反動的如何猛烈，從諸市場之市價之暴落中去看，最為捷徑。試一觀當時諸市價暴落的痕跡，則在九年三月的反動後的約六個月左右中，什麼都慘落至反動前的半價，或甚至十分之二以下。例如白米由五十五圓一角暴落至二十五圓二角，生絲期貨由三百六十二圓五角跌至一百十一圓七角，棉紗期貨由六百四十九圓一角跌至二百二十一圓一角（十年三月更崩落至一百七十二圓）東京交易所股票由五百四十九圓跌至一百圓五角。以上是關於重要商品及股票，但當時的「暴落」，並不限於此等最易供為投機目的二者，而是一般的。例如物價總平均指數暴落四成餘，股票價總平均指數慘落五成五餘。由上已不難看到當時的反動的為如何猛烈了罷。

(B) 歐戰戰時及戰後的結尾的產業發達

以上述的大正九年的反動為一轉期，日本的產業轉入了戰時戰後的企業整理時代。而事業界的整理，後為「破產」之最後的威脅所迫，十分大規模地被強迫着實行了起來。但在事實上，則暗中多有採用政府的救濟政策，關稅及其他的保護政策，存款部及特殊銀行之惡用，以及市內銀行

的濫用等等彌縫及欺騙政策者，因而事業界的整理遲遲不進；加之累加了大正十二年的關東大地震的打擊，終於在昭和二年春的金融大恐慌之形式上，曝露了彌縫欺騙政策的破綻。產業的困難，乃更形加重。但關於此點的詳細，改在最後的（即第四編）整理時代編中再論。

問題是，在反動後的戰時戰後的事業大整理之後，結果產業在這期間內究竟有了若干的發達？解答此問題的最完全的材料，在現在的日本，除公司統計之外別無可靠的材料，而即此公司統計，在此期間，或由稅制上的關係（所得稅等），有不少個人名義的事業僅在名目上變更爲公司組織，又在大正九年的反動後的事業整理中，其大部份均以未收資金的徵收，增資等方法來補資金之不足，表面上反而作了像是事業發達之狀的「整理」。故欲依公司統計的消長而窺歐戰戰時及戰後的事業發達，是非得先了解此等關係而再考慮不可的。

現且一方把此等關係記在心頭而一觀歐戰戰時及戰後的公司已收資本的推移罷：原來歐戰戰時戰後的公司事業的增加，（大正元年末及十一年末之比較）在總計公司數中，爲二千九百〇二家的增加，（約二成三之增加），已收資本額上爲約六十億五千萬圓（三倍四成四之激增）的膨脹。即就是記着上述統計的關係，對這麼激烈的膨脹也不得不吃一驚罷。尤可注目的，是資本的增

大，比公司數爲大。是的，在日俄戰後漸漸發端起來的企業大資本化的傾向，及至經過了歐戰戰時及戰後，產生了異常的資本集中勢力。關於此，爲本書著述的便利起見，讓至次編第二章第三節（C）項中說罷。

那麼上面的資本增大，是發生於那幾種企業中的呢？大致在工業商業及礦業的三業中，而其中在工業中的，最爲明顯。例如在大正元年及大正十一年的期間中，工業爲二十五億二千八百萬圓（四倍六成餘）的激增，商業爲二十三億六千五百萬圓的著增，礦業則更小，爲五億八千八百萬圓（四倍五成弱）的增加。其他水陸運輸，農業漁業等等，均有增加，但遠不如工商礦之甚。

結果，產業內容（表現於公司資本額中的）大大變化，在大正元年商業爲四九%二一，工業爲三一%一四，運輸爲一〇%七的，至大正十一年商業著減至四一%三七，工業增至三九%三九，兩者差不多立於同等地位了。而第三位的運輸，則落至八%三六，礦業變爲九%二一。但此礦業的增進，正如可由以後的推移看到的，要不過是表面的投資金額的水泡一般的膨脹；在實質上，則運輸業在產業上所占的地位，重大多了。

歐戰戰時及戰後的產業膨脹，以工商業爲主。若先依公司已收資本一窺此工業發展的主要產

業內容，則在大正元年，工業公司的主要者，第一爲電氣業的一億五千九百萬圓，第二爲棉紗紡織的六千五百萬圓，其次爲紗絲毛三紡紡織的二千五百萬圓，造船的二千八百萬圓，製紙的二千二百萬圓，人造肥料的一千三百萬圓，麥酒等之一千二百萬圓，水泥等的一千一百萬圓等等之順序。但至大正十一年，第一依然爲電氣事業的九億六千三百萬圓，電氣事業已提高爲日本首位工業了；但第二爲紗絲毛三種紡紡織的二億四千七百萬圓，及其次的棉紗紡織的二億一千四百萬圓，兩者的地位，適反了個向。此期中織物事業的如何勃興，可以窺見了。但以上二者的合計對於工業全體的比率，由大正元年的一五%六減至十一年的一五%。反之，對於公司全體的比率，同期間中却由五%一七增大至五%八六，故由此等現象，可以不難看到歐戰戰時及戰後棉紗紡織及織物業以外的工業的如何發達了。

那麼大正十一年末的已收資本的次於棉紗紡織的是什麼呢？爲製紙的一億一千四百萬圓，電機機械及器具的一億〇一百萬圓，縷絲的九千五百萬圓，機械類製造業的八千五百萬圓，製藥業的七千八百萬圓，金屬材料品製造的六千六百萬圓，及造酒的五千五百萬圓等等。

可由此等傾向中看到的。是在歐戰戰時及戰後的工業發達中，流着如次述的值得注目的現

象。

(1) 電氣事業單獨大形膨脹。

(2) 可歸入重要工業部類的新產業的續出。例如電機機械器具業，機械類製造業。製藥金屬材料品製造業，製材業，麻絲紡織業，橡皮及賽璐洛特業等。其他，雖未達本書所採錄的資本額，而是在此期中發達起來的新事業的重要者，如人造絲，空中窒素採取，厚玻璃等，也是不能輕輕略過的。

(3) 精工業的發展，較大於粗工業。其顯例之一，便是織物業已較棉紗紡織業占更重大的地位。

(4) 一向在家內工業及其他舊式產業型態下經營的運銷的日常用品生產的大為近代化。例如造酒，醬油味噌（味噌為日人朝餐時必飲之湯——編譯者）等公司資本額的大增，即其反映；此外糖菓事業，足袋（即日人下體之襪——譯者）製造事業等，是其代表。

(5) 屬於「戰時事業」的哄哄烈烈的產業，大告凋落。例如造船，製銅，顏料，工業藥品等，為其著者與其不屬於工業而陷入與「戰時事業」同一的命運的，有鐵鑄業，製鐵，銅

鑄業，亞鉛鑄業等。

若由公司已收資本額的消長轉概視商業中主要產業類別的推移，則占中軸的地位的，依然是銀行；但其地位與戰前相比，已低下不少了。例如大正元年，銀行資本在商業資本全體中所占的比率，為六成六，至大正十一年，就減至四成九餘。這是銀行以外的商業大大發達起來的結果。而最為惹目的，如貿易業，「保全公司」等等在戰前是公司統計上尚未承認之為獨立的產業的企業發展。例如在大正十一年末，貿易業以一億二千五百萬圓之巨額次於銀行業，「保全公司」以一億○二百萬圓占第三位。貿易公司的所以有這麼的發達，是三井三菱，大倉，久原，鈴木，高田，茂木，湯淺，古河等種種新舊財閥，乘戰時戰後歐美貿易商之返國，用商事公司之名義，以巨大的戰時利益為基礎，盛大地活躍於世界貿易市場上的反映。但其大部份，以大正九年的反動為轉機，多有破產者，其少數殘留的，也有不少是有名無實的了。例如鈴木高田二大貿易商倒產，茂木死去，久原古河等商事公司破產；昭和年代，是三井三菱，而尤以三井支配着國際貿易的現狀。但此等貿易商的活動範圍，比戰前已大大擴大了，這是由此也可明白看到了。其次「保全公司」，其為富蒙乘稅制之欠陷，而設立之為一種漏稅手段的色彩，頗為濃厚，但一方在某程度上

又反映出「統御公司」(Holding company)【註】的發達，是值得注目的。

【註】統御公司即一公司收買同種性質之他公司的股份，自為該公司的營業政策的統御者。為托辣斯之一種。——譯者

除去以上各業則商業中的重要者為保險業，交易所，倉庫業等所謂產業輔助事業，其他的可注目的現象，為自近時信託法制的完成以來，信託事業勃然而興，早已占得了重要地位；以及如演劇遊覽場的娛樂機關的大資本的投下（例如大正十一年末的已收資本金，達六千五百萬圓）；在戰時戰後占到了異常的位置的，有百貨商店；又統計上雖尚未目之為獨立的商業，但也示現了值得注目的發展的，有「共同房子」(Building)事業等。

第一章 產業革命的進行

第一節 產業革命進行的概觀

(A) 產業革命進行的一般的觀察

大體上以明治維新為一分期，封建制度頽倒，資本主義制度誕生。應用原動機的工廠生產制度漸漸普及於日本，因而在國民經濟的生產式樣上起了一大變化的所謂「產業革命」的誕生，却至早須待諸明治維新廿五年後的中日戰以後。明治維新以來已有各種「經濟革命」的實行，已在上面詳述過了。但此等「經濟革命」，不是為當時的經濟的實情的先驅的法制上的變革，便僅是由自給自足轉向商品生產經濟的變革；其結果，當然也有顯著地促進產業革命的進行的效果，可是尙沒有引起經濟的生產式樣變為機械制工廠生產化的所謂「產業革命」。又明治維新之後未久，以官辦工廠為前鋒的產業的原動機械乃至工廠化之運動，也曾在官民之間有過盛大的嘗試。但中日戰前

此等官民努力的結果，尙未能出試驗期或準備期以上。因當時的日本，其於產業的機械化爲必要的環境的尙未成熟，正如後述。但如紡織業，則自明治二十年前後起就早已釀成了產業革命的氣運了；可是此等結果的在實直上成爲了「產業革命」而公然使國民經濟的生產樣式起變革，直在中日戰爭之後。

那麼中日戰後日本爲什麼突然發生所謂「產革命業」呢？其詳細的理由，至本章第二節中詳述，這裏且先把日本的國民經濟在中日戰爭以後初次受到產業革命的洗禮的一具體事實加以概觀罷。但最能全般地表示出產業的流系的材料，因當時的統計不完備，除間接地求諸輸出貿易的內容的推移外別無他法。日本的產業的機械化，是以輸出爲中心而進行的。日本的向國內消費，在因了從前的封建的遺習，而尙未成熟至適合於大量生產的銷路的以前，國外銷路早已給她開闢了大量生產之途了。因此之故，日本產業革命的進行，在輸出貿易的內容中反映得最明瞭。下列第一表，是根據上述的理由，以表示產業革命的推移爲目的而作成的。

(第一表)由輸出內容看到的產反業映表

輸出全計金額之重要內容

平均

輸出全計
額

原產品

原產品

小工場
的製品

%

對於同上之輸出金額百分比

小工場
的製品

小工場
的製品

%

明治
一、一、五

千円
五百六〇

千円
八四七

千円
二五

%
○・五

%
○・六

一、一、五

千円
五百六〇

千円
八四七

千円
二五

%
○・五

%
○・六

一、一、五

千円
五百六〇

千円
八四七

千円
二五

%
○・五

%
○・六

一、一、五

千円
五百六〇

千円
八四七

千円
二五

%
○・五

%
○・六

一、一、五

千円
五百六〇

千円
八四七

千円
二五

%
○・五

%
○・六

明治
二、二、五

千円
五百六〇

千円
八四七

千円
二五

%
○・五

%
○・六

明治
二、六、三〇

千円
五百六〇

千円
八四七

千円
二五

%
○・五

%
○・六

明治
三、一、三五

千円
五百六〇

千円
八四七

千円
二五

%
○・五

%
○・六

明治
三、六、四〇

千円
五百六〇

千円
八四七

千円
二五

%
○・五

%
○・六

明治
四、一、四四

千円
五百六〇

千円
八四七

千円
二五

%
○・五

%
○・六

明治
五、一、四

千円
五百六〇

千円
八四七

千円
二五

%
○・五

%
○・六

明治
五、八

千円
五百六〇

千円
八四七

千円
二五

%
○・五

%
○・六

明治
九、一、二

千円
五百六〇

千円
八四七

千円
二五

%
○・五

%
○・六

明治
一、三、一五

千円
五百六〇

千円
八四七

千円
二五

%
○・五

%
○・六

由第一表看，則最能指明「產業革命」的進行的「大工廠製品」的輸出，較明治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間的平均輸出已大有激增。即若把明治二十一—二十五年，二十六—三〇年，及三〇—三五年各相比較起來，則其金額由八十一萬七千圓及五百五十二萬三千圓一躍至二千六百四十

六萬餘圓，對輸出全體的比率，爲由一%一三及四%四五突然增至一二%〇八的飛躍。而此種貨物的輸出，厥後與年俱增，在大正一一四年間已達約一億二千三萬圓，即一九%九八；至大正十三——十五年，實已激增至六億二千三百萬圓，即三〇%三六。由此可知，在中日戰爭以前，日本，尙未有可道的代表產業革命的輸出品，至中日戰役以後，才激劇增大起來。

日本的產業革命的以中日戰爭爲界期而產生，更由爲日本產業革命的中心的棉紗紡織的征服舊日的手紡車也約以中日戰役爲界期的一點上，也可實證。例如依鐘淵紡織公司的井上潔氏於大正十四年八月在神戶高等商業學校講演的題爲論我國的紡績事業的速記小冊子中，也以明治廿七，八年爲產業革命的界期，他大致說道：

『說到舊日是用怎樣的方法去作出第一步的棉花耕種，至第二步的紡織，第三步的織布，及最後的裁縫之間的工作的，則最原始的方法，一切均依藉一家族的手工，把自己種的棉花紡爲棉紗，在自己家裏織爲木棉，在自宅中裁縫。至於那些自己不種棉花的人，即商人，職人，或農民之自己不種棉花者呢，他們大致收買現成的木棉的織物，在自己家裏縫成衣服，以供穿用。即自最初的種棉以至最後的裁縫，都在一家族中作成的。此形式，大致直遺留至

明治二十七、八年的中日戰役前後。……

日本的以中日戰爭爲界期而產生了產業革命，更可由以近代的產業的特徵的工銀勞働者爲對象的勞働立法，也於是時方始具體地成爲了朝野的問題一事中想見。當時的情形，可由當時爲農商務部次官（由明治廿七年一月至三十年四月）的金子堅太郎在其所著經濟政策中所述的容易看到。

『當明治二十四年農商部對全國的商會諮詢關於職工保護取締法的時候，除了堺商會外，都異口同聲答辯道，「我國自古以來，雇主及被雇者間的關係十分圓滿，如父子主僕一般的親密，故別無以法律取締的必要」。而當時的諮詢，僅止於有無發佈職工取締條例的必要的概括的詢問。

自廿三四年以來，器械工業大爲發達，若實地去一視察各地製造所的工場中的勞働狀況，則發見了在廿四年各商會所報告的，僅適當於各戶製造所，至於機械上的製造，即大規模的工業，已大異其趨勢了。

於是，乃研究歐洲的工廠條例及工業取締規則，其目擊到工廠的實狀的人，更憂到日本職工

的現況將陷於歐洲五六十年前的狀態，希望有職工條例的發佈……」

故明治廿九年十月的農商工高等會議席上，有「職工條例案」的具體的諮詢。以此為始，勞動法遂成了朝野的實際問題。但它的終於立法為「工廠法」，則由於明治四十四年三月十八日法律第四十六號；其見於實施，更是大正五年九月一日之事。

但在中日戰爭以前，政府就已處理過職工問題，這是由上述金子堅太郎氏的引用文也可明瞭的。即他說到了當時的產業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但當時產業發達的特徵，為專是手工的家內工業，沒有為「產業革命的特徵的應用原動機的產業。此層，由前揭第一表的「小工場的製品」的輸出額在中日戰爭前遙大於「大工廠的製品」一點中也可看到。例如前者已示三百八十八萬餘圓，後者僅不過八十一萬餘圓。

(B) 產業革命的進行及其質的進化

日本的產業革命的以中日戰爭為一界期而實現，由上已不難了解其大略了罷。那末此產業革命後來是如何進行下去的呢？概觀之，則後來「產業革命」，真是風起雲擁席捲日本全經濟界。其內容，是大致分了下述的三大區域而完成了其質的進化的。

一、由中日戰後至日俄戰爭。

以棉紗紡織，生絲縲製為中心而發展，以女工童工等低廉的勞力為基礎。所以製品是十分初步的「粗工的加工原料品」。

二、由日俄戰爭後至歐戰。

中日戰爭後發達起來的近代工業，即纖維工業，更作一般的進展，由粗工的加工原料階段進至了粗工的製品階段。其他的工業也有此種傾向的進展，『合併』等等頗風行，工廠則顯然大規模化了起來。他方更有明治四十四年的關稅自主權的恢復。恢復的結果，便有保護關稅政策的實施；機械工業及化學工業，乃在其庇蔭之下發達起來。加之電力之普及漸盛，依藉電氣化的小工廠的原動力機械化之傾向也漸出現。

三、歐洲戰爭之戰時及戰後。

作中日戰後產業革命的先鋒的纖維工業，後更完成了它的質的進化，由粗工的製品階段擡頭到精工品製造的最高位。在日俄戰後才一般地抬起頭來的機械工業，化學工業等，或確立其事業的基礎，或由粗工階段進昇至精工階段，或得到了產業的獨立（向來材料

之一部乃至全部非得仰求於外國不可的，至此已能全部在內地製造）。電力及汽油（Gasoline）機關的普及；至此也更形普遍化，和工銀的騰貴相俟，工業乃得更普遍地動力化起來。且向來被置留放在原動力的圈外的農業，水產業，家庭生活等，也受到了動力化的波濤的打擊。這時生產的集積及資本的集中，顯著地高度化了起來。

關於以上的較詳細的情形，預備在本編第二章及第三章中依次具體的地說明；這裏先插入下列第二表，以之爲概示的具體的事實，於全體的觀察的充實上，這是很有效的罷。

同上百分比（以纖維品合計為一〇〇）

(A) 計輸出全體的比率

明治三一 三五年	大正 一四年	大正 一五年	明治三一 三五年	大正 一四年	大正 一五年
夷·元 九·八三	九·七一 一·六五	九·六二 一·五七	夷·元 九·八三	九·七一 一·六五	九·六二 一·五七
八·六 一·三三	八·五 一·二七	八·四 一·二一	八·六 一·三三	八·五 一·二七	八·四 一·二一
六·三 一·三三	六·二 一·二七	六·一 一·二一	六·三 一·三三	六·二 一·二七	六·一 一·二一
三·七 一·一一	三·六 一·一一	三·五 一·一一	三·七 一·一一	三·六 一·一一	三·五 一·一一
四·九 一·一九	四·八 一·一九	四·七 一·一九	四·九 一·一九	四·八 一·一九	四·七 一·一九
四·四 一·一四	四·三 一·一四	四·二 一·一四	四·四 一·一四	四·三 一·一四	四·二 一·一四
三·六 一·一四	三·五 一·一四	三·四 一·一四	三·六 一·一四	三·五 一·一四	三·四 一·一四
二·八 一·一四	二·七 一·一四	二·六 一·一四	二·八 一·一四	二·七 一·一四	二·六 一·一四
一·八 一·一四	一·七 一·一四	一·六 一·一四	一·八 一·一四	一·七 一·一四	一·六 一·一四
一·三 一·一四	一·二 一·一四	一·一 一·一四	一·三 一·一四	一·二 一·一四	一·一 一·一四

第二表，是依進化的階段而作成的。在日本輸出品中與生絲相對立着作二大支柱之一的棉類輸出品的分類。此項棉類品工業的顯著的發展，其對於輸出全體的比率示現了長足的增大一事，也可明瞭地看出，例如在明治二一——二五年僅不過是輸出全體的〇%五八的，至明治三一——三五年便激增至一三%三三，至大正一三年——一五年更飛漲至二六%五〇。觀其內容，此時也有顯著的質的進化。例如若假定上面的棉類輸出品合計為一〇〇而視其各內容所占的比率時，則粗棉紗及搖紗，在明治三一年——三五年間實有七六%餘，但至大正元——四年，已減少至四五%，於大正十三——十五年，遂慘降至五%六二，殆已絕跡。但這時的粗紗布，則由明治三一

——三五年的僅僅八%一八，至大正元——四年飛躍至二三%六三。又寬緊織品，漁網，毛巾等部類，也有相同的推移，此即自日俄戰後至歐戰前的期間中日本的棉紗紡織事業。已由粗絲製造的粗工業階段進步至以粗絲為材料的紗布，寬緊織品，毛巾等製品的更高一級的階段的質的進化的反映。但經過歐戰之後，此種粗紗紗布突然轉為漸減，代之而起的印花布，被單類，並細紗瓦斯紗類的屬於精工業的部類的比率，增大了起來。例如印花布被單類的比率，先僅由明治三一——三五年的四%三九增至大正元——四年的一〇%四六，至大正一三——五年，便一躍增至三九%二六。這就是紡織業在歐戰戰時及戰後期間中由粗工製品向精工業成就了質的飛躍的反映。又詳情請參看別揭第二表的統計。表現於棉紗紡織品生產中的上面的質的變遷，雖有多少之程度之差，也已指明了產生於別的產業中的產業進化的流系。

第二節 供給產業革命以食料的資本的調度

(A) 產業革命與資本調度的重大性

產業革命的實現，至少須具備三個根本條件。(一)能消化大規模生產的廣大的銷路的具備。

(二)工銀，利息及其他生產諸條件，須成熟至動力工場的生產較有利於手工的生產的程度。但祇此產業革命尚不能實現。此外(三)若無供給機械及工場設備及開工時必要的資金的資本供給，還是無用的。(一)至(三)的條件，各自交互作用，此條件使其他條件，或他條件使此條件形成熟起來。例如資本的供給愈豐富，利息便愈低下。故利息在十分的高率的時候企業無由成立的事業，到降至八分的時候企業便可能了。又如祇要工廠設備先辦到了，其製品的銷路是能由實力的後盾而容易地開拓的。

但在先進國呢，他們是先有以上的諸條件的成熟之後，然後被此等諸條件所刺戟而機械才發明的。卽先進國的產業革命，是以機械的發明為主動的。但日本則托先進國之福，機械其物，自明治維新當初起已早就得到自由的供給了。祇因能利用它的上述諸條件未曾成熟，有等待一下的必要。這是日本的產業革命和先進國的大不相同的根因之一。且後進國欲一方和先進國的競爭相抗爭，而希望產業革成功，除以上的條件之外，尙得另具與先進國的產業競爭時為有利的條件(必要。在日本這便是工銀的低廉)。

依理此地應是產生日本的產業革命的已述三大條件的說明了，但此處為說述的便利上，先述

(三)的資本的調度，(一)則讓至次節，(二)讓至第四節再說。因為日本產業革命得能在中日日俄兩戰役後的期間中實現的最強大的要因，我覺得與其是(一)與(二)，無寧應置於(三)的資本供給的豐富化上。(一)的銷路的擴大的要因，依理是先於(三)之資本供給的最重要者。但事實上中日日俄戰後產業革命的實現，銷路的擴大並無重大的關係，正如次節所述的，實在說，不待中日戰爭之後，銷路擴大之鍵早已被日本經濟界握得了。當時棉紗的輸出，在明治二十三年，中國方面銷路的開拓早已成功。又在國內，因鐵道的普及銷路的將擴大也早已預料到的。但當時雖有此等要鍵而不能開銷路擴大之門的，重大理由，在於資本的缺乏。看罷，明治廿三年的恐慌，不就爲了此嗎？又明治廿三年對中國的棉紗輸出的銷路雖辛苦開拓了，而仍無特別的發展者，不是因爲資金不足嗎？在產業革命進行之際日本經濟界最感苦痛的，不是不是銷路不足，而是資金不足嗎？明治三十年及三十三年的二次恐慌的並非基因於銷路的狹少而完全根因於資金不足，是很明瞭的。例如適於是時辭去了農商次官的金子堅太郎在明治卅一年十一月如下說道：(據氏所著

經濟政策)。

『現在隨朝野的事業的膨脹，財源已告枯絕，加之在欲各種事能業生收益，至快尚須數年的

今日，惟有由銀行輸入外資，以救目下之急……。今日雖是前途有望之事業，因資本缺乏而遇到不能收集股款的困難，結果遂迫不得已而停止事業的頗多，其中更有許多七八成既已成功了的鐵道……。』

明治三十三年的恐慌，也復如是，例如是年五月的東京銀行通信錄上記述道：『當金融緊迫，經濟漸將陷入困亂之際，經濟研究會及有樂會一派之間議定了種種救濟策。其重要者，有下列數項。

- 一、因欲開外資輸入之途，政府在公債上記了名，以便海外推銷。
- 二、許外人以土地所有權。
- 三、以鐵道爲國有，以之爲担保而輸入低利之外資。
- 四、節省勞働社會的浪費，開貯蓄之途。
- 五、設綱布稅，以之爲新興的國家生產事業的補助。

以上是關於中日戰役後的事實，但日俄戰後，也復同樣。例如明治四十年以後的財界反動的根因，與其說是基因於鋪路的不足，無甯應視爲完全基因於資金的不足。凡此，正如在前編中已

說過的，可由當時此種恐慌及反動的整理均得藉不足資金的供給而實行一點上容易想見。其可由另一側面證明的，是和大正九年的反動的對比。即大正九年的反動，完全基因於銷路之不足。但即在大正九年的反動之整理中，也以仰求資金的供給於政府爲必要的。但這完全爲了整理滯貨，和中日日俄戰後的主以產業經營上不可缺的流動及固定資本的供給爲必要，是大不相同的。

由上所述，雖然十分簡單，已不難想見中日戰後日本的產業革命的實現的如何有負於當時在其實現的進行上爲必要的資本供給之道的開發了罷。

(B) 賠款及外資流入的資本供給

在日本的產業革命期的中日日俄兩戰役後的財界中給日本的產業以最有異彩的影響的，恐是賠款及外資的流入罷。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中日戰後的企業勃興。是以由中國交來的三億六千萬圓賠款爲主要原動力而發動起來的。但至企業的勃興漸漸急激時，三億六千萬圓的賠款一會就被用盡，及至明治三十一年，因了資金不足之故，連前途有望的企業，也不得不在半途停業的事實層出，這是在前節中已說過的。於是，爲救資金不足之急，由朝野高喊起來的，已如在前節中所引用到的，是外資輸入論。因像等待國民的積蓄那種迴遠路，到底是遠水不救近火罷。

一向怕着外商的內地侵人而主張不應允許外人以土地所有權的日本資本家，因長此堅守將成爲外資輸入的障礙，至明治卅四年，遂以東京總商會爲代辦者，議決給與外人以土地所有權及鑄業權。事前經過許多沸騰的議論而終於明治三十年改從前的銀本位幣制爲金本位的英斷，其主要理由之一，也是想由此使歐美的金融市場與日本的相結合，以便外資的輸入。又明治三十五年創立特殊銀行興業銀行的重要目的之一，也在於想藉此促進外資的輸入。由上已可容易地想見當時的日本怎樣熱誠地渴望着外資了罷。因爲若無外資的輸入，培植當時的產業革命的長足的進展的資本便無由設法。

例如祇一視中日戰後企業勃興的固定資本需要額之中，其以由外國的輸入爲必要的金額，依當時財政部的調查，明治三十年末爲一億另三百萬圓，此外尚有由明治卅年以後至四十四年的預定支付額三億二千四百餘萬圓，合計爲四億餘圓。此外國內的預定支付額，同時期間爲一億五千四百萬圓及三億四千四百萬圓，合計約得五億圓。即假定國內支付的材料代價就算能自給，（實際上其中不少部份也是賴於外資的援助的）上述的四億餘圓的材料，若不藉外資供給中日戰後的產業革命的進行還是不可能的。

日本的外資輸入，發端於明治維新以前，各藩主的藉此以彌縫財政。明治政府亦於明治元年向外人借入八十八萬圓，以濟一時之急；其次明治三年，更募四百八十八萬圓（合今日之九百七十六萬圓）的外債。充東京橫濱間的鐵道建設費；更於明治六年，募一千一百七十一萬圓，（合今日之二千三百四十二萬餘圓）的外債，用作武士族家祿的購買資金。其後外資的輸入便完全中絕。因當時被東洋諸國及埃及等因借債亡國的實例所刺戟，極為鄭重。故連中日戰爭時的軍費，也是全部仰求於國內的。然中日戰後的企業勃興及進行時資金之大缺乏，從新又使痛感到外資輸入的必要，金本位制的採用。先除去了向來為外資輸入的經濟的（不是政治的）一大障礙的由彼此幣制差異所起的危險，（因歐洲為金本位制，日本為銀本位制。兩者間的匯價每日有不少的變動）採取了已述的各種外資輸入促進策。

那麼此等努力的結果，到底有若干外資的輸入呢？日俄戰爭以前，外資的輸入僅限於政府的借款，（但這要不外是政府代民間輸入資本）。且也不過明治三十一年的四千三百萬圓（日幣軍事公債的蓋印出賣）三十一年的九千七百六十三萬圓（第一次四厘利英幣公債）三十五年的五千萬圓（日幣五厘公債的蓋印出賣）三種合計一億九千〇六十三萬圓；此外政府以外，祇有地方債的四百餘

萬圓。可是在日俄戰爭以後，外資輸入額突然飛增，且其範圍也顯然由政府普及至於民間關係。

總之，自明治三十年以後至以日俄戰前的約一億九千五百萬圓的外資輸入，已給了當時陷於極度的資金缺乏難中的日本產業界不少的生氣。但和日俄戰時及戰後的外資輸入的旺盛一比，或與當時的官民的拚死的努力一較，則中日戰後的外資輸入，真太貧弱了。為什麼呢？第一個原因，是日俄戰役前日本的民間事業公司等的對外信用尚很低。例如大隈伯於明治三十三年一月在東京銀行俱樂部如次演說道：

『現在政府以外的人能借（在外國）百萬鎊以上的借款的，是銀行嗎？說起來很失禮，我覺得是十分困難的罷。任是如何賣老，日本的商業公司及銀行尚無如此信用。……自前年起就聽到有人說，日本鐵道方面，濫澤子等人很努了力。其他私人的熱心者，也頗努力，但什麼時候都似成非成。沒有良果。內外經濟共通等話，真不知是什麼理由！……』

但當時的外資輸入所以遲遲無進展的理由，此外尚有重大的原因。例如近藤廉平氏在明治三十四年五月號的銀行通信錄上，舉出下列四點，作為美人在日本放資的困難原因。我們在此把它引用一下，恐是很得機宜的罷。

『一、日本的法律不許外人有土地所有權。

二、日本的法律繁瑣，各種手續麻煩。

三、日本人對外人不給與資本持有額所應派的權利。

四、日本有遲早與俄國開戰之虞』。

恐怕外資的輸入在日俄戰前所以不能和日本的官民的努力相稱應而如此缺少的最大理由，是上面的最後的理由『有遲早與俄國開戰之虞』罷。發端於中日戰後的「三國干涉」的兩國的戰機，以明治三十三年的義和團事件爲導火線，俄國占領滿洲，並伸其魔年至北韓，事局逐漸迫了起來。此時由於對於東方侵略的英俄爭霸的戰略上，英國終於與日本攜手，決定由日本單獨去抵當俄國的政策。英日同盟於明治三十五年成立。（一月卅日簽字，二月十一日發表）至此，日俄的衝突乃愈緊迫。外人在此種狀態之下不願向日本投資，是當然的。

而日俄戰爭，與起初世界的預想相反，成爲小小的日本的「大勝利」。於是日本的國際的地位乃一躍而列所謂「等國」。外國資本家對於日本及日本人的信用的倍增，是不必說的。加之明治四十四年的保護關稅的實施，產生了以在日本設立工廠而作生產爲有利的新事態，大大刺戟了外

人的直接放資。日俄戰時戰後的源源的外資的輸入，是這麼產生的。例如日本的外資輸入額在明治卅六年未僅為一億九千五百萬圓，至卅八年未漸增至十四億一千四百餘萬圓，（大部份由於軍事公債的增大，但實質上却是轉化為產業資本的）至大正二年末，遂飛躍至十九億六千九百餘萬圓。其內容，在明治三十六年未全限於政府公債的，至日俄戰後便在（一）民間公司的公司債，（二）地方債，（三）外人直接放資等等中告了激增。例如在明治三十六年未，（二）為四百餘萬圓，（一）及（三）可說沒有的，到了日俄戰後就大大增大起來，到了大正二年末，（二）為一億七千七百餘萬圓，（一）為一億六千六百餘萬圓，（三）為二千六百餘萬圓，合計達三億七千萬圓之巨額。而政府的外資輸入，結果也把大部份轉借於內債，或以之為歲出，支付與民間，供給了日本的財界以豐富的資金。這是由明治廿九年到大正二年的十八年間日本的入超雖達十億二千五百萬圓（特別輸入在內）之巨額，仍能支付之後尚綽綽有餘，產生了明治四十年的四厘利標準的低利息時代的根本原因。

中日戰役後急激的產業革命的進行得到了必要的巨大的資本的培養，以決河之勢進展下去。當時若無如上的賠款及外資的輸入，則日本產業的進步的必因資本不足而遲延下去，是不必多說

的。故外資的輸入，在中日戰役後的日本產業革命上有絕大的作用。但日俄戰後的外資輸入，却不僅止於資本的供給。此外並和外資同時帶來了許多產業發達上必要的「技術」。例如芝浦製作所和美國的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合辦而移入其技術，東京電氣有限公司的與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特約而移植入電燈泡製造的技術，驅逐了輸入電泡，又日本製鋼所則與英國亞姆司屈洛公司及維卡茲公司相提攜而輸入其技術，等等，為其最有名者；其他在各種事業中，均多少和外資輸入同時發生了此種技術的輸入。

C 金融機關的整理及發展

培養中日俄兩役後的日本產業革命的進行的中心財源，已如(B)項所述，為外資的輸入。但僅是此，當時的產業革命當然不會如此急速疾驅的。此外日本的金融機關和外資的輸入同時有顯著的整備發展。能在最高能率上利用輸入的資金及內地積蓄起來的資金。也演了不少的重要職務。先看金融機關的整理，則以中日戰役為界，一向為「發券銀行」的國立銀行，得能完成整理，轉化為「存款銀行」。同時銀行的存款吸收的必要，也高呼於朝野。總之。當時的日本各銀行，秉發券銀行時代的遺風，與其自己去吸收存款，無寧在必要時以低利向日本銀行借入，高利

貸出，藉取兩者間的差額收入，這是一般的風尚。但和國立銀行的「存款銀行」化同時，銀行的「差額收入」，漸成朝野非難之的，至此銀行才舉全力於存款的吸收。當時的情形，可由財政部銀行監督局長添田壽一氏於明治卅一年五月在關東銀行會第六次定式集會上所說的話中容易推想到。

『……但願諸君今後稍取自立獨步的精神。即在手段上，請稍稍盡力於存款的增殖。欲增存款，則利率的提高，也是必要的。總之請使一般公衆發生信用銀行的念慮。……』

及至各銀行均注全力於存款吸收後，向來死藏於各都鄙的家庭中的許多資金，至此均成爲金融資金，起了供給日本產業發達上必要資本的作用，是無庸多說的，且三十二年三月日本銀行的保證準備紙幣發行額由向來的八千五百萬圓一躍擴張至一億二千萬圓。日本金融市場的資金供給力得以激增。更由勸業銀行（三十六年六月創立）農工銀行（自卅七年七月創立於各地）興業銀行（卅五年四月創立）等特殊銀行之創設。土地，房產股票等的融通性大爲向上，產業發展上必要的資本供給。也圓滑了不少。這時普通銀行也大爲發達，故金融機關的實力突然增厚。例如把明治廿六年及四十年加以比較，則對總行的一〇〇家，分行由四八增至一〇八家。已收資本及公積金

合計由一億二千四百萬圓增至五億八千四百萬圓，人民存款由僅僅的五千一百萬圓增至十三億七百萬圓。其中人民存款的激增之大。真值得一驚。銀行的對人民放款額。也隨之激增，同期間內由九千三百萬圓躍進至十五億八千七百萬圓。即財界此期間中由銀行所供給的資金，已激增了約十五億圓。此發展率至歐戰戰時及戰後而更增，大正十三年人民存款膨大至一百億萬圓，人民放款增至一百廿一億圓。由此已可容易看到銀行的發達所貢獻於日本產業發達之爲如何偉大了罷。

在銀行的放款力作了如此一大飛躍的裏面，除存款的激增之外，更潛伏着值得注目的金融制度的發展。即由於票據交換的發達之票據利用之增大，如票據經紀人 (Bill broker) 及折款 (Call loan) 交易等等之發達便是。例如日本的票據經紀人，創始於明治卅二年。折款交易，則開始於明治三十五年。銀行得藉此大大提高其資金的運用率，產業界則更使資金的供給豐富起來。又票據交換，明治十二年十二月已創始於大阪，東京也於廿年十二月設立起來。但其機關的漸漸普及於全國主要都市，且其機能得能充分發揮，爲中日戰後之事。例如全國的票據交換額，明治廿六年不過二千三百萬圓。至三十年七億四千一百萬圓。卅五年廿八億九千萬圓，四十年七十四億四千八百萬圓地以可驚的速度發達起來，此時的票據交換所，也由明治二十六年的二所增至四十年

的七所。其增加率經過歐戰戰時及戰後。更飛躍了上去。

票據交換額的激增，是表明所謂「存款利用」的以銀行爲媒介的可驚之增大。再詳細一些說，即藉銀行機關的作用，使商品財發生貨幣資金之效用的數量。產業則得到與資金的豐富的供給同一的效果。這一點。說明了上述銀行的人民存款在日俄戰爭中一躍作了可驚的激增的財源在什麼地方。即當時由明治三十年至四十年的十年間。銀行的人民存款由二億七千萬圓至十三億七百萬圓地激增了十億三千七百萬圓的理由，並非藉外資輸入而金銀貨幣增大起來的，（一部份當然是的）其大部份，是由銀行的「存款通貨」的造出機能之發達。把商品及其他物品及土地等貨幣化，使之變爲存款。

此外，在中日戰爭後，供給了日本產業界以不少的資金的，有人壽保險公司。因由金融的視野看起來，人壽保險不外是一種貯蓄機關，但和銀行存款及郵政貯金不同，資金的運轉十分自由，其不少部份，是被利用爲產業資本的。其責任準備金，在明治三十年僅不過五百萬圓的，至大正十一年膨大至八千九百萬圓，大正十四年增至六億八千一百萬圓。

(D) 股份及公司債制度的發展

培植中日戰爭以後日本的產業革命的進行的資本供給。此外依賴於股份及公司債制度之發達之所，也頗不小。其中股份制度實創始於明治五年第一國立銀行之設立時，後來在明治十一年及十九年以後的企業勃興之際，大大普及了起來。組股份公司制度的一般化，却非得等待至中日戰役以後不可。因為最先規定了公司法的商法的實施，為明治廿六年，以前，公司法尚未決定，因之因了責任的歸屬，不時發生爭端，一般人對此尚有不少疑懼。又與股份制度的發達不可分離的股票交易所，其制度能漸臻整備，股票交易漸形發達，也是廿六年交易所法改正公佈以後之事。現且一視其公司（股票等之合計）的已收資本。（廿六年為公債資本）則明治廿六年尚不過一億九百萬圓的，至三十年五億圓，三十二年七億圓，大正元年十八億圓。大正十四年一百十六億圓地增加起來。其飛躍的大部份，是在中日戰爭之後。

公司制度（差不多全部為股份制度）有了著大的發達的結果，近代的產業的創始便大覺容易了起來。因為有此制度，便能從國民的大多數募集另細的資本，聚為一起，容易調度巨大的資本。在中日戰爭以降的產業革命進行的舞臺上股份制度的發達所演的職務的為如何重大，由上已不難看到了罷。

使資本的供給豐富及容易起來，且於中日戰後的產業革命進行上作了多大的貢獻的，除上述之外尚有公司債制度的發達。日本公司債發行的嚆矢，為廿三年四月大阪鐵道公司的議決公司債廿六萬八千五百圓的募集。但當時的公司債，由舊商法的規定。（廿三年三月發佈，廿六年修正七月一日實施），是記名式的。因此之故，就在三十二年三月修正商法發佈之後，公司債尙未能一般普及。但至明治卅八年，担保信託法，鐵道抵押法，工廠抵押法，礦業抵押法公布，是年七月一日實行。至此日本的公司債才有了空前的發展。惟此前為公司債之一種的「債券」的發行，於三十一年六月已有勸業銀行債券的第一次募招，以後農工銀行等，各自發行「債券」，使事業資金的供給豐富容易起來。又三十七年九月，有貯蓄債券的第一回出售，故公司債的普及，是徐徐進行的。

總之經過了上述的經緯，日本的公司債制度以後有長足之進步，大大使產業資金的供給豐富，調度容易起來。現試一觀其數字，則公司債總額（債券也在內）在明治廿六年僅不過八百餘萬圓，至明治三十三年為約二千六百萬圓，大正元年為三億六千八百萬圓，大正十四年廿七億一百萬圓地累年作了可驚的膨脹。最可注目的，是本來日本的公司債的發達，始初是以鐵道事業為中

心的，但至日俄戰爭以後，銀行債券（勸業銀行，農工銀行，北海道拓殖等特種銀行所發行的）較普通公司債更大地增大了起來。可是到了歐戰以後，一般事業公司的公司債突然激增，示二度凌駕銀行債券之傾向。此外在敍述公司債的發達時不可輕輕看過的，是日俄戰後一般公司的外資輸入頗為旺盛。關於此，本節(B)項中已說到過，這裏不再重複。

第三節 產生產業革命的商品銷路的膨脹

(A) 日本產業革命和商品銷路的重大性

日本的以中日戰役為界期而產生了產業革命的基本的原因，要不外在於日本的商品銷路在當時大形膨脹。為歐洲產業革命的根本原因的機械的發明，對於日本的產業革命的進行上即說之曰全無直接關係，也不為大錯。因為日本的產業，在明治維新後，和脫離了封建制度的桎梏同時就接觸到此等精巧的諸機械的。可是自明治維新以來的約三十年中日本的國民經濟未能受到產業革命的洗禮的原因，要不外第一必需設備上必要的資金的不足（已如前述）及第二的缺少消化為產業革命的特色的「大量生產」的商品銷路。

中日戰爭以前日本的產業的所以未能擁有適合於大量生產的商品銷路的事由，約有二端：

(一)內地的國民經濟尚未脫離封建時代的「自給自足」時代之域。所以國民消費的大部份，不表現為「商品」的需要，而是以「自給自足」品來供給的。不必說，這是消化大量生產的需要的缺乏。(二)是國外輸出的尚未發達。歐洲產業革命本身的基因，要不外在於輸出的激增。不外因欲最有利地應國外輸出的增大的需要而才有機械的發明的。總之，為產業革命的必須條件的整批的商品的需要，在產業的資本主義的發達的初期，大部分必求之於國外的輸出。(但如美國那樣為完全的新開國而領土廣大者，又當別論)但在中日戰前的日本，其輸出銷路在維新後雖着着增進，仍屬十分有限，且又全為農業品，不是工業品。

但以中日戰爭為界，對於日本產業的內外兩方面的商品銷路，尤如製造品銷路，因後述的理由。勃然膨脹了起來，而國外銷路的擴張，尤為特徵。商品既一度增大後，國民經濟便加速度的地增高商品需要。為什麼呢：因國民的自給自足，經濟，因商品生產的有利化，終於解體，各人所需要的，均得求之於市場。加之內地的鐵道及其他交通機關的發達，一方促進「輸出」一方更縮少國民經濟的「自給自足」的範圍，增大商品需要。以中日戰役為界期的產業革命的出現，不外是

乘此種商品銷路的膨脹而起來的。但產業革命自身，又反轉成爲了商品銷路擴張的原因，兩者互爲因果，大大促進了產業革命，這是無庸多說的。

(B) 國外銷路的顯著的膨脹

中日戰後商品銷路的顯著的膨脹，基源於內外兩市場的開拓，已如前述，但其原動力及中心又是什麼呢？這無疑是應歸之於國外輸出激增的功效的罷。例如日本的輸出，由明治二十二五年平均的七千二百六十萬圓，由明治四二年至大正二年間平均實已告了五億二千一百餘萬圓的七倍餘的激增。此輸出激增，有二大區別。(一)是生絲及其他農產關係品的激增，(二)是紗布諸雜貨等的工業品的激增。(一)是專對歐美的輸出，(二)是專向中國朝鮮及其他東南洋方面的輸出。其中(一)之輸出激增，專基因於生絲的激增，由織絲業機械化的促進日本的產業革命得大被促進，此外日本的國民經濟，也因此而由「自足自給」經濟進化至「交換經濟」，其使內地商品需要激增的效果，頗非淺鮮。可是爲中日戰後日本產業革命的直接主要原因的「輸出激增」，與其說之是(一)，無寧是(二)，即對於中國朝鮮及其他東南洋的工業品的輸出增大。因爲(二)的輸出增大了後，近代的工業製品的銷路才直接擴大，於此產業革命之道。方能由輸出貿易之側面打開。因

爲若無（二）的輸出激增，是不能由輸出的側面發生可道的產業革命的。

現試一觀代表日本近代的工業品的輸出（除生絲）的對於亞洲的輸出額，則由明治二十二五年間平均的一千八百萬圓。於明治四二年至大正二年間飛躍至二億三千一百萬圓，其間的增加額實爲二億一千三百餘萬圓。其於輸出全體中所占的比率，於同時期中也由二四%增大至四四%，示明了日本輸出品中近代工業品所占的比率的更臻重大。

欲明瞭中日戰後日本近代工業品輸出激增之實情，不妨一觀從輸出全體中除去了在此期間中作了長足的發達的，專對歐美的輸出的生絲的殘額在亞洲所占的比率罷。即依此而觀，則亞洲所占的比率，由明治廿一——廿五年間的平均四一%六四飛躍至明治四二年至大正二年的平均六三%二五。總之，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窺知中日戰爭以來在一般的輸出激增之中，也以亞洲（其中尤以中國朝鮮爲甚）的爲顯著。至於此等輸出激增的如何培植了日本的產業革命，不妨一視棉紡布業的輸出激增。例如依大正十四年五六兩月間鐘淵紡織公司的井上潔氏在神戶高等商業學校的講演，則更由別的觀點論述此點道：

『……織布工場的初次發起，在明治廿七八年之際，其後逐漸發達，至卅七八年的日俄戰爭

當時及至戰爭停止後，更有長足的進步。因日俄戰爭的結果，朝鮮滿洲方面日本的勢力非常發展，織布業者乘此機會，樹立了供給滿鮮所需要的木棉的計劃。彼處人民，衣服的顏色或黑或白，頗為單一，不像日本人的穿有花紋之物，因非常簡單，能作大規模的生產。他們着目在這種地方，乃在機械工廠中大大織出了專輸滿鮮的木棉。由明治四十三年至四十五年之頃，朝鮮滿洲的木棉，差不多全是由日本貨，美國貨漸次被驅逐，結果竟至斷絕。當時美國覺得此事非同小可，因滿洲的大主顧被日本的紗商所蹂躪，乃大唱滿洲的機會均等主義，或提倡南滿鐵道的祇對日本貨打折扣為不倫，說須改南滿路為共同經營等；但結果日本得了勝利。把美國的紗布驅逐了』。

(C) 中日戰爭以後輸出貿易激增的原因

那麼自中日戰爭以來。日本的輸出如此勃然激增起來的理由，又應向何處去求呢？其主要原因，大致可以歸結到次述諸點罷。

(一) 隨中日俄兩役而來的帝國主義的擡頭。

(二) 朝鮮對於商工立國政策的狂熱。

(三) 貿易機關在政府的保護之下的國外發展。

(A) 日本汽船的遠洋及近海航路的發展。

(B) 日本銀行的國外分行及支行的發展。

(C) 日本商人的貿易商權的收回。

(四) 原料輸入稅撤廢，製品輸出稅撤廢。

(五) 企業勃興的結果，生產過剩，乃在國外銷路中求出路。

中日戰爭以後日本輸出激增的第一主因，爲因了中日日俄兩役，用武力在中國及朝鮮預先開拓了經濟的發展的地盤。這影響，不僅被收在勢力之下的滿鮮，間接更由中國中部南部遠及於東南洋方面。因兩戰役的大勝的結果，對於國旗的援護的信仰大大增加，給了國人的國外發展很大的心理的援助。(下引用演說詞之一段，因意思相同，略去。——譯者)

日本的國外輸出在中日戰後突然飛騰了起來的第二個主因，爲「官民一致」的熱心的商工業國外發展政策。當時日本於中日日俄兩役之後，一躍而入世界的「頭等國」，夢想做東洋的「英國」頗被「國家的發展」慾所驅使，但既投入了當時漸露頭角的世界的「經濟的帝國主義」的潮流之中，

知欲滿足日本的「發展慾」，無論是主動的或被動的，僅是武力，是不夠的，此外商工業的國外發展的謀圖，最為必要。即兩戰役之後，所謂「戰後經營」的中心，已轉到商工業的發達，尤如國外發展之上了。此間的消息，可由在創立於明治廿九年的，為中日戰後的所謂戰後經營的參謀機關的農商工高等會議創立會席上農商務次長金子堅太郎氏所歷舉的該會議創立的理由的言辭中容易看到罷。

『第一，本邦的農工商實業，近來大有發達，內國人民的需要，已達能由自國的製造品供給的程度：以後更遇到了長足的進步的隆運，故實業家不滿於卓卓內國的商業，更惹起了進而謀把我國的農產物及製成品輸至國外，大大擴充外國貿易的思想。這便是於今日而欲計劃國家的經濟，則國外貿易，實為刻不容緩的理由。

第二，明治廿七八年中日戰爭的結果，世界上日本的地位，頓然一變，農工商的實業社會，亦面目一新，故歐美諸國的視線，均傾射於我國商工業，甚至抱了奪取數百年來為他們所專有的東半球亞細亞的市場的，是將來的日本觀念。故將來我國貿易之潮流，必與外國的貿易海相混同，國外經濟社會的波動，將立即影響及於我實業，和昔日已是大不相同了。

第三，此次與歐美各國改正締結的新條約的實施，也近在三四年之後；且外國政府爲視察我國的農工商業實況起見，特派委員來日，又歐美的商會及公司，也特派員渡航本國，觀察內地的農工商實況。及至在內地雜居之後，在我內地各要處經營事業之計劃告成之日。則必不出數年，我實業定必遇到與外國人在商工業社會中大爭輸贏的時機』。

日本朝野，斯時用盡各種手段，舉全力謀使日本的經濟登上世界商業戰的舞台。其中顯而大者，可列舉在航海獎勵法（明治廿九年三月發佈。同年十月實施）的偉大的援助之下開發了海外航路；與正金銀行以特殊的保護，使謀輸出入匯兌的便利，進而使之設立國外分支行以及改正關稅。以原料品之輸入爲免稅，全部撤去輸出稅等三事實。

先看與輸出入的盛衰關係最深的汽船公司的國外航路：在中日戰爭以前，向中國朝鮮等地的所謂近海航路雖已具備，至於遠洋航路，則除在廿六年開通的孟買航線外，可說絕無。以中日戰後的航海獎勵法爲工具，漸漸進出於歐洲，美國，澳洲，印度，南洋等地。這時近海航路在航行次數，使用汽輪噸數上的更臻發展，是不必說的。

更明瞭地指示，出中日戰後日本的海外發展政策的，是日本的銀行的國外分行及支行的發展

罷。現且一觀在政府的特別庇護之下率先在國外設立支分行的正金銀行的發展，則在中日戰爭以前，僅在紐約，里昂，倫敦，舊金山，檀香山，上海六處有支行罷了。可是以中日戰爭為界期，中國，印度南洋等地的支分行的行數，突然增大了起來。

以中日戰爭為界期，日本朝野的國外發展熱的在政府援護之下如何為積極的，已可由上述的金融機關及航路中容易看到了罷。同時被表明於金融機關及航路中的政府的國外貿易保護政策所刺戟，輸出大被促進的事情，也不難看到。結果的一側面，可由日本輸出入貿易中的「商權的收回」中容易看到。例如在日本的輸出之中，本國商人所經營的貿易額的比率，在明治廿六年不過一五%四九，至三十三年便增至三七%六，大正九年約七〇%，同樣，輸入在該時期中由一九%〇六躍至三九%三九及九〇%二〇。惟所謂「商權收回」的原因，除已述的理由外，因明治三十二年七月的改正條約實施的治外法權的取消，也是不可看過的。由此已不難窺到一向為被動的日本貿易至此已積極地活動了起來的事實罷。

以中日戰役為界期的日本朝野的商工立國主義，尤如輸出第一主義，也表明於關稅政策之中。例如實施於明治廿七年七月一日的棉紗輸出稅的撤去，廿九年四月一日起實施的棉花輸入稅

之廢止，是最可注目的標誌。其中棉花輸入稅的廢止遂劃了日本的農業利益被商工利益所克服的界期，頗值注目。原來棉花的輸入稅擴及問題，發始於明治廿二三年之頃，但大日本農會對之反對道，『事關農民福祉的消長，有辱國家之盛衰之虞，無容默視』，大大地起了反對運動，更有農學者團體農學會，站於別動隊的地位，也發表反對意見聲援之。直至乘中日戰後之商工立國熱，方得通過議會，於是日本的關稅政策對於原料品，確立了輸入無稅的根本方針，同時當時已有二百數十萬圓的收入的輸出稅，也由輸出獎勵的意味，於明治三十二年全部廢止。這關稅政策的改革的大大促進了日本的輸出，祇看到棉紗的輸出自那時以來突作一大飛躍的一事已很充分了罷。

但任你有如上的輸出促進的刺戟，若產業未有準備好適應它的發達，則輸出的激增，不必說是不可能的。可是事實上日本的輸出產業，被如上的刺戟及資金的供給增加所擁護，斯時已有長足的發達，一時無寧超過需要而發生生產過剩的事業，亦復不少。因謀解決此生產過剩之策，乃克服種種困難成為了開拓國外銷路的工具，輸出乃更形促進。說明斯時的實情最代表的事例，是紡織業的國外發展罷。例如紡績聯合會理事神坂靜太郎氏如下述道：（經濟家大正十四年九月一日號）

『明治廿三年的大恐慌，幸而以我國的紡績事業爲開頭，成爲了作方向轉換的一大動機。是年十一月紡績聯合會開大會，僉以欲打開難局，惟有圖銷路之擴張，議定銷路的擴張，除謀輸出外別無他法，全體會員的留意此點，歸結至將來的紗業方針，從國外輸出，即當時的情狀說。則除對華輸出外別無他法的結論，因之由聯合各公司中以六・七公司爲實行委員，由該公司等初次製造專作輸出用之棉紗，其樣本初次經三井物產公司之手而寄至上海；一方輸入專銷上海的印度紗樣本，作爲各公司的參考，又十家以上的公司相聯合輸入包裝機械：凡此，由今日視之，其幼稚得有些滑稽，可是當時該業者一致的熱心，實屬非常。一方紡織業者的向政府建議棉花輸入稅免除，也是同年中之事。棉紗輸出稅全廢的請願。於翌年一月提出。至二年後的明治廿六年，因與印度紗在內外市場上作競爭的必要上，與郵船公司締結印度棉花輸運契約，故當時的紡織公司，差不多把主力全注於對華輸出，其熱心的努力，實可驚服，同時該業的因增鍊一事而嘗到了怎樣大的苦痛，也可看到的罷』。

以上是中日戰前之事，我所以把它引在這裏，因欲傍證在中日戰役以前，已由生產的過剩，由資本家的見地，努力於銷路的國外開拓之一事。但至中日戰役以後，因中日日俄兩役後諸企業

的較大的勃興的結果，此種努力更形增大的時候，政府不僅對於紡績業，即對金融及其他，均增大其援助，不惜努力於俾易於國外銷路的開拓。

故日本的輸出，自中日戰役以來，在亞洲方面，以近代的粗工業品為主，對於歐美，則以生絲為主，由各方面增加其輸出額。

(D) 中日戰後本國用商品銷路之著增

培植中日戰爭以降的日本產業革命的，更有本國用的商品銷路之著增。而中日戰後內地的商品銷路著增的原因又分二種。(一)是國民生活程度的向上。(二)是國民經濟的由自給自足經濟向商品經濟的進化。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二)。國民經濟的能臻商品經濟化之原動力，來自內外兩方面。一是由於生絲、茶等輸出激增的農村生產的商品化，一是由於紡績業等機械製品之輸入乃至由於內地製造增加的農家自給自足品之衰退。因為與其自給的地生產各戶的必要品，無寧以購買商品為價廉物美，而以所省下來的時間去作養蠶及其他輸出產業為有利。把日本的經濟商品經濟化起來的另一原動力，是由鐵道等等交通之發達，國內經濟的地方分業更形旺盛，於是與其營自給自足的生產，無寧以作商品的生產為有利。此交通機關的發達，同時又使國外輸出貿易

更形有利，使國民經濟更加商品經濟化起來，這也是無庸多說的。

試一比較明治廿六年及四十一年，而一睹日本交通機關的顯著的發達，則汽船由十一萬噸至七十二萬八千餘噸，鐵道由二千〇三十九哩至五千餘哩，牛馬車由五萬七千餘輛至十七萬八千餘輛地各自飛躍，其後經過歐戰戰時及戰後，更繼續其發展。以之與中日戰爭前的發達相比較，則此時交通發達的更為顯著，可以容易看到的罷。

經濟的根基既已如此成熟，而中日八國聯軍日俄的三戰爭，使幾十萬的壯丁離去鄉關，使習慣於商品消費的風習。由此已不難想見當時國民的經濟生活的以可驚的急速度，由自給自足的方式變遷至商品經濟的事情了罷。

第四節 產業革命的直接動因

可視為中日戰爭以後日本產業革命所以能產生的基本原因的，也如以上第二及第三節所述了。但日本的「產業革命」當時乘此種環境而得能成就，是有更上的直接動因的必要的。直接動因的主要者，恐是（A）政府的保護，（B）保護關稅的實施，（C）工銀的比較的騰貴，（D）動力的革

命(E)歐戰戰時及戰後的非常狀態五者罷。(A)及(B)專在日本的輸入產業之發達的形態上起產業革命的作用，(C)則主在舊日的產業機械化的形態上促進產業革命，(D)則由明治末年至大正年間的小規模產業的機械化促進而使產業革命普及起來。(E)則起了使由於以上諸動因的產業革命全般完成至更高一級的作用。但最後的(E)，始止於前編第三章中所說到過的罷。

(A) 政府對於近代產業的保護政策

明治政府，自維新以來，依了所謂官辦主義，盡全力於泰西式產業的移植摹倣。當時日本的經濟的環境發達尚未成熟，加以財政的壓迫，方針未能維持，於是產生了有名的明治十三年末的「工場出賣方針」，以後政府對於泰西式產業的移植摹倣，顯然變爲了消極乃至間接的。

可是在以中日戰爭爲轉期，政府對於泰西式產業的移植摹倣重又濃然現其頭角。此政府保護再現的根源；大體上可別之爲二。(一)大致基源於軍事的理由，(二)大致根基於經濟的理由。但(一)與(二)的理由，有時互相混雜，或一方是(一)，同時又是(二)或一方是(二)，而又合(一)的目的，兩者未能截然分別，可是其主要的根源，却是由於上面的二個理由所起的濃淡各種作用。大致觀之，則可說(一)專由於政府的直接保護。(有各種手段)。(二)專由於保護關稅政策。屬於

(一)的主要政策，大致可分爲次列各項。

(一)明治二十九年的造船獎勵法

此造船獎勵法，後在明治四十二年三月修正，更加厚了內地造船事業的保護，其發達，又因丁次項(二)所述的八幡製鐵所的官營的低廉材料的供給，更被促進。於是一向完全依賴於輸入的日本的大汽船的供給。以後大部份便能在內地製造了。例如在明治二十九年以前（明治三年至廿九年的合計）國內新造及輸入總計噸數的八三%一四，是仰給輸入的，且國內新造，祇限於小汽船。但由明治三〇年至四一年的合計，則上述的外國船輸入比率，雖有因此時的中日戰爭的輸入激增，仍能減少至六一%七五，明治四二年至大正四年間的總計中，更大減至四〇%五，約有六〇%，均由國內新造船所供給。此比率到了歐戰戰時戰後的非常時間，差不多全部由國內供給，且有不少的輸出，戰後此傾向又有不少的逆轉。歐戰戰時及戰後的，暫且不講，即專依可視為政府的造船獎勵策的結果的歐戰以前的，已不難看到中日戰役後日本國內造船事業發達之大了。明治三年至廿九年的廿六年間國內製船噸數，僅不過五萬二千噸，但明治三〇年至大正十四年的廿八年中，却建造了約七十倍的船舶。

(二)中日戰爭以後，政府定下兵器的自給自足主義，一方擴張官辦工廠，同時在此目的之下亦盡力於民間工廠的保護。

(A) 中日戰爭後八幡製鐵所的官辦。

(B) 陸海軍的兵器造船諸工廠的擴張。

等，是其結果。而中日日俄兩役後軍備的大擴張，和(三)均大有貢獻於國內機械工業的發達。

(三)日俄戰後，海軍決定國內建艦的方針，以之和造船獎勵法共同謀國內造船事業的保護發達。

例如若依三菱造船廠常務董事濱田彪氏記述於日本工業大觀中的，則日本的海軍建艦，在明治四十年以前，其建艦的七成四餘，是依仰輸入的；但在四十年以後，其依藉輸入的，僅不過百分之一八餘，差不多全部是以約四成八的官營，四成五的民營的比率仰求於國內製造的了。

(四)和日俄戰後的鐵道國有同時，又定下鐵道需要品的國內自給自足主義，努力於官民的車輛工廠及其他發達。

關於此點。鐵道部工作局車輛課長朝倉氏在日本工業大觀中如下述道：『……我想特別說明，我國的新造車輛，全部是純國貨。客貨車則在國有以前就已是國內製造，機車則十餘年來均於國內所造，電氣機車則因欲急速實現電化計劃，是輸入的，但國內工廠，亦已有了製造的經驗了。——故今日的得能自給自足，固由於鐵道部十餘年來採用此方針的結果，一方也由於得到民間製造所努力的結果良品。……』

(五)政府利用電報，電話及國有鐵道之電車併用等等國營，更盡力於「國貨使用第一」主義，貢獻於電機機械事業之發達。

以上依藉政府的特別保護的諸工業的發達，不僅僅是此種工業自身之發達而已也，因為造一只汽船，一只軍艦或一架機車，是需要凡百的附屬工業的發達的；此等凡百工業，也必最先在以上在政府的特別保護之下的諸工業中發見其發達上必要根據地，然後再漸次普及至其他各方面的。現試一觀日本機械工業部門的主要產業，則即說沒有一件不是在如上的政府的特別保護之下生長起的，也無大錯。又例如前日本銀行總裁井上準之助氏述說造船事業的綜合的工業性道：

——(見我國國際金融之現狀及改善二四六頁)。

『造船工業的性質，可說是綜合工業。造船是綜合各種工業而才成功的，依向來的計數，則貨物船的造船自身的工作，祇爲二成一，其餘的七成九，都是傍的機械的購入。如需要汽鍋、電氣等各式各樣的機械等便是。造一只一百萬圓的船，造船本身的錢僅不過廿一萬圓，殘餘的七十九萬圓，均付與別的工業，而一只船才告成的。至於軍艦，則比率爲三與七。故若造一隻一千萬圓的軍艦，造船本身僅爲三百萬圓，七百萬圓是使其他工業大大繁昌起來的意味』。

由上，已可容易想見中日戰役以後日本的產業革命的進行直接依存於上面的政府的產業特別保護政策之所之如何偉大了罷。

(B) 保護關稅政策的實施

中日戰爭後日本產業革命的進行，又因了政府的保護關稅政策的採用，直接遇到了強大的刺戟。日本的關稅，從前被安政時的五國條約及慶應二年（一八六六年）二月的改稅約書的不平等條約所束縛，沒有課徵 5% 以上的輸入稅的自由。且連此 5% 的標準輸入稅，也多是從量稅。後鑑於物價的騰貴，故實際上的課稅率比 5% 又低了不少。至明治三十二年七月，爲日本國民多年的

要希的「條約修正」始實施，一部份關稅收回得告成功。及至宣布了明治四十四年關稅權能完全收回，保護關稅主義的主張遂成了朝野的輿論。但日本的關稅率，在明治三十二年條約修正之時早已參入不少的保護主義。但當時被「協定稅率」所束縛之所，尙復不少，稅權的得到實質的回復，是明治四十四年修正國定稅率實施以後之事。

明治三十二年實施的國定稅率，其壓迫某種外國輸入品而援助斯種產業的國內發展之處，頗非淺鮮。試一觀明治三十二年實施的國定稅率的大致，則普通工業品，以從價二〇%為標準，其中對於（一）天然物，米製品，（二）學術器具，原料品，（三）機械類及運輸用具，（四）半製品，（五）日常消費品，則減低到適宜稅率，反之，對於奢侈品及對日本產業有加保護的必要的，則增加其稅率。標準稅率為二〇%的，為鐘表，火柴，陶磁器等，大多數的工業品，為一〇%至一五%。可是當時的重要輸入品的幾乎全部，已如上述，均有其協定稅率，藉了較低於國定稅率的輸入稅，依然逞其競爭。

明治四十四年七月實施的關稅率，較從來受到多大的束縛的協定稅率的數及率，已大有改善，且已非片面的，而是雙方的了。加之對於工業品的標準稅率，定為二五%，較向來已提高了

五%，根基種種標準，（對於原料品，務須免稅或減稅）在最大六〇%最低五%的範圍內，作稅率的分配。

因此兩度的關稅修正，日本的近代產業，在與外國貨的競爭上，大受保護，乃促進了近代的產業之勃興。不必說，這就是日本產業革命的進步。因為此等輸入產業的大部份，都是機械生產的工廠產業。試一覽當時因此等關稅修正的結果，外國製造品輸入的如何激減（這可視為國內此種產業的發達），則各種織物類，衣類及其附屬品，金屬製品，學術品及鎗砲，機械類。油脂蠟及其製品，顏料染料漆料等的因了輸入關稅的增高而得到保護的產業的輸入，在明治四十四年關稅修正以前，其絕對金額固不必說，即其對於輸入全體的比率，大體上也有增加。可是到了大正元年至四年，（此時應考慮到大正三年七月有歐戰勃發的非常事件）則輸入絕對額及比率都突然大大減少。例如關於以上諸貨的合計，把明治三一——三五年的平均，四一——四四年的平均，及大正元年——四年的三期加以比較，則其輸入額在第一第二兩期內各著增了六千八百餘萬圓及一億八百萬圓弱的至最後一期，便一轉著減至八千七百餘萬圓，降落至明治三三——四年

的平均以下。又對於輸入全體的比率，在三六——四〇年的平均率及四一——四四年的平均率之

間，由二三%三六增加至二三%八八，可是最後的一期，則激減至一七%七四。由此已可容易想見保護輸入關稅的實施的引起日本的輸入產業的發展的實情了罷。

(C) 工銀的騰貴與舊日產業的機械化

總之，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近代產業。或驅逐輸入品出國內市場，或達到能與外國貨競爭的輸出產業的程度的根因之一。爲日本的工銀較先進資本主義國低廉了不少的一事。但雖同在此種基礎之上，在中日戰爭以前，經濟尚未成熟至「產業革命」時期，及至中日戰役以後，產業革命才告成功。這是什麼理由呢？本章的記述，可說全足對於此點的說明。

原來過於低廉的工銀，反而阻止機械的利用。爲什麼呢？因爲若工銀十分低廉，則其利用機械，反不如以雇用多數的勞働者爲有利。因此之故，在中日戰爭以前，因日本的勞働工銀過於低廉。泰西各種機械雖已被介紹進來，產業依照以依賴手工業爲有利，因之產業的機械化，雖有政府及「有志家」的異常的努力，尚是遲遲未進。（其他尚有資金不足的理由）所以在中日戰爭以前的日本，其產業的既已機械化了的，僅限於非利用機械在技術上生產便不可能的一小部份，（且當時此種產業十分稀少）此外的部份，則即是「輸出產業」，尙完全依賴於人力。

故在中日戰爭以前，因勞動工銀的過於低廉，除去了一部特殊的產業外。機械的利用普通尚未發生，產業的發展，尙全依手工業。但以中日戰役為轉期，諸種企業蔚然勃興，因之勞動者的需要激增，工銀大大昂貴了起來。例如工廠職工數，由明治廿五年的約三十萬人激增至三十年的大約四十四萬人，四十四年七十九萬餘人；此時間內礪山勞動者數，也約增一倍。其他不論於上面的統計中的小工廠，鐵道及其他職員工的激增，也不難準此推想了罷。其結果，不必說是工銀的昂貴。例如比較明治廿三年三十年，四十四年之三期的東京工銀指數，則由一三〇飛昇至一八五及二八三。紡織廠女工每日平均工銀，由八分二厘暴漲至一角三分六厘及二角八分。此工銀騰貴的傾向，經過歐戰戰時及戰後，更作了一大飛躍。

此以中日戰役為限期的工銀的飛漲，便日本的產業與機械的關係起了激變，是無庸重說的。即日本經濟，以此時為限期，全產業部而已入以用機械的應用比人力為有利的時代了。這期間的事情，我們可引用於明治卅年得到了迴轉式製絲機的特許，而「給了我國的繅，絲工業非常的改革的」有名御法川直三郎氏的話，較為滔滔有力；氏敍述當時的情狀道：——

『……維新以來，士族之女子不能坐食，勢非求作職業不可，乃從事於諸種業務。此等女子

之投爲繅絲女工者，亦復不少。故對繅絲女工無感不足。別無需用機械之力之必要……加之賃銀非常低廉，與彼購買高價之機械而利用之，無寧以多傭多工，利用其指尖爲利便。故此習慣浸入一般生絲家之頭腦。不易改變，機械應用遂難於實行……但觀今日我國之狀態，則中日戰役以來，諸種事業勃興，向日女子之困於無職者，亦易於得相當之職業，如紡織業，如織物業，其所需要女子，均較多於舊日，因而繅絲女工，自呈減少之傾向，同時並招得工銀之昂騰；時至今日，僅用指尖之繅絲，早將不能舉利……（例如）……昔日百斤之繅絲費，僅需六七十圓，今則實需一百五十圓至二百圓……（東洋經濟新報第一一五號）

日本的生絲繅絲業，在中日戰後急激地由舊日的「坐搖」，進步至器械繅絲，也給與了廣汎的往日產業以產業革命。原來日本的「器械繅絲」，以明治三年前橋藩的聘請外人作學習爲嚆矢，但對器械繅絲之普及有最大的貢獻的，却是開工於明治六年的政府的模範工廠「富岡繅絲廠」中的技術的傳習。當時器械繅絲雖得輸出價格頗爲高貴的好刺戟的潮流，器械化仍遲遲未進，在生絲全生產額中器械生絲所占的比率，在明治二二——二六年中平均不過四一%。（以前的統計不詳）但中日戰爭以後，因已述的理由，明治二七——三一年平均已至五二%，至明治四十年飛增至六

七%，至大正三年，更躍進至七七%，器械織絲，終於征服了全織絲業。及至經過了歐戰，此傾向更受最後的主動，於大正十四年，器械織絲在全生絲生產額中占了八七%。

根基於工銀昂貴的生絲織絲業中的產業革命，也是日本其他的舊日產業的好標樣。例如和織絲紡織兩事業同為當時日本的最大工業之一的織物的器械化，也同樣大部份基因為工銀昂貴。（此外根源於輸出增進的銷路之擴張亦未可忘却）。關於這一點，鐘淵紡織公司的井上潔氏在前揭的書中敍述道：『明治廿七八年以前，與其新設機械，尚以多雇人工為有利。但隨物價之逐漸高漲，工銀亦高漲，入了與其多雇工人無寧以使用機械為價廉的狀態，因之織布亦漸次用工廠制進行……』織物業與棉紗紡織及生絲織絲不同，其製品亦複雜不一，並不如單一製品的以機械生產為有利，且藉依人力與藉依機械的勞力節約之差亦不大，故其機械化遺落到了最後；但自輸出的增大及工銀昂貴突然猛烈起來的歐戰以來，其機械化的傾向突然增大。例如一比較明治三十二年四十三年及大正十四年的織機內容，則力織機利用機械之織機）由三萬二千餘架及六萬八千餘架激增至卅六萬八千餘架，對於織機架數合計的比率，在同時期內由四%三八及九%一二飛增至五四%六三。

正如上述，力織機比手織機有三四倍的生產力，故若我們把它的能率作三倍半計算，則大正十四年的織物生產額的約八成，理應是依藉力織機的。機械化普及的主因，當然尚有次節的電力普及的貢獻；但一視在中日戰後織物的機械雖已開始，在歐戰前依然遲遲未進，便可容易推想到歐戰戰時及戰後產業革命的爲如何急激了罷。

由上我們已可充分明白中日戰後工銀的急劇的昂貴，不僅是輸入產業，並使「產業革命」深入於舊日產業的底奧的經緯了罷。但正如可由上述看到的，在當初舊日的產業革命，以限於輸出產業爲主，或是以輸出產業爲主動力的。可是歐戰戰時及戰後的急劇的工銀的昂貴的結果，與後述的電力及煤油發動機之普及相依恃，往日產業的專銷國內的製品業，也急劇地機械化了起來，關於此點，在次項再說罷。

(D) 動力的革命

中日戰役以後，其促進日本產業的機械化的諸要素，正如上述，全是經濟的原因，不是技術的原因。正如本章開頭所說過的。這是後進國的產業革命的當然的展開。但這是對中日戰後產業革命的本流說的；其從傍刻刻進步起來的技術的進步。當然也促進了日本的產業革命。其中給明

治以降の日本産業革命に重大的の影響的、是動力の革命。日本産業、因資源の關係上、缺少豫鐵工業那樣的最以大規模生產爲有利的事業、纖維業雜貨業等比較能耐小規模生產的事業、却占工業的大部份。加之由銷路的關係、資力的關係等、也在一切產業部門中包藏着多數的小規模生產。但由於蒸汽機關的產業機械化、對於此種小規模生產殊多不便，因此之故、日本的產業革命的進行遂大受限制。中日戰後、始初僅以燈火的目的露其頭角的電氣事業，在日俄戰後已頗有進展於「動力」方面、日本的產業至此才能接觸以電氣爲動力的產業機械化。這傾向，在歐戰戰時及戰後被煤價的暴漲所刺戟，更一般地普及發達了起來。那麼日本電氣事業之發達所負於動力供給業之發達之處是如何廣大的呢？第一電氣事業的資本金、由明治三十六年的一千五百萬圓，至十四年約十倍至一億一千三百餘萬圓，大正十三年，更十倍於明治四十四年，增至十一億八千八百萬圓。由此已可容易地看到其發達的如何偉大了罷。更一視其收入內容、則在全收入中電力所占的比率、明治四十一年僅不過五%八八，其他的部份爲電燈，但至四十四年則飛增至一三%八五，大正三年二四%六，十三年四六%九九。即電氣的普及、爲動力較電燈更臻重要的反映，說明了明治末年以來產業機械化所負於電力之處之至大。

故卽視工廠原動力的種別，也祇有電動機的發達聳然觸目，形成了工廠原動力的中心。例如在明治卅五年，蒸汽機關數爲三千四百六十五，電動機數却僅不過一百六十五。但至四十二年，前者之數爲約五千五百，後者却已激增至四千七百餘，已能與蒸汽機關數相伯仲；至大正三年，形勢完全一變，前者尙未過六千三百餘，後者，即電動機數，竟一躍達一萬七千餘，至此，日本工廠的原動機。至少在其數量上已被電動機占得了最大的勢力。此後此傾向更形顯著。例如大正十四年，電動機示十萬四千之巨數，而爲明治年間原動機之女王的蒸汽機關數，僅不過八千〇八十七了。此時期中在工廠總數中原動機使用的比率，由明治四十二年的二八%二七，增大至大正三年的六〇%五五，至大正十四年，更增至七七%七五，此種飛增的主因，可不難看出是由於電動機的普及罷。

更由實在馬力數看，則對大正十四年的電動機的一百七十六萬七千餘匹馬力，蒸汽機關及蒸汽渦輪(Turbine steamer)之合計尙示一百十五萬八千餘匹馬力，依然與電動力互爭王霸。即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蒸汽力大部份被大規模動力工廠所利用，反之，電動力則多被小規模動力所應用。表示電力的把日本的小規模產業機械化的。尙不止此。因爲平時使用五人以下的工業部門中

的（這不在以上的統計內，因尚無調查）由人力至動力之轉換，因電力而大大普及了起來。例如大規模的碾米廠的因小米店內的設置碾米臼（均用電力）而消滅，糖菓店，豆腐店，冰淇淋等等小工業的電氣化，是我們日常所親眼目睹的。這是給是時大部份依然依賴小規模生產的純銷國內的舊日產業一大革命的動因。

電力之普及，大大刺戟了蒸氣力所萬不可能的小規模產業的動力化，促進了明治末年以降日本產業革命的進行。但當研究電力之普及及產業革命之進行的關係之時，則又不可忘記：若無電力普及，則產業必能大規模化至能適合蒸氣力之利用之程度，而像今日的依然僅止於小規模的作用，亦必更渺少的罷。

第二章 產業革命及其影響

第一節 日本的產業革命的特性及其影響

先進國的「產業革命」，是生產形態先成熟至以機械的利用為有利的條件後，由此條件的主動，才發明機械的。所以在機械發明以前，那國的經濟必已十分交換經濟化，其主要的產業，早已進展至以相當程度的商品生產為對手的工場制及家內工業了。（不是產業革命後那種利用機械的工廠，是專以手工為基礎的工場）及至因機械的發明而工場機械化了之後，其因機械的競爭而受到一大打擊的，在先進國完全是此等「手工業者」，即當時的「職工」。又因機械的發明，向日之必需熟練工人的工作，也可由「女工又童工」代替，因之先進國方面的職工乃遇到了失業的苦難。

可是在日本產業革命的進行中，則雖托歐美先進國之福，機械自早就能自由利用，但缺少能「有利地」利用它的環境。有利地利用機械的環境的缺少，是因國民經濟尙富於「自給自足」的色

彩，於商品生產的發達上爲必要的銷路亦甚狹小。因此之故，日本一旦銷路增大之後，同時（但因所需資本之缺乏，常受掣牽）便能突進於由歐美先進國所發明的利用機械的工場生產。即理應因產業革命而受一打擊的向日的職工，在尙未充分發達之間，就跳過了此階段去加入生產的機械化，所以無有因「產業革命」的機械競爭而職工一時陷於悲慘狀態的事態之發生。否，日本的產業革命，反之因了既述的理由，常產生大大的職工的需要，供給多數國民以新的工作之量，一時反而引起了「職工不足」。例如明治廿九年一月五號的太陽雜誌說道：——

『工業的進步和勞働者的關係，自古各國均議論百出。自東海道鐵路開通，沿道的驕夫馬丁的失其職業，固不必說。職業的失去，固一苦事，不過他們却決不守永久無職過去，他們都在別處得到了職業，所以困難也祇是一時的；可是歐美各國，他們因了機械力使用與科學應用，產生了所謂工業革命，無數的勞働者失去職業，因之大集同志，闖入製造工廠之內，極亂暴狼藉之致。幸我國因製造業之發達，從來未有的新事業續起，反而增加勞働者的需要，婦孺之流，多有新得職業者，其影響減少了新設娼妓業請願者，削縮了竊盜詐僞的犯罪者。……我國的工業革命，反呈了稀有的好結果，因毫不感到普通因工業革命而感到的勞働者的

失業，反而勞働者缺乏，雇主之間職工橫奪之弊盛行。這是能減少資本家的利益的現象，但由社會上看，則較之減少勞働者的利益，為數頗微。我國的勞働工銀，與他國相比，尚甚低廉，勞働柔順而長於技術，加之煤之出產亦富，與他國相較，生產費較少，故資本家也仍的利益；祇要有利益，便可增設製造所，勞働者之需要亦必更多增加。如此好機會的工業發達，是他國所少見的』。

又中日戰後日本產業革命的如何苦於職工不足。可由當時為產業革命的中心的紡織業因苦於職工爭奪之弊，設法防止，遂由紡織聯合會之力用束縛職工的非常手段，政府也在工場法案中設定承認它的規定一事中明瞭地看到。故日本的「產業革命」非但不因了機械的競爭而使舊日「職工」失業，即說也從未因女工童工使用的壓迫而使舊日的成年工人感到苦痛，也無大錯罷。

那麼日本的「產業革命」是全不犧牲舊日的產業而進行的嗎？倒又不然。日本的產業革命，也壓倒了許多舊日的產業也是在舊日產業的死屍之上才建設起了機械生產的。做了此犧牲的對象的，不是手工的職工，而大部份是農家及自給自足經濟本身。例如紡織業織布業的產業革命，並沒有壓倒此等產業的「職工」（因為國民經濟尚未發達至此種職工階級多數存在的段階）。正如後

而所述的，大致從農家及其他的家庭奪去了手紡，織物等副業及自給工作。這便是後進國日本的「產業革命」的特色。

手紡的從日本一般家庭工作中消滅，大體以中日戰爭為界期；同樣手機的消滅，大約以日俄戰爭為界期。其他向來作為農家的副業而生產的生絲繅絲的被工廠的器械繩絲所代替，又日本紙的被機械生產的洋紙所代替等等，都說明了產業革命大致是奪取了農家工作。

故日本產業革命的壓迫，專襲攻於農家及其他的家庭副業或自給工作之上。所以產業革命的結果，農家等等生活，理應大告困難。幸而產業革命前後，日本農家受生絲，茶等的輸出激增之惠，能把一方在產業革命中所失去的，立即轉向他方。且勞力若有餘裕，進入工廠之途亦已開闢。加之產業革命的打擊，因上述的理由，是分散於全國民的家庭工作之上的，故其苦痛，也比較輕微，這便是日本的產業革命能不使產生國民經濟中可道的混亂而十分圓滿地進行的所以然。但此結果，日本農村經濟的內容，正如次節所詳述的，已受到了一大變革。

如上所述，日本的產業革命，沒有使舊日的職工陷於悲慘的境遇中的黑暗的一面，無寧祇有供給了國民的大多數以較多的工作的光榮之一面，獨起了顯著作用。那麼，日本的產業革命果真

全然沒有黑暗之一面嗎？倒又不然。童工之濫用，女工之虐待等，均在「這是爲產業之發達」啊。之美名下公然橫行，結果生了許多年青人生命的被蝕萎的慘事。這一點，至第三節再詳述，這裏姑且不提。

第二節 產業革命與農村經濟的劇變

既如第一節所述，日本產業革命的打擊，其作用大致僅及於當時尚在以自給自足經濟爲基本的階段的舊日農村經濟的崩潰及農家副業的壓迫。農村的農閑期的工作，陸續被工廠的機械生產所蠶食。即產業革命的犧牲者，並非手工的職工（當時尙爲極少數），而全是農村大衆。但在事實上，當時的農村並未怎樣實感到其打擊。反能去順應新狀態。理由是當時適一方生絲，茶，香菸，米穀等物的輸出激增，他方各種產業勃興，吸收多數的勞動者農家也能去追逐較向日更有利的工作，容易放棄向日的工作（被產業革命所壓迫的部份）。惟農村自身的因此而遇到了一大變化，是不必說的了。

第一，農村的自給自足經濟崩潰，且舊日之農家副業又被奪，養蠶及茶等，乃代之以可驚的

速度及程度普及於全國。

第二，上面的結果，日本農產物自身，遂由自給自足的品類被統一為商品的品類，因而農產物種類，大大集中於少數有利的農產物。

第三，以上的農村經濟變化的當然歸結，農村的消費，遂大多數依賴由都會的購入品；產業革命的進行，得益形促進。

第四，產業革命的進行，需要多數的勞動者及其他，欲滿足此需要，便以較在農村更有利的條件，把農村人口吸收至都會，結果，農村因勞力的比較的減少，勞力專集中於最有利的農作。最總括地，具體地表示出以上所述的日本農村經濟的變化的第一件事情，是主要農產品的耕種的變化。例如主要農產品的類別，自明治二十年以來就示劇著的變化，雜穀（麥類，大豆，小豆，粟，稗，黍，蕎麥，玉蜀黍的合計）及原料用農產物（菜種實棉，大麻，甘蔗葉藍的合計）劇減，米，桑，甘蔗激增。即表示出農業都集中於米，桑（養蠶）及甘蔗，放棄其他的農作物。我們一視對於明治二十年。卅六年，及大正十四年三期中各農產物的耕種額的總計的比率，則雜穀及原料用農產物兩者，各四九%四四，四七%七五，三七%五九地激減，反之，米桑及甘蔗的合計，則

在同時期內各四九%一七，五〇%六八，五九%九四地劇增。

大概作上面的農村經濟實質的變化的直接主因的，由全國說起來，可說爲養蠶的普及。即一方因農村自給自足經濟的崩潰，當向日費於農耕以外的自家用品的自給中的勞力發生過剩，而非得別求利用之途不可的時候，適巧生絲的輸出大爲增進，將來大有利益的希望，因而農村勞力的大部份，遂更集中於養蠶。此傾向因夏秋蠶的發達，更被促進。

日本的養蠶，始初專集中於春蠶，但春蠶時期，適與稻作期相衝突之點頗多，因之在勞力的分配上，難於期望某程度以上的發展。但及至秋蠶可養被發見後，稻作及養蠶的勞力分佈的分配，大爲有利，養蠶的發達，起了使農耕更益集中於種稻的作用。從種稻方面說，則因日本米的特殊的性質，與其他的農產物相較，被外國物的競爭所脅威之點也較少，故種稻既屬有利，且尚有政府於根基於軍國食料自給主義的各種保護，由各方面刺戟農耕的種稻集中，此傾向因養蠶的發達，更被促進。

例如在明治廿三年，日本產繭的七三%，尙是春蠶，秋蠶僅不過六%。但至明治卅六年，秋蠶飛躍至二一%，春蠶降下至六四%，以後此傾更續持，至大正十四年，春蠶五〇%，秋夏蠶五

%，兩者勢相匹敵。同時農家一戶的產蘭額，由明治廿三年的二斗一升，三十六年四斗八升，大正二年八斗四升，十年一石一斗六升，十四年一石五斗三升地以可驚增加率普及了起來。

由上可知日本農村經濟，與產業革命的進行同時，或因自給自足經濟的崩潰，或因副業的工廠生產化，等等原因，把過剩的農村勞力大部份集中於養蠶。（其他過剩勞力的大出口之一，是流入都會為工銀勞動者）。養蠶的發達，更使時間上與養蠶相衝突的農耕減少。此外更促進此傾向的。是外國農產物的低廉的供給。故農村經濟，由向目的複雜多種的生產，終於集中其主力於米及養蠶，生產單純化了起來，由他處買入必要品。

此農村經濟的交換經濟化，在當初的過程中，俾益於農村之處，頗非淺鮮，農村因此得進展至交換經濟，但結果，農村的利害却大大隸屬於握交換經濟的要鍵的商工資本家的支配之下，後日遂發生不堪其弊害的事態，但此事的被一般人具體地認識出，至早當在歐戰以後。

第三節 勞働問題的產生

以中日戰役為界期的日本產業革命，必然地促進了近代意味上的勞動問題的產生。在中日戰

役以前，當然不是絕對沒有勞動問題。或被歐美先進國的勞動運動所刺戟，或得教於歐美先進國的社會立法，無論是實踐上，議論上，勞動問題早生了萌芽了。但當時的日本經濟狀態，尙不過是產業革命的前期，所以勞動問題尙缺乏發展至引起一般人的注目的客觀的條件。

可以以中日戰爭為界期的急劇的產業革命的進行的結果，生產關係一變，和向日的主從關係全然不同的勞資關係，顯然已支配了全產業內部，勞動問題，至此才贏得了社會的一般的注意。但當時的勞動問題，無寧大部份是從資本家方面的立場來考慮的。例如明治廿九年的第一次農工商高等會議諮詢案第七這麼記道：

『第七諮詢案，關於職工的取締及保護。——隨本邦工業之發達，舊日之每戶製造，漸次變遷為工場製造，蓋為迫非得意之情勢。今後由圓滑僱主職工間之關係，維持資本與勞力之權衡，以之永遠保全彼此之利益，防諸般紛擾於未然等目的，制定必要的法令，實為工業發達上之緊要事件，茲特諮詢其區域，程度及方法』。

原來產業革命以來的當時日本，由下述的三方面被不得不直面着勞動問題的事情所包圍。
(一)急劇的工廠工業的發展的結果，勞動者不足，僱主間起了激烈的「職工爭奪」，遂有加以

取締的必要。

(二)勞働條件及其他交涉，用向日的主從關係，解決已屬不可能，因之「勞動爭議」頻頻勃發，痛感到了關於雇傭條件有設定若干公的標準的必要。

(三)因童工女工等的無限制的使用，全夜工作及其他勞働，釀成了人道上看不過去的悲慘事件，有加以保護的必要。

資本家方面，對於(一)項，則希望依職工簿制度的採用，限制職工的自由地由甲工廠轉至乙工廠的取締，對於(二)及(三)項，或主張主從關係的溫情主義，或以時機尙早為理由，極力加以反對。總之此三方面的為當時勞働問題的中心，可由於第三次農商工高等會議(明治卅一年十月)附帶了具體案而諮詢的「工場法案」的全為關於以上三點一事中容易看到。

和產業革命同時露其頭角的上述三個勞働問題，那麼後來是一往直前地喚起「社會問題」的注意嗎？倒又不然。無寧呈了漸次由世人的注目中失其姿態的傾向。這有許多原因。以下把這許多原因聯結於上述的勞働問題所產生的三大事由而討論罷。第一關於僱主間的職工爭奪戰，其原因到了職工遞補到就消滅的。

(二)的以勞働條件爲中心的運動，即本流的「勞働運動」，一方官憲用國運伸張之名義竭力加以彈壓迫害，一方因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家提出其巨利的一部，提高全體國民的生活程度，藉以懷柔，兩者相俟，勞働運動的抑止得告成功。例如中日戰後各地勞働爭議及社會主義運動露其頭角後，山縣內閣乃以斬草除根的目的，發佈了後日成爲了壓迫勞働運動的精銳武器的「治安警察法」。其提案理由，有次述的一節。

『……卽非集會結社，亦有取締之規定之必要，例如於街頭廣衆之間，作有害安寧秩序及風俗之行爲者，對同盟解雇同盟罷工有暴行脅威或誹謗之行爲者，佃戶而強迫地主者，妄弄戎器爆裂物或練習用軍器而妨害安寧秩序者，均是。因此特廢止集會及社法，應實際取締上之必要，希望別制治安警察法』。

以明治卅四年安部磯雄等的社會民主黨的被解散爲始，後經許多迫害之後，明治四十三年遂發生所謂『大逆事件』，彈壓達於極點。此時勞働階級全失其指導，因或滿足於生活程度的得道逐漸向上，或被日本的由東洋一小國躍入世界「一等國」的歡聲所迷惑，關於勞働問題，可說天下泰平了。因此之故，當時團體的勞働爭議的勃發，是十分例外的事情。例如如下表所揭，勞働者的

同盟罷工，差不多是若有若無的狀態。

勞働者同盟罷工表

年	次	件	數	參加人數	年	次	件	數	參加人數
明治三十一年(下半期)	三	三	一	三、五七	明治三十二年	八	二	五	五、三三
		三	二	六、五七			六	三	五、二三
		三	三	四、六四			七	二	四、二九
		三	四	五、三六			八	一	三、二九
		三	五	六、二九			九	一	二、一九
		三	六	七、一九			十	一	一、一九
		三	七	八、九			十一	二	零、九九
							十二	三	八、九九
							十三	四	七、九九
							十四	五	六、八九
							十五	六	五、七九
							十六	七	四、六九
							十七	八	三、五九
							十八	九	二、四九
							十九	十	一、三九

故日本的產業革命，至歐戰戰時及戰後勞働運動勃興期為止，全不受「勞働運動」的任何苦痛，如步行平坦大路一般地繼續着長足的進行。

在此種雲霧氣之下，童工及女工的非人道的使用竟在產業革命之轍下被永久公認。在「為我國工業發達起見」之名下，許多童工及女工的健康，被當為工廠開工上必須的燃料，和一塊煤

一般地消費着。政府的在中日戰後即承認有設定工廠法的必要，已如上述，可是工廠法的公佈，却遲遲是明治四十四年三月之事，至其見於實施，更遲至大正五年九月，由此可明瞭地知道日本童工女工的苦狀了罷。且工廠法自身，在擁護勞働者利益的一點上，尚是十分不完全的。

在日本今日產業發達的礎石底下，正不知埋有多少的勞働者的犧牲，這一點，恐是在了解產業發達的由來上是最值得研究的一點罷。現且請更詳細地作此點的具體的說述。第一，欲明瞭中日戰後日本產業革命進行之際，弱小幼年工如何被工廠酷使的實情。不妨引用一下於第三次農商工高等會議上（明治三十一年十月）財政部的委員添田壽一氏關於此點所說述的一節。

『至於大阪附近的紡績業，則其中雖亦有已加整頓者，情形頗為淒慘。……實在未滿十歲的人，亦在機械房中工作。飯是立在機械轉動之間吃的。一走到寄宿舍，則因便所的臭氣，實難形容。又夜工則因雇用尙未成年的女子的結果，體育上發生非常關係，這是在某工廠中事實上看到的。凡此，於繼續我國的人口上，實是頗堪憂慮的問題』。

以上是處於政府的地位的添田壽一氏從反對使用及酷使童工的立場所說的。但由童工使用贊成的立場，則他們也承認工廠內確有十歲內外甚至十歲以下的小孩的使用。可是他們却以童工為

數已屬不少爲理由，反對未滿十歲的童工使用禁止案。（政府工廠法案第九條）。（以下一節演說節去）。

以上是明治卅一年當時之事，以後直至明治四十年，童工尙占女工——當時占職工的六七成——的大部份。例如正如別揭的統計所示，於紡織，織布，寬緊，織物，印刷業中，十四歲的，占全女工的一成一二至一成七八；滿二十歲以上的女工，在紡織，生絲，織物，毛斯倫，寬緊織物中僅占二成餘至三成四五，其他全爲未滿二十歲者。由此可知日本工業之發達所負於童工利用之處之大了罷。

勞働者的被犧牲於產業革命發展的礎石下的第二方面，是寄宿舍制度與全夜工作。原來寄宿舍制度與全夜工作，是必彼此相依而其制度才能發達的。始初，全夜工作的產生，是作爲繁忙期內的臨時制度的；例如依農商部於明治三十四年所調查的『棉紗紡織職工事情』，內說道：『依某紗廠的某氏之說，則明治十六年該公司創辦之際，每日營業時間爲十二小時，僅是晝業；但因製品銷賣頗旺，爲增加製品額起見，乃開始了晝夜兼工。是時爲明治十七年。以後陸續設立起來的工廠，遂以晝夜兼工爲原則……』

但作為繁忙期內的一時的制度的全夜工作，為什麼會固定為常則的制度的呢？這要不外日本工銀雖比外國大為低廉，機械價格却較外國高貴不少，且利率又高的結果，欲儘力提高機械的能率，祇有極度以勞働者為犧牲，方為有利。例如依出席於一九二三年華府會議的資本家代表武藤山治氏在華盛頓所發行的英文小冊，則有如此一節：『按日本機械價格高貴，故日本紡織業不絕努力於紡織機的能率的增加。反之，美國則因工銀高昂，其努力與其說是對於機械的能率，無寧以注目於職工的能率的增加為主。』

女工年齡千分比表（由明治四〇年至四二年的平均率）		業 務 別	調 場 數	年 齡	千 分 比	同上實數
未 滿 十二 歲	滿 十二 歲以上					
印陶寬毛製毛織生紡	X	緊 斯 組	八三二一四九五〇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刷器帶輪	械織物絲織		九一八二四一九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二一五五六一六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三三七七七一七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四四八八八一八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五五九九九一九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六六一六一六一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七七二七二七二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八八三八三八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九九四九四九四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註〕 本表是根據醫學博士石原修氏的「從衛生學上看到的女工之現況」一書作成的。

蓋有了因全夜工作而發生的晝夜連續工作，則如英國每日利用八九小時，美國每日十小時的機械的時候，日本便得使勞働者工作十足二十二小時，結果，日本的一錘，作英美二錘以上的工作，日本投下資本（即機械代價）的收益力，與歐美的斯業者相比，在二倍以上。即假定日本的機械代價當英美二倍的高價，尙能立於同一的腳場上與他們作競爭，故全夜工作實是於資本家十分有利的制度，成爲了一方與歐美先進國相競爭，一方培植日本的產業革命的進行的肥料。

故全夜工作是二重削蝕職工的生命的制度。（一）全夜工作直接妨害健康之所頗大，（二）它是根基於在全夜工作實行上爲不可免避的寄宿制度的。先關於（一），則全夜工作，職工的疲勞過甚，晝間的休養未能把它消解，因而營養衰落，發生體重的減少。例如石原修氏依實地調查的結果，在其所著由衛生學上看到的女工的現況中，如下記道：『由是觀之，晝夜交替地連續全夜工作，欲其實行，便非消費職工的鮮肉不可。此可貴的人肉的減少達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職工的體力便得大衰而陷於勞働不能，頗爲明瞭，不是很可怕的事實嗎？……數萬女子的年輕的肉，被紡織業消費爲肉彈；此種可貴的犧牲，其量實太大了。……又身體衰弱而陷入勞働不能的，便把軀體搬入坟山』。

如上所述，全夜工作是以職工的寄宿制度為必不可缺的。而資本家的所以歡喜寄宿制度，此外尚有種種理由。例如上揭一書的著者醫學博士石原修如次說明道：『……多數的工廠，即說日本工業界全都如此也不妨罷，是很歡喜寄宿的女工的。走工女工（即早來晚歸的女工）有時到有時不到，在使用一定的機械的工作上是很不便的。第一因有家事的關係而請假，第二因懶而請假，第三因附近有祭會而請假，第四因生病當然不到。可是寄宿女工，則第一的家事關係是沒有的。第二，貪懶那是另一問題；至於工廠附近有了什麼祭會，而想走去一看，那麼走工女工和寄宿女工恐怕無甚異樣罷。從此種關係而歡喜寄宿女工，是沒有理由的。寄宿一語，含有一種拘禁制，及意思之束縛之意味。我總覺至少含有一種易於作意思的束縛的意味』。

故女工的寄宿制度，是日本工廠制度發達的礎石之一。例如依明治四十三年的調查，則紡織生絲，織布的日本三大工業，其六成乃至八成六均為寄宿工人，走工僅不過一成餘至三成八餘。既有全夜工作的肉體上的痛苦，此為女工的大部分的生活式樣的寄宿制度，實是資本家枷縛女工的一個拘留機關、女工生活的悲慘，固不必說，並且因工廠的生活及設備的不完全，其有害女工的健康，實頗多大。（這裏說的是指對此等不法行為的保護尚未由工廠法規定以前）例如依農商

務部於明治卅四年所調查的棉紗紡織職工事情，其對當時的「職工的衛生」，記述如次：

『紡織職工疾病的多數，是呼吸器及消化器病，其他眼病，關節病，生殖器病，也復不少。有人誤解紡織職工終日與器械共同工作，故能作充分的運動，頗有益於身體者；但身體之運動，須在清潔之空氣之中，且若無精神作用相伴，無寧有害。彼等終日立於同一器械之傍側，從事單調無味之作業，業務上無精神之安慰，作違反生理之過度之勞動，如全夜工作。且假日休息時間缺少，食後立即就工，因而起消化器病，多有營養不足者，加之工場內雖棉屑塵埃飛散頗甚，因工作上切忌通風，常窗戶密閉，別無掉換空氣之裝置，因而空氣頗為不潔，其他更由溫度溼度的關係，為害身體匪淺。尤如全夜工作，為害尤烈，引起感冒呼吸器病，甚者甚至變為肺病肋膜炎等，亦復不少。又由含有塵埃的空氣，溫度，光線等關係，染罹眼病者不少；終日直立工作，引起關節病，釀成女子生殖器痛，成為不妊之原因』。

終夜工作，寄宿制度及工場設備之不完全等等結果的如何給職工以多大的犧牲與痛苦——身體的與精神的，是無庸再說了罷；實際上解職女工的肺病，一時甚且使日本農村起一大恐慌。但給日本產業以較此更為直接的，具體的惡果的，是職工的做工年數的意外短促。蓋不堪於上述的

苦痛而陸續逃出職工生活的，正復不少，這是做工年數短促的最大主因。例如依農商部於明治十三年對甲乙二紗廠的職工出入的調查，則依乙廠看，在由前年度繼續下來的職工一千九百十一人，新雇入三千一百〇五人，合計五千〇十六人之中，至年終僅存二千二百十四人，其他的二千八百人，即年末人數的一倍以上的人，都退出了工廠。由公司方面看，因職工中途退職的頗多，祇要有二千二百餘就足夠的時候，便非得雇入五千餘人不可。

因此之故，我們若一視占職工的六七成的女工，則其工作年數極短，於紡織及絨布業中，其七成以上為未滿二年，且半年未滿者有二成餘，六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亦各占二成餘。三年以上的老工人各不足二成。

欲希望從此種職工中產生熟練工人當然是不可能的。這便是日本產業革命永也祇止於無須熟練工人的粗工業的根本原因。如上所述，職工所負的犧牲，一方固然大大助成了日本產業革命的進行，但一方日本產業的精工業化與高級化，也顯然因此被阻。加之為職工虐待之必然的結果的職工募集難，及因他種產業之發達而起來的勞働者供給的減少等等，因彼此對抗的關係，資本家就不得不作職工的待遇改良，工銀增高等等勞働條件的提高；他方為樹立對抗中國等後進國的粗

工業的發達的競爭政策起見，日本產業的精工業化遂大感必要，於是四週的事情雖順從資本家的打算；全夜工作，寄宿制度及童工雇用等等的利益，却漸次削減了。故日本產業的勞働條件，自大正年間起，已呈與產業革命初期各異的傾向。

給此傾向以實行性，而加以主動的原動力的，是自日俄戰爭前後方露其勢力的勞働運動及社會運動；其結果，一方表現爲工廠法的設定及社會政策的實現，他方表現爲工會運動的發達。其勢力在歐戰戰時及戰後更有飛騰的發展，是固知之事實。而全夜工作的終於在原則上的撤廢，是由於大正八年的華府會議的壓迫，自昭和四年起才實施。

六十年來日本經濟發達史

第一章 歐戰後日本經濟的撞壁

第一節 歐戰後日本經濟撞壁事情

自中日戰爭以來至大正九年春的數年間作了世界上罕有比匹的長足的發展的日本經濟，以大正九年春的「大恐慌」為一大界期，以後便激劇地轉入了長期的不況時代。原來在中日日俄兩戰後的企業勃興的時候，接繁榮之後，一時也有「反動的」「財界不況期」的襲來。但此不況期不久就又被更次的繁榮期所克服，日本的產業得如此循環地向新天地發展上去。倘若歐戰後日本的「財界的一大不振」的性質也是中日日俄兩戰役後的同樣的，那麼它就不過是為資本主義制度的一時的疾患的「景氣循環」的過渡的現象。日本資本家的大多數，也硬說它是僅僅的「景氣循環」的一部，故雖而接大正九年以來的一大不景氣，仍期待着若「一時之不況時期打破」成了功，便會像中日俄兩戰役後地立即被其次的「景氣」所救的。也不去作必要的事業整理，祇以彌縫法糊塗一時。

可是事業却大部份違反了資本家的「期待」待之又待的十年一循環的景氣之波，終未見來。否，財界的不景氣，反一般的地起了益形深刻的傾向。於是在以為暫時稍稍忍耐一下便會由其次的景氣所救（日本的資本家的大多數在中日日俄兩戰後的不況時都有如此的經驗）的期待之下作最後的忍耐而繼續其彌縫政策的，乃陷於一再失敗的窘狀。現在若再放置下去，則財界便會發生大恐慌，因而至大正十五年末，遂施行大規模的「政治的經濟」方法，即「震災重建處理法」。可是該法案正在議會的審議中，包容於該案內的財界內部的危險狀態——一逕是諱莫如深地隱瞞着的——洩漏至外界，大正九年以來朝野的財政彌縫政策，至是遂暴露破綻，引起了昭和二年四月的前所未有的「金融大恐慌」。

中日日俄戰後，財界的反動是立即由『其次的景氣』所救的。可是歐戰戰後，它却不如預期地到來，其彌縫乃在一大金融恐慌的形式上露了破綻。那麼這是根柢於怎樣的理由的呢？實在的，當大正九年的反動正將告平復之際，又突遇十二年九月襲來的關東大地震的突發事件。又誤用了經濟政策，使匯價頻起急劇的騰落，因而給了財界不少的負傷，也是一時的原因。可是歐戰後經濟的再起所以不能如中日日俄戰後那樣地進行，且又缺少如美國財界現時的彈力性，是另有其根

本原因的。

總之，歐戰後日本經濟不景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歐戰戰時及戰後的企業勃興的反動的「財界整理」的一過渡的壓迫。又大正十二年的大地震之打擊的一時的原因，也起了難於看過的作用。可是歐戰後日本財界所以出現了如此的不景氣的基礎原因，却在於自那時以來，日本經濟向日的發展方向的根本撞了壁。

正如在上面二編中所詳敍的，日本經濟自中日戰役以降以至歐戰後，作了可驚的長足的發展。可是其間日本的經濟無論在外面或內面，都沈澱着許多的矛盾，老廢，障礙等等「負的」要素，因而向日的經濟發達，至此遂根本撞了壁。即歐戰後的日本經濟，已轉入不僅有作戰時及戰後的企業濫興等等的過渡的「財界整理」的必要，即對下述的各經濟撞壁的基礎的原因也須根本地加以再整理的時期了。

現且在下面列舉需要整理的各事項的主要之點，以便概觀所謂「整理時代」的大致情形。

(A) 屬於過渡的整理的(參看本編第二章)

(一) 歐戰戰時及戰後企業濫興的整理。

(二) 關東大地震的打擊及其整理。

(三) 汇價漲落的動搖及其整理。

(B) 屬於根本的整理的(參看本編第三章)

(一) 過去的產業發達要因的老廢。

(甲) 歐美摹倣的發達的撞壁。

(乙) 從前的方法上的資源的老衰涸竭。

(丙) 勞働工銀的昂貴。

(1) 產業保護政策的矛盾急劇化。

(甲) 保護關稅變爲了資本家的救濟。

(乙) 其他產業之保護，助成，救濟等的產業壓迫。

(三) 產業對外發展的撞壁。

(甲) 帝國主義的產業發展的挫折。

(乙) 後進國，尤如中國的產業發達與輸出產業的衰退。

(丙)商工立國政策的破綻。

(四)歐戰後的「第二產業革命」及其影響。

(甲)德、美等國的「產業合理化」及其競爭的打擊。

(乙)新興產業的出現及其對舊日產業的壓迫。

(丙)世界的生產過剩及其打擊。

(五)其他日本產業撞壁的原因。

(甲)遊食侈奢的寄生蟲階級的增大。

(乙)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的機能的退化。

(丙)資本家自身的腐化，墮落及無能。

(C)階級關係的對立的急劇化(參看本編第三章)

(一)勞動者對資本家的關係的急激化。

(二)佃戶對地主關係的急激化。

(三)農業對商工業關係的急激化。

歐戰後日本經濟的「大不景氣」，即不外以上在(A)(B)(C)中所列舉的諸原因起了交錯的作用的結果。且此不景氣又不能被「次期的景氣」之「來潮」所救，反而更益深刻永續起來的原因，實基因於(A)之整理之失策及(B)(C)各要因的更形深刻化。

第二節 日本經濟發展撞壁的三斷面

列舉於第一節中的(A)(B)(C)諸事情的詳情，當於後面第二及第三章中詳述。那麼日本的產業因了此等諸事情，尤如(B)(C)的原因的互為因果，究竟陷入了怎樣的窮狀呢？其綜合的結果可由次述三斷面窺知。

(一)粗工業及礦業發展的撞壁。

(二)精工業的國外發展的困難。

(三)農村經濟的撞壁。

(A)粗工業及礦業發展的撞壁

原來自明治維新以來以至明治末年前後的日本產業的得能成就了可驚的長足的發達的特殊原

因，正如上面已述到的，可歸納之左列三點。

(一)歐美費了巨大的犧牲及數世紀之時日才發明研磨成就的近代科學及技術，日本得天之惠，能原原本本把它移植摹倣過來，因之生產力急速地增大了起來。

(二)睡眠於向日的封建社會之下的頗為豐富的資源，因(一)之結果而突然成為了有用的資源。

(三)因明治維新的變革，遊食階級大為減少，結果產業負擔大為減輕。

(四)因(三)及國民生活程度低度的結果，低廉的工銀勞酬者之供給很豐富，在與外國產業的資本主義的競爭上頗為有利。

因此，由明治年間到大正初年的日本產業發達的特色，第一是易於摹倣的產業。第二是能以低廉的工銀與歐美先進國相競爭的產業。而由此種條件發達起來的產業，是差不多完全不需要熟練，祇需要低廉豐富的勞力的粗工業與粗礦業。例如紡織祇有二十支以下的粗紗發達，細紗及棉布業就不發達。又生絲，火柴，織帶，及雜貨等以豐富低廉的勞力為必要的工業，發達頗大，又銅鑄業則均輸出銅塊，其他煤，鐵，硫黃等，也都輸出採掘出來的原料。

可是到了明治末年，一向構成日本經濟的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因的上述四條件，終於失去了效力。第一，關於上述的（一），原來由於摹倣的發達，祇在摹倣這國家較其所視為標本的先進國大大落後的時候，才能充分有效。即由於模倣的發達若到了可以摹倣的都已摹倣遍盡而快將追上先進國的時候，其發達早就宣告停止。此種發達的宣告頓挫的必然給與既已一度成熟的產業以打擊，是不必再說的罷。例如一向構成日本經濟發達的本流的，依藉歐美技術摹倣的生產之發達，以及資源的開發，其能打入資本家的算盤珠的，大體都已開拓殆盡；現在此種經濟發展的餘地，差不多已沒有了。工廠則祇要計劃得到的，大體上輸入移植都已窮盡，已達到了飽和點。有盈餘的希望的鐵道，也已都建設完竣，由此的國力開發的餘地，也很有限了。礦山，煤山，等等，若用現在的技術和組織，也少更上的開發餘地。資本主義先進國的金融機關的摹倣，也已遍盡，欲由此側面使資金的利用法的效率更臻強大的期待，也很有限了。

加之同時一向形成日本經濟力發展之中心財源的礦業「資源」開發增大的傾向，不僅傾向停止，反而資源老衰涸竭，或生產額積極地減少，或生產費需要巨大的犧牲。不過是時水力電氣的開發，自明治末年來漸臻旺盛，於歐戰戰時及戰後，有了顯著的發達，基於上述的資源涸竭的經

濟力衰退，總算得能藉此相殺了若干，但現在呢。（昭和年代）即此水力電氣，欲作更上一層的資本家的開發也需要許多的建設費，故其資源開發，也已受到不少的限制了。

且為日本礦業發達的最有力的武器的勞銀低廉的事實，也因了此等事情而高昂起來，現在殆已失去其為武器的效力了。歐戰以來，尤為顯著。

勞働工銀昂貴的諸原因：——

(一)勞働階級的生活的向上。

(a) 根基於勞働階級的生產能力的提高的。

(b) 因各種勞働需要的增大，起於資本家間的競爭的。

(c) 根基於工會運動及勞資對立關係的激化的。

(二)資本家階的維持費的增大轉嫁於勞働工銀的。

(a) 遊食階級的增大及其維持費的向勞働工銀的轉嫁。

(b) 加之此等遊食階級與資本家階級的生活奢侈化的費用的增高，是用了物價高貴及房金增大的形式，使勞働者支付，轉嫁於勞働工銀中的。

(c) 財政膨脹(其主因為帝國主義的軍事費及資本家保護費)。的結果，便把租稅負擔增大(尤以間接稅為甚)與勞働者生活費的高昂等形式轉嫁於工銀之中。

(b) 為保護資本家的輸入關稅，輸入關稅的增大以及向勞働工銀的轉嫁。

原來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勞働階級的生活程度，確已提高不少。有不少部份的提高，是根基於上述的(一)的(a)，即勞働者的生產能力的提高的，若僅是此，則勞銀任是怎樣高昂，祇會因此而大有貢獻於產業的發展，決不會壓迫其發展的。可是由於其他的原因勞銀高昂，却全是由於日本資本家的產業的發達。如其中根基於(二)的(a)及(b)的，非惟全不能有益於勞働階級的生活向上，——因而也全無使勞働階級的產生能力向上的作用——反徒然助長不生產階級的遊食奢侈的生活；且由於此種原因的勞働工銀的騰貴，無寧比由於其他原因的為多，因而其壓迫日本產業之處。也最大。世人一聽到勞働工銀的騰貴，便易用俗論的常識，就當之是勞働階級的收入增加之意，可是在事實上，則如上所述，其中資本家階級的遊食奢侈的維持費的轉嫁於勞働工銀的部分，頗不在少，這是此地應特別注意的一點。

如上所述，明治維新以來經濟發達的四大特殊原因，至此都消滅了。加之斯時前後日本經濟

的原料品及其他生產費，（勞働工銀以外的）也由底下諸方面受到了暴騰。

(一) 產業保護政策的損失費之轉嫁。

(二) 根基於帝國主義政策的財政膨脹之租稅負擔的激增。

(三) 根基於資本家階級的無能，腐化，墮落的冗費之激增。

因之，日本產業的競爭力，更形衰退。此時後進國如中國的產業，以歐戰為轉機，勃然發達了起來。而後進國產業發達的第一步，和日本一樣，是以粗工業及鑄業為中心的。因此種產業不需要熟練，底要有低廉勞力的豐富的供給，便易於發達成功。

結果，尚在粗工業階段的日本工業，由內外二方面受到壓迫，乃曝露出了此種產業的撞壁，凋落等命運。例如棉紗（尤以二十支以下的粗絲）火柴，織帶，洋傘，肥皂，團扇及扇子等等粗工業的輸出產業大大衰退的原因，便在此。否，不僅是輸出粗工業如此衰退，即國內用的粗工業貨，也常常被中國德國的輸入品所壓迫。例如雨傘，木屐，扇子等的由中國德國輸入，便是一例。此時日本的鑄業，尤如為其大宗的煤，也因上述的內外兩方面的壓迫，陷入了苦境，如日本煤業者為保存餘命起見，運動政府加撫順煤的內地輸入以限制，便是個好例。

粗工業及鑛業，在上述的諸種原因之下，若用向日的方面，無疑已遇到了產業的撞壁及衰落了。那麼一向及現在的資本家用過了什麼謀圖打破此種難關的對付方策呢？

(B) 精工業的國外發展的困難

或因起源於各種原因的勞働工銀的騰貴，或因後進國的產業發達，或因資源的缺乏，等等理由，而自國的產業的第一段發展撞了壁的時候，在成了功的歐美先進國呢，早已求得克服此等不利條件的路途，更進展至第二的經濟發展階段，依然繼續其繁榮。第二段發展型態的主要點，爲(1)由粗工業至精工業的進展，(2)由直接消費品至生產用具工業的進步，(3)帝國主義的發展三者。在日本，正如前述，當產業第一段的發展撞了壁的時候，爲謀克服之法，而進展至第二段的發展型態起見，也已有過不少的努力。

總之，在粗工業因了上節所述的理由而撞了壁的時候，先進國所能開發的進步的血路，不外是決非用工銀底廉的勞働門所能企及的向精工業的發展。因爲若生活於低廉的工銀上，則勞働者的技能的進步大受限制；因而以技術上的多大的技能爲必要的精巧品的生產，便非得是生活程度已在高工銀之下提高了的勞働者不行。日本當各種工業的粗工業漸次撞壁之時，也曾企圖由向更

高一段的精工業進展而打開新局面，已在上編第一章第一節(B)中詳述過了。

那麼日本經濟的向精工業的進展，果真把經濟第一段發展的難關打破了嗎？或有打破的希望嗎？的確。紗紡方面，已在由粗絲進展至細絲了。紗的輸出已在變爲布的輸出了。粗工的棉布，已在進步至印花布等精工棉布了。一向完全依賴舶來品的稍稍高級一些的雜貨，也漸次能在國內製造了。但其大部份，均僅在高率的輸入稅保護之下才有生存力，其具有國外輸出能力的，是極小的一部份。

日本工業愈是精工化，其與先進國的競爭愈是困難。因爲在粗工業時代呢，得能用工銀的低廉爲武器而與先進國競爭，現在呢，比武器的大半已失去了。又從先進國方面說，則先進國自身於精工業中若有了繁榮的把握，是採取把粗工業讓給後進國的方針的，所以在粗工業上與先進國競爭，較爲容易。至於精工業，則目下先進國已不得不佈了背水之陣而堅作死活之競爭至最後了；並且日本自身的競爭力，在精工業中，可說是「初出茅廬」，即僅從技能一點說，和先進國的競爭也十分困難。

不僅此也，在今日的國際關係上，欲作精工業的第二段發展，除國民的優秀的技能之外，如

後所述，尚須有豐富的資源與廣大的銷路，日本對此二條件也付國如。

像日本這種小國，欲其產業作精工業的國外發展，便非得能以較低廉價格供給較他國更優秀製品不可。可是人力之差既極有限，處于今日的交通自由的社會，而各國的進步又相均等的時候，欲如往昔一般地永久獨占較他國遙為優秀的生產技術及生產設備為一國的祕密，已屬不可能，於是今日在進步諸國之間，所謂生產費之差與售價之低廉，大部份是依賴於原料價之高低的。現下雄飛於世界上的先進國，例如英美德，在國內或殖民地均有豐富的資源——如煤，鐵，棉花，羊毛等——的出產。而未有此等資源的天惠的歐戰前的法國意國，雖同稱為世界之強國，其經濟的發展頗為有限。回顧日本自身，則正如前節所述，非僅此種主要資源十分貧乏，連此貧乏的資源，現在已老衰了。例如鐵，差不多沒有。煤雖多少有一些。但與英美相比，價格在一倍以上，且近來也已大為衰微。其他棉花羊毛，完全沒有，化學原料的苛里，鹽，食料等等，均屬不是。由此，則日本的缺少英美德等所演進的自國工業的世界發展的資源的基礎，是毋須加再說明了罷。更，最近美德等國的世界的發展，在於『產業合理化』。但對產業合理化的有效的發展，是以銷路的廣大為前提的，而日本缺此前提，正如後述，我們究不能對此作過大的期待的。向精

工業的發展，當然也有不絕對以原料及必要的產業。昭和二年，在以商工部部長中橋德五郎爲會長的「商工審議會」上也已有高唱過，居物的資源如是貧乏的日本的地位，其將來商工業的發展，應以依藉人的資源爲主；最適合此人的資源的產業，依該會的特別委員大河內正敏子爵之說，爲顏料工業及精密機械的製作。但此種發達，用日本的產業制度，豈能望其實現，加以根本的一大再整理，實屬必要。不僅此也，就算成功有望，此種事業的國外發展，因今日全世界帝國主義獨占的障壁到處矗立，欲與先進國競爭而在國外求銷路，是很困難的事情。

在今日的國際經濟關係下，決不如從前的「自由競爭」時代，祇要有了能較廉價地供給較他國優秀的商品的能力，輸出銷路便得開拓。因爲今日之世界，是所謂帝國主義獨占時代，各國均爲代表自國的資本家保留獨占資源銷路起見，用高率的關稅及其他障壁，使他國商品，尤如他國的精工品的競爭成爲不可能。例如日本出產生絲頗多，故以生絲爲原料的綢絹類的輸出，理應是日本精工業的進展上最有利的。但大主顧的美國，對生絲的輸入雖屬免稅。對於綢絹，則課以百分之五十左右的高率的輸入稅。因此之故，日本的蠶業生產，至今尙祇能輸出原料的生絲，未能以之織成綢絹後再加以輸出。日本的羽二重事業，是因此種理由而衰退了。而此種獨占的關稅政策

的傾向，因歐戰後各國工業以生產能力過剩為主因，其地位日趨困難，故為自國資本家的保護起見，勢必有增無減。

更由另一觀點觀察英美德等雄飛於世界上的歐美先進國的產業發展，則其由第一段發達至第二段的發達，是採取由直接消費品工業進展至生產用具工業的程式的。因直接消費品工業，（一）生產容易，易被各國的競爭所擊襲。並且（二）其需要常受制于消費國的民衆自身的富力，故其銷路的開拓，常被對手國的富力所限制，常不得不走是消極的。可是生產用具工業，則（一）生產不易，各國的競爭困難，且（二）其需要不一定被消費國的富力所限制。例如借未開國家以金錢，使之敷設鐵道，開發礦山，興辦工廠，如是自國的鐵道建設材料，車輛，機械等的銷路，便能因之而擴張。即生產用具工業，祇要資力豐富，則便可貸未開化國家以資金，積極地開拓廣大的銷路。未開化地，也因此而能更形開發繁榮，更增大彼此的生產，以資新銷路的開拓。這是英美德等在歐戰以前所以能用世界的新市場的開拓一法延續其資本主義的大繁榮的根本理由。

正如可由上面明瞭地看到的，日本若欲期望上述的繁榮，則第一就非得有貸與他人的資本的金融力不可。即須具有資本輸出國的資格才好。第二，因今日的生產用具殆全部為鐵加工製品，

故又須具備鐵工業國的資格才行，惟其中如第一的金融力，則祇要自國有了信用，就可採用和德國那麼地一方向英國借入資本，以之再輸出的方法，並不是非自蓄金融力便不行之種類。但第二的鐵工業國的資格，則絕對有自國具備的必要。

欲內具鐵工業國的資格，則正如英美德等國的事實所證明的，就非得具有豐富而低廉的資源如鐵礦及煤的天惠不可，（但有時若煤或鐵的一種特別豐富而低廉的時候，則另一種不妨仰給於輸入；此種僅具一種資源而鐵工業仍能繁榮起來之實例，也頗不少）。可是回顧日本，則鐵鑛及煤兩種資源，都很貧乏，其中如鐵，則若用今日的技術程度，可說已是資源絕無的貧弱狀態；煤雖多少有一些，和英美相較，價值倍昂。長此以往，到底是沒有成為鐵工業國的資格的。的確，以八幡製鐵所為中心，鐵工業在日本也在漸漸成功起來了。但這是在高率的關稅及軍事的立場上的特別保護之下而溫室的地長成起來的，絕不能說已具有以之輸出國外的資格。

所以日本欲如英美德等成功了的先進資本主義國那樣的以生產用具工業為中心而作第一段的經濟的繁榮，即欲期望以資本的輸出與重工業品的輸出為特色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目下不得不說是不可能的。歐戰戰時與戰後，當日本的貨幣資金一時激增的時候，會大大獎勵過資本的對華輸

出，可是此種資本的對華輸出，僅止於對政府放貸的純粹的政治投資，決非能視之爲培植生產用具工業的發展的肥料的資本輸出。其理由要不外因日本根本沒有成爲鐵工業國的資格。

日本的缺乏發展爲生產用具工業國的資格，也即缺乏最近意味上的帝國主義的發展所必需的經濟的重大資格之一之意。這是從來日本的帝國主義的發展常專用武力，從而帝國的發展也不得不先訴於領土的露骨的武力擴張的根本原因。也是和歐美的先進開的最近的帝國主義的發展在表面上常藉金融力與工業力作先驅的開拓，大不相同的根本原因。此根本差異的結果，雖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由此所得的自國的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日本的和英美德的相比，自然不得不大爲渺小了。故從這一點說，日本的近代意味上的帝國主義的發展，實很有限。

原來日本的帝國主義的發展，武力常先於經濟。其非如此便另無期望帝國主義的發展之途，也已說到過了。故一到以資源不足，銷路狹小爲根因，資本主義的發展已如前述地撞了壁，而痛感到了有採用帝國主義發展爲打開策的必要的時候，日本的資本家階級及政府便立即採用武力解決。因爲在以前的產業制度中，除此之外日本產業便無圖國外發展之途。在西伯利亞出兵失敗以前的日本，朝野對於經濟的撞壁的解決策的一線光明的希望，全繫於「優秀的軍隊」之上。故自日

俄戰爭以來，甚至收割了國民的貧苦的錢囊，斷然實行陸軍的大擴張，海軍的「八八艦隊」計劃，也告進行。日本的「帝國主義」，是成爲了世界的威脅。

但當時世界上的未開他國，全部已被「列強」之間「分割」殆盡。當世界的領土既已被列強間分割定盡之時，一強國欲新得領土，便非得再侵略已屬於某強國的，或在其勢力範圍內的領土不可。於是已經領得大殖民地的「列強」，覺到與其從新再作殖民地的再爭奪戰，無寧以完全保證已得殖民地的「現狀維持」爲有利。事實上，自此時起，對於依藉武力的領土侵略的大帝國主義國的輿論，已起一變化。以前，領土的侵略，實是國際上的英雄的偉業。如英國，甚至傲然誇大其能侵略他國至「無日落之國」的程度之「力」。但這些大帝國主義國自認識了以現狀維較爲有利以來，領土的侵略早已被由昔日的英雄的偉業盼爲軍國主義的惡魔，人類和平的仇敵了。我們在日俄戰後，已可認出此種變化的萌芽。德國日本的「軍國主義」的發展的開始大招世人的非難，就始於此時。此種思想的潮流，在一九一四——八年的世界大戰中達其頂點。

總之世界大戰所證明的，是（一）大帝國主義國的任何那一國，都痛感到對於欲破壞「現狀維持」的新侵入者，有作共同戰線的必要，以及（二）此等大帝國主義國，都巧妙地操縱着全世界的

資本主義小國，拉他們加入他們的現狀維持的共同戰線二事。即大帝國主義者由「勢力平均」以及「現狀維持」的必要，保護着小國的獨立與其領土；因之小國乃被置于對於欲破壞「現狀維持」的新侵略者，感到與大帝國主義國相同的威脅，因而不得不與他們立于共同戰線之下的壓迫之下。所以欲破壞「現狀維持」的新侵略者，是被置於非得以世界的大多少國家為敵人不可的地位的。這便是德國在歐戰招得世界的多數國為敵人的理由，也是以德國的強厚軍力尙得到如此慘敗的理由。此種情勢，在日本歷史上，則有自戰國時代以至德川幕府成立之間的實例。即在戰國時代，弱肉強食是天下英雄的快舉，但德川既一度得霸，而努力於「現狀維持」後，任是怎樣的雄藩，若欲征服弱小的隣藩，則若無以天下為敵人的覺悟，到底是辦不到的冒險。

在如此情勢之下，缺少軍需品上最必要的鐵的日本，其武力的新侵略的已無成功的餘地，不必再加多說了。請看啊：歐戰的混亂期中的日本，不是因對華的二十一條要求，膠州灣的占領，西比利亞出兵等，需費億萬的武斷的帝國主義政策的着着實行，一時日本的前途之發展，使軍人抱洋洋其觀之概嗎？但一至歐戰停止，戰時所期望的武斷的帝國主義的發展之夢，不是立刻和泡沫一般地消滅了吗？

是的，歐戰後所開的巴黎和會，華府會議中國關稅會議等一大批結果，要不外是日本武斷的帝國主義的發展的幻滅史。犧牲了巨額的費用和人命，在歐戰時及戰後所得的，所幻想到的利權和領土，實每開一會每吐出一些。以是年為轉期，依藉武斷的帝國主義政策的日本產業之國外發展的希望，已漸漸消滅了。

(C) 農村經濟的撞壁

自中日戰爭以來，日本商工立國政策的色彩大為濃厚，產業的得在此色彩之下成就了長足的發達，已在別處說到過了。而日本經濟在商工業方面如此發展的時候，農村仍能在如下的經濟的變化之下，繼續其農村人口增大的進行與生活的提高。（和商工業的相比，當然是不足道的）。

(一) 農產物的需要增加，(因交通的發達與都會人口的增加) 農產物的販賣價格昂騰。

(二) 農村經濟的工業的部份，被都市奪了去，都會的工廠生產，更形集中。農民則更分業地集中其勞力於少數的農作。農民購入的物資，則托機械生產之福，很是低廉。

(三) 因工礦商業的發達，農村人民均離鄉求較有利的職業，人口乃集中於都市。

可是，一至日本的商工業的發展如上述的撞了壁後，以上諸作用大部份都告消滅，農村反受到

了它們的反逆作用的壓迫。即（一）和往日成反比例，農產物物價轉入下落的傾向。至少實際上賸留於農民手中的代價是這麼的。其中朝鮮及台灣米的壓迫，最可作為代表。（二）政府因欲給商工資本家階級以利益的採算，常藉產業保護政策之名，或財政界負擔偏重於農民，或用提高工業品的物價的方法，直接間接的加重農民的負擔，購入物價乃愈臻昂貴。並且（三）一向不絕地吸收農村人口的商工業的作用停止，每年增加的農村人口的出口閉塞。不僅此也，及至工礦業的發展一度撞了壁，工銀勞作者的人數不僅停止了增加，一時反呈積極減少之勢。其一部份當然成為失業者而留居於都市，其不少部份却「婦農」求生活之途，農村乃益苦於人口的過剩。

加之日本的農村經濟，在其過去的發達過程中，已釀成許多矛盾，深藏着農村衰落的胚源。其主要者可列舉下列三點。

一、向來的耕作中心，耕作單位的農業，早已維持不下去了。

二、在農業不順利的今日，地主所收的佃租實覺太高。甚至今日的耕作業雖早已沒有活養遊食地主的能力，地主尚在農村上占着優越的地位。

三、原來農村經濟。是自昔在自給自足的經濟組織之下發達起來的；可是近來的農村經濟，

也頗帶交換經濟化的性質，因之未免受慣於乘交換經濟的機會圖利的商工業者的不少的搾取。

總之，日本的農業能繼續其耕作單位的經濟以至今日，是很罕見的。其根本原因，可舉（1）佛教的影響，及（2）德川時代課稅僅限於米穀，因之爲政者以增加稅金的收入爲目的，阻止農民去耕作農業以外的副作二項。總之，正如大家所周知的，一向是農用耕作中心，耕作單位的。

可是及至人口依土地的比例而增加起來後，則若欲農業的耕作用支持增加起來的人口，除開懸地質較瘦瘠的，不適於耕種的土地，或更投下許多資本與勞力於舊日的耕地之上，作所謂集約的深耕之外，便無他法。這方法，不必說是耕田每畝的收益在漸漸減少之意。可是農民的生活程度，與世間的進步同時也在增高，尤如在歐戰時及戰後的所謂「大景氣時代」，大有向上。而一度提高了的生活程度，便不易減低；但農民一向的生活程度，和商工民的比起來，實在低得不像；因了歐戰戰時及戰後的景氣的勢力，農村對都會的生活程度才算稍稍回復了均衡。但欲培養既已提高了的生活程度，祇藉最近反有漸漸減少的傾向的耕種農業的收益，是不夠的了。且因農村的人口不善於賣買的關係，好的東西都彼商工業者吸盡，祇留下了一些殘渣在手，因之農村愈

向苦痛之所下墜，在租稅其他公捐，學校經費的負擔，御寺的捐款等等方面，也被強迫着作較商工業者為不利的負擔，農村經濟，結果終於維持不下去了。加之因以前在開懶惡瘠的土地，及歐戰時景氣良好的時代，因往日的農業增加了幾分利益，其納付與地主的地租，也已增高。即農業順利的時候，其地租和他事業一般地增加了起來；但現在農業大不順利，而有減低地租的必要的時代，地主因為同時各種收入也大減，頗難承認。

因此，農村經濟的撞壁，更形深刻起來。且此外日本的農村尚遇到一大難關。那便是日本農村的人口過剩問題。原來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在資本主義方面雖已有了一大發展，其人口的約半數，尚是農民一視農村人口與土地的關係，則耕地過少，自昔農村人口就已過剩。即由耕地關係說，則例如普通有一千個人手就已足夠的時候，往往居有一千二百或一千三百人手，因而各人均未能充分勞動，生活因而困苦。且適合於國外移民的領土，都對日本封鎖，藉移民而解決過剩人口之途，殆已沒有。但以前祇要資本主義能發達，商工礦業便能吸收其過剩人口，尙能不激成農村的人口問題。但現在呢，正如上述，日本的商工礦業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已撞了壁，連此僅有的農村過剩人口的出口也閉塞了。昔日既已惱於過剩人口的日本農村，至此其生活難乃更形加

重。

解決之策，則第一藉武力的國外領土的侵略，已如上述，是不可能的了；在資本主義撲壁的今日。無論國內的或國際的，去今日的資本主義社會之下殆已絕望。所以農村經濟若仍依向來的方向，則必從各方面撲壁；因為已非作根本的再整理不可的了。

第一章 歐戰後的「財界整理」

第一節 「財界整理的必要及其實況」

(A) 歐戰後「財界整理」的必要

歐戰戰時及戰後的企業勃興，不僅在量上作了前所未有的濫興，即在質上，也是以十分「非常」的狀態為基礎的。關於這一點，在本書第二編的第三章中已一般的地記述過了；現更由本章的立場。把其以「財界整理」為必要的主要點概述一下罷。

總之在歐戰戰時及戰時勃興起來的企業，是以當時的「非常」狀態為基礎而建設起來的；是在及至「非常」狀態消滅後，便非得如以「整理」，使之回復至「平常」狀態基礎之下不可的預約之下。這裏所謂「非常」狀態，大致係指底下二點。

(一) 為所謂「戰時事業」。

(二) 以異常高昂的物價爲基礎的事業。

歐戰以後，產業界更由上述二點派生出來，產生了另一需要整理之點，即對於與上述二點連帶起來的不少的損失及收益大減的善後策。即歐戰後的日本產業界，在下列三點上有「財界整理」的必要。

(一) 由戰時事業改爲平時事業的整理。

(二) 由「異常」的物價基礎轉向「平時」物價基礎的事業整理。

(三) 對於隨以上(一)(二)兩項起來的損失及利益減少的整理。

原來上面「需要整理」的三點，是自企業的當初開始時起就預期到的，及至被其必要所迫，日本產業界依理也可不因之狼狽周章。可是在事實上，以上的「需要整理」的三點，却產生了給財界以致命的打擊的結果。這主因，實發源於歐戰時日本政府的根基於正貨過大評價的錯誤的輸出獎勵的過重策。

原來日本政府的苦正貨不足，由來已久。故一至歐戰中因輸出的激增而呈正貨歸入我手的滔滔形勢，當局便以為時機不可再失，竭力獎勵輸出。但及至因歐美諸國的禁止金貨輸出，輸出物

的代價收回之途杜絕，因而釀成了輸出金融困難後，政府更發行了五億二千餘萬圓的臨時國庫債券，自當融通之任，繼續獎勵輸出。（請與瑞典的憂慮到國內物產的缺乏，而禁止金之流出，限制物資的輸出相較一下罷）。

其結果一方招來了物資的一大缺乏，一方被金融資金的狂流所襲，因而物價起異常的暴騰，種下了大正八九年的一大投機熱興的禍根。即日本產業界因了歐戰時被貿易慾所魅惑的政府的無謀的輸出第一主義——也不想到國內物資缺乏，物價暴騰因此會惹起怎樣的事態——受到了物資之大缺乏，金融資金的橫溢，及物價的暴騰三面的攻擊，產生了把「戰後整理」的準備完全忘却了的企業熱的氾濫。歐戰後日本的「財界整理」較歐美大為拙劣的根因之一，可說就在這裏。

因而及至以大正九年三月的反動勃發為轉機而轉入「戰後的整理時代」後，產業的大部份均因之大受激烈的打擊，衰退頗甚，其體力終於陷入了難以支持必要的整理的重態。如後節所述，這是歐戰後的「財界整理」所以彌縫之上重加彌縫的根本事情之一。

但至大正十二年，日本經濟的「財界整理」在表面上已進展至暫告一段落的地方了。這是說，祕藏於內部的損失，計劃，欺瞞等，在表面上總算已能彌縫過去，而進展到已具有期待已久的其

次的景氣之波的狀態了。

可是那年日本經濟界又受到了大正十二年九月的關東大地震的打擊。大正九年反動以來的大病尚未全癒，更遇到了天來奇禍。因而經濟界所受到的損傷，更形加重，病狀逆轉，陷於重患狀態，財界的徹底的整理的必要，乃更形急迫。

(B) 事業整理之實況

隱蔽於歐戰後的日本產業界的所謂「財界整理」的壓迫，正可如上面所述之中看到的，是含有以下列的方法為必要的過渡性質的。

- (一) 解散或減資。
- (二) 減紅或無紅。
- (三) 經營費的節省。

由此，在平時狀態下本無存立之望的事業遂宣告倒潰，其能用事業的縮小或資本的整理等滋補工程而生存下去的，得在減資或減紅等形式上宣告甦生，其祇要能夠有對於損失的填補及收益力減退的適應便可存乏的事業，可用(一)或(二)的手段來維持。事實上，日本經濟界自大正九年

以來。已非大規模地實行前述三項的財界整理不可了。

例如依日本銀行的調查，則自大正九年至十四年之間，銀行公公司的減資和解散的，在已收資本金額中達十九億八千餘萬圓即約二十億圓三巨額。其中減資爲四億七千三百餘萬圓，解散爲十五億一千萬圓，其年額自大正十年起，俱有激增。

但上述的解散額，並非僅是歐戰時及戰後的滑頭公司，因在平時狀態下難於存立而自行消滅者。此外由「合併」、「收買」等十推兒法與他公司合併的，也頗不少；可是在表面上，則是同樣採「解散」之形式的。其全額果達若干，據現在的統計已難於詳知。但至某程度止，是可很粗略地由其企業別而窺知一二的罷。例如運輸業，電氣業的解散，其大部份可說是用合併及買收的方法的。其總額兩者合計約達四億圓。所謂歐戰後「財界整理」之意味上的減資解放全額，自大正九年至十四年之間大致約達十億至十五億圓罷。

其次用「減紅」（即紅利減少）方法的「財界整理」。由金額上看，也達相當巨額。例如依財政部主稅局的調查，到日本各公司的紅利率，由大正七年的一四%三二，八年的一一%六，至十年激減至七%四，十三四年六%左右。約當大正六七年的中數。但此紅利息分配率的低下，其中合

有不少因增資而產生的低下，故上述的紅利率的低下，並非股東的收入減少之意，股東的實際收入，並沒有像表現於紅利率的減少中那麼地減少。因花紅的實額，於大正七年為六億六千萬圓，八年七億一千萬圓，十一，二年仍達六億七千萬圓，十三，四年七億圓。

正如上述，欲明減資，解散，減紅等形式的歐戰後「財界整理」的真相，是有把其表面額加以削除整頓的必要的。但我們也可看到，即使加以削除整頓，「整理」的實行仍不失為相當的大規模的罷。

但在事實上，上面的減資，解散及減紅的金額，和必要的「整理」的金額一比，相差尚頗遠，其不少的部份，尙是用次節所述的彌縫，欺瞞敷衍政策，把最後的「整理」一天一天地遲延下去，結果導事業的全體入了致命的衰退。

此時事業整理獨能比較徹底實行的部份，為上述（三）的『經營費的節省』。例如依行員，勞働者的人數整理（解雇）的各種方法的工銀及薪俸的減低等（參看次章）的大規模的施行。但因了工會的反抗運動，頗受挫折。且訴於如匯價下落的貼膏藥的手段的部份，也復不少。加之董事經理的報酬，和股東的收入的整理，都未免不能充分。

要之，日本產業在歐戰後的「財界整理」，關於勞働者，行員的所得方面，整理尚比較能徹底斷行；可是關於股東董事經理等資本家方面的所得的整理，祇要有彌縫的餘地，就竭力敷愆，迴避徹底的整理，和肺病的漸次併發一般，漸漸導事業的本身入於致命的衰弱。故此時實行減資解散，及減紅的事業的大部份，是屬於沒有彌縫的餘地的事業。

第二節 「財政整理」及其破綻

(A) 「財界整理」的彌縫

歐戰以來——詳言之，大正九年以來，產業界被所謂「財界整理」之必要所迫，可是關於「資本」的方面。則竭力迴避徹底的實行，專念於苟且一時的彌縫策。正如一個病人，一天一天地延長其必要的手術，使身心更形衰弱起來一般，日本的產業體乃一天一天地陷入致命的衰弱。昭和二年春的金融大恐慌，就是曝露出了此彌縫策的撞壁的最後的破綻。

那麼日本的資本家為什麼要續行其如此「無智」已極的彌縫策呢？大致其根本原因，至少可列

(一) 因有資本「整理」的必要的程度太大，若徹底實行起來，事業存續，勢難有望。

(二) 因(一)之理由，若徹底實行資本整理，則必至或使董事失去其地位，或威脅股東的破產。

(三) 在政府的「財界救濟」之美名下，把損失轉嫁於國民而巧妙地頂冒資本的「整理」的運動餘地尙多。

(四) 朝野都堅抱着「彌縫」成功之後，立即能遇到其次的景氣循環，重振旗鼓的期待。

(三) 及(四)的期待，因了過去的經驗，已根深蒂固地生長於經濟界一般。例如在今日的政治關係上，其政治的常易被大資本家的「救濟」所利用，是大正九年春的大反動後陸續所實地教訓給我們的。當高田商會、鈴木商會十五銀行等的難免破綻的內情既已周知之後，竟因了「政府必會出來救濟的罷」的財界一般的期待，——事實的裏面呢，強迫政府如此做的資本家的猛烈運動，常伸長至政黨，貴族院以及政界的權勢家方面——尙能單恃信用而不致倒壞，這是歐戰後日本的財界史所明示的。又關於(四)之期待，則中日俄戰後的反動期中的整理，在彌縫之際便得遇其次的景氣復活，是資本家的誰都很熟知的。

因此之故，以上述的（一）及（二）為原因的，一見十分自暴自棄的彌縫策，在其裏面，也未始完全沒有復活的希望，於是與（三）及（四）的希望，與（一）及（二）的整理不可能狀態互相因果，更使事業界努力于迴避必要的資本整理，竭力去採用彌縫政策。大正九年以來財界所實行的對於「事業整理」的彌縫策，可歸結為下列諸點。

（一）資本家自己採用的彌縫策。

（a）「侵本」紅利分派的續行。

（b）以增資作資金涸竭的補充。

（c）向銀行借款的彌縫策。

（d）由發行公司債的借款的彌縫策。

（二）政府所採用的彌縫策。

（a）政府的物價維持政策。

（b）政府的所謂「救濟」。

（c）匯價吊下的政策。

(d) 由於關稅等等的保護政策。

第一先看(一)之資本家自己採用的彌縫策，則第一，爲對付由於事業收益的大減及物價的直接間接的損失起見，而有作減資，減紅等徹底的整理的必要的時候，或因欲欺瞞社會而虛張信用，或因董事的自己擁護，或聽從大股東的要求，雖然利益全無，尙敷愆得好似有盈利似的，採取了繼續高額紅利分派的手段。因此之故，現金乃更感不足。至此，始初向銀行借款，及至借不到的時候，或作「增資」而募收股銀，或募集公司債，以充「侵本」紅利的資金。即此時的增資或公司債，並非作爲事業資金，而是或調充坐食的「侵本」紅利的資金，或填補過去的損失的。

可是欲繼續此種彌縫策，若公司的內容一旦曝露，即公司的已在瀕死之狀態下被知道後，就誰也不會再來應股銀的繳款，誰也不會再來應公司債的募集了。至此，爲虛示公司的收益力尙不小，基礎尚鞏固起見，便除以高率的紅利欺騙社會外別無他法。又大股東因無力應付繳付股款的要求，也祇得求之於高率的紅利，或甚至以股票爲担保，借款以應之。而既向銀行借了款，則對於銀行的利息的支付，除依賴股本的紅利外別無他法。故紅利若落至對銀行的借款利息以下，大股東便有破產之虞。即大股東的反對紅利的減少，這也是一個理由。因而公司乃更深陷於紅利的

自殺的彌縫之泥沼中。

例如公司的總資本額，依例經過大正九年的反動後，必須發生激減的，但事實上却激增了起來。公司總資本額（除去銀行）在大正八年為一百〇七億，經過了大正九年的反動後的大正十年，却變為一百五十四億八千餘萬圓，至經過大正十二年的大震災，而理應產生資本的激減的大正十三年末，仍反逆激增，達一百七十九億八千萬圓。其主要原因，是根基於已收資本的增大及公司債的大增，至若公積合，則數微不足道。此種資本增大原因之一，當然也有由於計事業的發達的；但其重大原因，則如上所述，在于依理應作減資減紅的整理的，却去作借款，作增資，以彌縫事業的破綻。試一觀大正九年以來事業資本的已收金額，則擴張的較新計設的占了大部份。例如在新設擴張合計的事業的已收資本額中，擴張所占的比率，在大正八年僅為三五%九七，至十一年激增至五七%三〇，十三年六·九%四八。又大正六年至九年的平均比率為四三%七六，大正九年至十四年間的平均比率為五八%。

原來在大正九年以來的已收事業資本中，其屬於擴張的不少部份，可說是含有上述的彌縫的事業整理的性質的。而正如上述，擴張之數，輕新設為大，其總額於大正九年至十四年之間合計

達五十七億六千六百萬圓之巨額。而擴張中屬於股款的繳付的，占一%五九，屬於公司債及借款的占四八%四一。而依藉股款繳付或公司債等的公然的借款的，在彌縫策內尙算是上乘的，其下焉者甚至依藉銀行的借款，形成了所謂銀行的「固定放款」，釀成昭和二年的金融大恐慌等彌縫中的彌縫策的，也達巨額。例如代表此種銀行放貸的銀行的放款，（此外包含于活期透支，貼現票據之中姑不問）在景氣的絕頂期的大正八年，祇有四十九億五千萬圓，至十年便增至六十四億六千餘萬圓，十四年則激增至八年的約二倍，即八十一億一千餘萬圓。以後此和代表當時的財界的商賣額的貼現票據反有減少一事相對比，（例如大正八年的廿七億六千萬圓，至十四年為二十六億五千萬圓），也可窺到日本財界自大正九年以來怎樣地依靠此種借款而彌縫其「事業整理」的狀態了罷。

大正九年以降，一方資本家以「事業整理」的彌補爲事，同時政府也使用各種彌縫政策，直接或間接地助長之。例如自大正九年的反動以來，政府利用了國庫及存款部（大藏省預全部）的資金，採取了阻止物價的下落的方策。本來當物價起恐慌的，不自然的暴落之時而加以調節，不一定定是所謂「彌縫策」。可是日本政府和資本家所幹的，却是想在此種名義之下人爲地阻止物價的。

正常的下落，以減輕資本家眼前的損失。其結果，日本的物價便永久置於遠高於國際水平線之高位，取了輸出不振，輸入超過的經路，使產業的基礎更形薄弱起來。政友會（日本二大政黨之一——譯者）內閣的在「積極政策」之名下使財政膨脹起來，與上面的政策有同一的目的和結果。加之政府在「財界救濟」之名下，濫用國庫及存款部的資金，救濟大資本家，因而更加助長了事業整理的彌縫。例如對於國際汽船，川崎造船，台灣銀行，朝鮮銀行，鈴木商會等等的直接與間接的救濟，為其最顯著者。

至大正十二年的大地震以後，因僅以上的各種彌縫策已感不足，乃在「匯價放任」之名下，使匯兌下落，物價昂貴，採取了於資本家的打算為有利的苟且偷安手段，用以一時減輕「財界整理」的壓迫。但其結果，則使大正十五年以降的匯價回復期中的日本財界更形沈淪於肺病式的不景氣中，產業更形衰淪起來。其中大正十五年後半年的匯價的暴漲，重又給事業界以巨大的打擊，終於釀成了昭和二年金融大恐慌的動因之一。

其他政府又用關稅吊高及其他保護政策，大大助長了事業整理的彌縫，關於這一點，為說明的便利起見，讓至次章再說罷。

(B) 彌縫的財政整理的破綻

如上的資本家及政府的彌縫政策，不必說是不能永久持續的。但他們仍不惜持續其如此彌縫策的根本原因，在於前述於(A)項中的理由，其中最大希望，是希望不久遇到其次的景氣循環的來潮，僥倖遇到再起的幸運。這也是已經說過的。

這時美國雖再三遇到「景氣」之波，日本財界則因了本編第一章中概述的理由，待之又待，終於候不到此景氣之波。因而事業整理的彌縫期間，延長至預期以上，至此，因了發生於彌縫政策的浪費，經濟界的衰弱漸著，終於追到全無辦法之所，產生了昭和二年的金融大恐慌。原來上述的對於事業整理的彌縫策，由次述的二點能使日本的經濟更形衰弱起來。

(一) 依藉「侵本」紅利及其他「坐食」及「賣食」大為風行，導事業入一蹶不振之窮境，消盡一國的富方。

(二) 及至明白了仍用普通的手段已無復活希望，遂半自暴自棄地去作孤注之一擲的投機，以圖挽回，結果更增大其損失。例如鈴木商會就是一個好例。

而上述的彌縫政策破綻的主因，用今日的經濟制度來說，為資金集積於銀行的「固定放款的

「增大」之一窪地，財界乃產生「銀行現金」的缺乏。日本的財界，是自大正十年左右起就遇到此種「破綻」的。例如台灣朝鮮兩銀行，因放款的固定而資金枯渴，乃吸收了數億圓的拆款(Call Loan)，以資維持。此外如市內銀行的奔走於存款的爭奪，如多數銀行的用增資之法以補資金之不足，其甚者甚至身爲銀行而借入高利之款，以救一時：凡此都是上述的事業整理的頗露其破綻的頂點的現象。總之，在大正九年的恐慌以後，利息低下，才是財界的正過，可是日本的利息却反而出現昂貴的反逆現象。久而不能恢復。倒如在景氣最熾烈的大正八年，票據放款的日利最高爲三分五厘，平均爲二分〇九毫，在經過了九年的反動的十年以降十四年之間，反增至最高四分，平均二分六厘的高利。

原來利息所以呈如此變態的原因，爲因上述的彌縫策的結果，一方國內的資金終於用盡調渴，一方銀行、公司等雖均擁有巨大的債權，但缺乏應產業的需要的資金，於是爲了現金的需要，遂不暇問利息之高低，如此重利，乃繼續了下去。

彌縫政策的撞壁，不時在「資金缺乏」之形式上露其破綻。產業公司和銀行，每作一次借款，必增大本利，增加損失，結果連彌縫亦感困難。當時的所謂「財界之徽結」的，就在此。是年更有

大正十五年的匯兌暴騰，給了生絲業及其及輸出入關係業者不少的損失，對斯時早已力弱身衰的銀行及公司的融通力，更給以最後的致命之傷。

至此，熟知此中內情的資本家及政府，乃爲防破綻的威脅於未然起見，把「震災票據善後處置法案」提出於昭和二年春的議會，意欲投二億七百萬圓的救濟資金於財界，在鹽水注射之下開財界整理的第一刀——金解禁斷行。可是當時財界整理彌縫的腐敗太甚，遂以該案的議會審議爲導火線，財界內部的紊亂的一部洩漏於外間，至是年三月，向日已入瀕死狀態的二三流銀行被擠兌而關門；四月甚至連十五銀行及台灣銀行等大銀行也告停業，財界的信用乃一敗塗地。

此次金融大恐慌的爲怎樣的前所未有的猛烈，祇看底下一事也易明白：即政府爲救濟此恐慌起見，先公布了爲財界的最緊急手段的三星期的支付停止(Moratorium)（四月廿三日公布，即日實施）開臨時議會，使之通過（自五月三日起的五日間）

(一)五億圓的「日本銀行特別通融及損失賠償法」。

(二)二億圓的「關於對臺灣的金融機關的資金融通的法律」。

等二案，承認有以此合計七億圓的巨額的「國家救濟」安堵財界的人心的必要。可是在依此大緊急

手段的救濟手段出現以前，銀行的停業約自三月十五日以來已達三十六家，已收資本總計達九千六百八十餘萬圓，存款總計約達七億九千四百萬圓，其大部分是損失，悉歸烏有。其中台灣，十五，近江，村井，中井八十四左右田等一二流的銀行的倒閉，可說是其代表。又在金融大恐慌的經預時，各銀行爲防備起見，都事先準備好了巨大的資金。由日本銀行的紙幣發行額來看，則恐慌前三月十五日以前的發行額，爲十億八九千萬圓左右，資至四月廿五日，膨大至廿六億五千九百萬圓之巨額。即因準備恐慌時的存款提取，產生了約十六億圓的紙幣的必要，因之日本銀行庫中的預備紙幣已悉數取盡，終於爲應急起見，發行了臨時紙幣。

由上所述，則始則醞釀，終於使金融大恐慌，破殼出世的大正九年以來的「事業整理」的彌縫的規模爲如何巨大，可大略窺到其輪廓了罷。不必說，以此金融大恐慌爲轉期，日本財界被大規模的「財界整理」所迫，許多大大小小的銀行、公司、工廠，及商店等，都宣告清理。擔資本家與政府，則到了這種時期尙迴避作徹底的整理，到通過於臨時議會的兩種「特別融通」法中去求彌縫。至此，財界的把日銀及台濱兩特別融通合計約達八億七千九百萬圓的巨額的「救濟」轉嫁於國民的負担，總算告了成功。於是財界整理乃重又以次節所述的金解禁政策爲必要。

歐戰後的經濟界，因戰後的過渡的整理失敗了的結果，日本經濟遂永陷於肺病狀態，體力極度衰弱了起來。歐戰後日本經濟的撞壁的所以出現得如是迅速的理由，除次章所述的根本的撞壁原因之外，上述的偶發的原因也大有功用，也是不難看到的罷。

第三節 汇兌暴落之意義與其整理的犧牲

(A) 汇兌暴落之社會經濟上的意義

自大正九年起至昭和金融恐慌前後的長期間的財界彌縫政策，又在匯兌的暴落的形態下曝露了破綻。原來由上節所述的銀行公司的自殺的「侵本」紅利的橫行，公債增發，日本銀行的放款，(兌換券膨脹)以及財政部存款部資金的漫無限制的貸放等巨億的財界救濟的結果，人民得到了與生產有關的購買力。但它的結果，却是國家的富力的浪費，貿易額內遂出現了巨億的輸入超過，及至達到極點，便產生了匯兌的暴落。換句話說，即大正九年以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用種種敷衍彌補的借款政策，持續其大人超過實際收入的虛浮的經濟；結果，此種敷衍的借款政策遂在巨額的入超乃至匯兌價格暴落的形態上露了破綻。

普通呢，即在金兌換制度既已確立的時候呢，此種敷愆的借款政策的撞壁的破綻，是發生于金融的極度緊迫之形態上的。但日本自大正六年以來，已處於金輸出禁止，即不換紙幣制度之下。因而以上的敷愆借款政策的破綻，並不在兌換制度維持及金融極度的緊迫等形態上被阻止。它所取的道程，是匯兌暴落；上述的敷愆借款政策，因此更覺容易。匯兌價格的現實地開始大暴落，始於關東大地震後的大正十三年。可是即在十三年以前，貿易上已有巨億的輸入超過，（自大正八年至十一年間，累年為十三億四千一百萬圓的輸入超過）即以貿易以外的收入超過來抵消後，大正九年以後仍每年有巨額的支付超過。所以金輸出被禁止後，匯兌當然要暴落的，但當時一半因了政府的出賣在外正貨（大正八年末至十一年的三年間在外正貨實激減了七億二千八百萬圓）！因而匯兌得免過大的暴落。但自大正九年底半年起，日金對美匯價已跌至四十七八圓美金，超過了正貨輸送點，警告國內，匯兌關係已臨危機。可是關東大地震之後，輸入超過突然激增，政府乃加正貨的出售以嚴重的限制。至大正十三年，匯兌一落千丈，暴跌至三十七美金。詳情請看下列的貿易正貨匯兌關係表。

但此匯兌的暴落，後來不久就即回復，自大正十五年起又大為昂騰，自是年九月以後以至昭

和二年的金融恐慌之間，正如表示，大致維持着四十八九圓美金。可是此匯兌的回復，並不是基於貿易的改善的本來的匯兌回復，是因政府或出售在外正貨，或現解國內正貨，或宣布了舊平價金解禁斷行的意志，於金融上及於投機上竭力計謀匯價的回復的結果。但當時財界已極度衰弱，耐不住此種舊平價金解禁的壓迫，遂於昭和二年春的金融恐慌的形態上重露破綻，一向用爲方法來吊上的匯價，重又暴落至四十三四圓美金。且此匯價，尚是政府以在外正貨來支付年額達一億數千萬圓的政府的海外支付額，才得人爲的阻止了再向下轉落的結果。所以大正九年以來的日本經濟的彌縫政策，可說在匯兌暴落的形態中找得了逃走之路。

貿易、正貨、匯價關係表		年次	日本全國(鑿鮮在內)	輸出輸入(超(A))		貿易外經 常收支超過 (△過剩)	AB相減 (△過剩)	總額在外正貨	正貨存額 在外正貨	對美匯價 最高最低
大	正			輸出	輸入					
小	一一一〇九八	百萬丹	三二零	三、〇〇	一、二五	八、五九	一、七〇	一、四三	一、四三	一、四三
計		百萬丹	三三三	三、〇〇	一、一五	八、五九	一、七〇	一、四三	一、四三	一、四三
大	一一一〇九八	百萬丹	一九一	一、一五	一、一五	八、五九	一、七〇	一、四三	一、四三	一、四三
正	一一一〇九八	百萬丹	一九一	一、一五	一、一五	八、五九	一、七〇	一、四三	一、四三	一、四三
年次	大正一一一〇九八	百萬丹	一九一	一、一五	一、一五	八、五九	一、七〇	一、四三	一、四三	一、四三
日本全國(鑿鮮在內)		百萬丹	一九一	一、一五	一、一五	八、五九	一、七〇	一、四三	一、四三	一、四三
輸出		百萬丹	一九一	一、一五	一、一五	八、五九	一、七〇	一、四三	一、四三	一、四三
輸入		百萬丹	一九一	一、一五	一、一五	八、五九	一、七〇	一、四三	一、四三	一、四三
(超(A))		百萬丹	一九一	一、一五	一、一五	八、五九	一、七〇	一、四三	一、四三	一、四三
貿易外經 常收支超過 (△過剩)		百萬丹	一九一	一、一五	一、一五	八、五九	一、七〇	一、四三	一、四三	一、四三
AB相減 (△過剩)		百萬丹	一九一	一、一五	一、一五	八、五九	一、七〇	一、四三	一、四三	一、四三
總額在外正貨		百萬丹	一九一	一、一五	一、一五	八、五九	一、七〇	一、四三	一、四三	一、四三
正貨存額 在外正貨		百萬丹	一九一	一、一五	一、一五	八、五九	一、七〇	一、四三	一、四三	一、四三
對美匯價 最高最低		百萬丹	一九一	一、一五	一、一五	八、五九	一、七〇	一、四三	一、四三	一、四三

昭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計
	一、九七	一、八三	一、七六	三、三〇	三、二九	三、一九	三、一九	三、一九	一、四七
	一、八三	一、七六	三、三〇	三、二九	三、一九	三、一九	三、一九	三、一九	一、四七
	一、七六	三、三〇	三、二九	三、一九	三、一九	三、一九	三、一九	三、一九	一、四七
	三、三〇	三、二九	三、一九	三、一九	三、一九	三、一九	三、一九	三、一九	一、四七
合 小									

〔備考〕

◎大正八年及十一年的差額。非大正十一年及昭和四年之差額。×最高及最低的差額。△至昭和四年三月末止

，爾後無正貨存額之發表。

(B) 金解禁實行的意義及其結果

那麼，一國的經濟若以敷愆借債政策持續其彌縫政策，匯兌爲什麼要暴落呢？匯兌的暴落，又給了該國的經濟怎樣的作用呢？

一國的持續敷愆借款政策，既如上述，和作生產以上的消費是同意之語。更詳言之，即日本的資本主義社會，用借債政策來持續着實收以上的生活。不必說，此種狀態若永續下去，國民經

濟便得破產。防患於未然的道路，祇有一條，即把消費限制至，生產範圍以內的一法。這又有

(一)增大生產，使生產額達消費量以上的積極策，及(二)節省消費，使它省至生產以下的消極策。可是倘若資本家社會無能為力，不能成功的地實施此對策又如何辦呢？是不是資本家社會除破滅之外無他途的呢？在這種時候，資本主義經濟的組織內尙有一條最後的安全之途。這便是匯兌價格的暴落。匯價的暴落，實在由了下次的作用，一方刺戟着生產，一方大大限制着消費。

(一)因匯兌暴落——物價昂貴，國民的消費受強制的激減。

(二)但因了匯兌暴落，輸出得以增進，輸入大被限制，資本家利潤因成得能增大，生產大被促進，

(三)匯兌的暴落，減少各種債權者的所得，地租，房金，稅款，運輸費等亦均減低，結果生產費減低，增大資本家的生產。

日本自大正十三年以來，匯兌價格的暴落，是因了資本家社會無能為力，未能樹立適當的對策，因而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的安全門開放，開始起上面的作用之意。可是資本家社會却又去妨害此資本主義社會的自働調節作用，竭力用了各種人為策去阻止匯價的下落。因之匯價未能下落至

能充分發揮上面的作用的程度，永久地受不景氣的襲擊。可是我並不是說阻止匯兌之下落的努力，全都是妨害資本主義的自衛的調節作用的。不過阻止匯兌價格的下落的正道，除斷然取消財界的救急借款政策外別無他途。不去着手重要的根本策而其他的人爲策來阻止匯價的下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可是日本的資本家社會却從種種理由不願匯價下落至能充分發上述的自衛調節力之點，竭力加以阻止。且無從正道去阻止它的決心，徒用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人爲策來阻止。

因此之故，日本經濟仍是繼續着救急借款政策的彌縫生活，體力更趨衰弱。直至被最後的破綻所威脅後，濱口內閣才斷然實行金解禁（昭和五年一月十一日），以之爲克服它的最有力的手段。因爲此時金解禁的實行，含有如次的政策的強制之意。

(一) 兌換制度的回復。元來在不換紙幣時代，日本銀行的信用，常易被「救濟」所濫用，這是日本經濟的救急保款政策的泉源。但現在依了金解禁的斷然實行，兌換制度復活，上述的濫用，已因正貨準備的鐵柵而成爲不可能的了。

(二) 因兌換制度的復活，一般銀行公司的救急的借款政策，其結果立即成爲正貨流出——通貨縮小——及金融緊急，金融的地強迫其作彌縫政策的拋棄。

作個譬喻說，這猶之對向來祇有一百圓的收入而靠借債政策度著二百圓的生活的人，立即使其借款政策成為不可能，使之縮小其向來無理的膨脹着的生活至實際收入以內的生活。其苦痛當然是很重大的。但日本經濟欲脫離向來的坐食的破滅狀態，則資本家只算是過去的彌縫策的當然的報應，是非得忍受此痛苦不可的。所以金解禁後，日本經濟的痛苦，可說是向更生之路的陣痛。

但濱口內閣的金解禁，其方法却用了所謂舊平價解禁即使國民經濟負了許多的犧牲而偏袒一部份金融資本家的解禁方法。加之更犯了無充分的準備，適於世界的大不景氣襲來的潮流中實行等謬誤。打擊雖是二重三重的激烈，但解禁善後策却為當時的金融的一大疾病所牽制，未能採用為當時的正道的通貨收縮政策，反去訴之於如中央及地方事業的中止或延期等等最能使生產癱瘓的手段。故昭和五年（民國十九年）一月金解禁斷行後的日本經濟界，失業者超過百萬人，農村及中小工商業者極度疲弊，事業股票暴落，財界陷入了如大火後的慘澹的恐慌狀態，前途如何，則當本書執筆之時，前途的預測尚在十分悲觀的情狀之下。（譯者按，本書發行於去年五月）至於關於金解禁後的詳細，便得涉及許多預測，依本書的性質，暫且不講。

第三章 產業發達的撞壁及其第二次整理

第一節 產業的撞壁與資本家的對策

正如第一章所述，日本的經濟發達已撞了壁了。那資本家階級對此大致實行過怎樣的打開策略呢？正如下節所述，他們並不去實行進步的第二次整理，反去訴於下列的反動的彌縫策。

(一) 勞働工銀的減低。

(二) 各種產業保護政策。

欲作工銀的減低，則(a)若公然訴於老老實質減低工銀的方法，非僅爲數有限，且是最拙劣的方法，依用此方法的，在今日工會如此發達的國家，極屬少數。所以時在今日，則(b)依藉利用被革或求職爲難的失業者的生活的威脅，減低其工銀，用以促進一般工銀低下的方法，最能發揮工銀減低的作用。事實上，當一國的產業有作此種減工的必要的時候，常由財界不景氣的作

用，光使失業者充滿於市場，藉達工銀減低的目的。(c)此外，減低工銀的方法之中，尚有極巧妙之致的，外間難於知道其在什麼時候減低了工銀的方法，即並不積極地減少工銀，而長期間地停止工銀的增加的方法，最近年來，日本各地也都在採用此種工銀低減法了。此等工銀減低，都藉口「事業虧損」「掙不到錢」的一事，全無問題地被認為正當，認為迫不得已。但若欲直接痛快地減低工銀，則任其用(a)(b)或(c)的怎樣的手段，至某程度以上，均因勞動階級的反對而未易實行。於是，資本家階級乃覺還是以訴之于不給勞動者以工銀減少的意識，間接地減低工銀，結果引起了「盈餘」「掙錢」等狀態的方法為聰明，此法遂廣被採用。這就是用各種保護政策，人為的捨出利益來。因保護方法的不同，勞動工銀實質上被減低的方法也有不少種類；可是總括一句話，則保護政策云云，是以把勞動者農民等階級的由種種方法取得的利益給與資本家階級，使之成為資本家階級的利益為目的的。試示保護方法及勞動者農民階級擰取的方法的主要者，有下列數種。

- (一) 保護關稅——提高物價，把向勞動者農民擰取來的給與資本家。
- (二) 補助金交付——用各種租稅的形式徵收，以之給與資本家。

(三) 國貨獎勵——利用謬誤的愛國心，高價出售粗劣品，貢獻於資本家。

(四) 租稅的不平等賦課——利用減輕資本家的負擔而重課勞働者農民等無產階級的方法。例如租稅制的重課間接稅，便是。

以上四項，其目的要不外欲減低無產階級的生活程度，增加資本家的利益。本來保護政策最初的作用，是哺育幼稚的產業，圖一國的產業的發達，從而生提高一般國民的生活程度的作用。可是最近日本的保護政策，却並非爲哺育出世未久的幼稚的產業，已墮入了想用保護政策的力量來支持已入老境而存之困難的產業的「資本家救濟」。所以現在保護政策，其原來的作用已停止，已變質爲徒然間接地榨取無產階級而使資本家掙錢的政策了。

計算一國的經濟是否在發展或衰退的標準，在於該國國民大多數的生活程度是否在向上，與該國的人口是否在增加二點。例如說德川末期的經濟已撞壁，就可知道當時的人口增加停止，國民的生活程向下；明治以來日本的經濟的大有發展，可從人口的激增與國民生活程度的提高中估量到。事實上欲一國的產業，作更健實的發展，是以占國民的大多數的生產者無產階級之生活的更形提高，生產能力更形伸張爲必要條件的。可在今日日本經濟的撞壁期內，資本家所到採取

的對策，却不過是欲減低占國民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的生活程度的反動政策。即他們的意思，祇欲日本的經濟的衰退改變一個形態，使之永久深刻下去。可是國民對於此種僅叫無產階級負擔經濟撞壁的壓迫，祇有資本家能安然繼續掙錢的自私自利的經濟政策，當然不會久耐下去的，在這種時候，社會上的常漲起了一種不安的潮流，而發生大眾的反抗運動，是幕末時我們所見聞的。維新的變革，要不外是此種反抗運動的結果。而歐戰後日本勞資關係的對立愈趨激烈的原因，正如後述，也基因於此。

不僅此也，由於以上(一)至(三)的保護政策的彌縫政策，它結了已無社會的存在價值的事業注射了鹽水針，更其助長了當時的資本家的遊食侈奢生活。而支付此種浪費的代價的一半，是藉勞働者的生活費的昂騰，結局在勞働工銀騰貴的形態上還元於產業的負擔的。另一半則轉嫁為各種產業的原料及其他生產費(勞銀以外的)的騰貴，使產業的撞壁更形深刻化起來。這一點，祇要對上述第一章(B)項中的產業撞壁的原因稍加吟味就可容易看到的。

所以向來資本家對於產業發展的撞壁的對付方策，可說常常爲了欲一時的收拾眼前的經濟難局的彌縫政策，一方使勞資關係的對立愈趨激烈，一方使產業的生產費愈形膨脹，產業的撞壁乃

更是根深蒂固。

第二節 「產業合理化」運動的產生及其成績與限度

(A) 「產業合理化」運動的產生及其在改造策上的地位

在昭和五年一月金解禁實行的前後，日本經濟的撞壁愈形深刻化，終於告了燃眉之急。於是爲惟一打開策的「產業合理化」運動，遂由各方高唱了起來。他們看到了歐戰後美國經濟能因此而築起了前所罕有的繁華，德國經濟的能因此而從破滅之深底復興起來的成績，便以爲日本經濟今日之撞壁，也可依此「產業合理化」運動而打開。那麼產業合理化到底是什麼東西呢？依一九二七年國際經濟會議所給與的定義，則產業合理化也者，是「爲減少勞力及原料的浪費至最小限度而思案到的技術及工作的方法。產業合理化，包含勞動的科學的組織，原料，生產品的標準化，工作過程的單純化，及運輸市場搬運制度的改良」。那麼沸騰於日本的所謂「產業合理化」的內容是怎樣的呢？其最能代表一切的，恐怕要算是成立自官民的重要代表的「關於商工審議會產業合理化的特別委員會」（政府勸業事務與該委員會的同管的委員會）的「產業合理化案罷。

諮詢專項（對當時產業發展問題）

諮詢第一號 鑑時局之局勢，為圖我經濟界之恢復，其以企業統制為必要之產業及統制方法如何？

說明——處金解禁後之時局，欲期我經濟界之更生，則對急劇于歐戰中膨脹擴大之產業各部門，有作充分之調查與研究，而加以能堪受現下平時經濟下之國際的經濟競爭之統制之必要；如對同一產業投下過大之資本，如占我國產業上重要之地位之中小工著者同之無節制的競爭，均應特別講究更正之途。如促進各產業間之企業的合同聯合，加中小工業者以適當的統制等，均有緊急處理之必要。由國民經濟之大局，決定以統制為最急務之產業，樹立統制之方法，實所至望。

諮詢第二號 欲期依藉製品的規格統一，單純化，以及其他生產技術，管理經營方法等之改善之能率增進之徹底的實行，其方策如何？

說明——鑑我現下經濟界之情勢，欲期國際貸借之改善，非對各種產業講究減低生產費，廉價供給良善之貨品之途不可。如藉製品的規格統一及單純化而實行單種多產，如謀圖生產技術之提高，經營方法之改善，及販賣方法之合理化等，均有急施之必要；至於方法，各企業內部之既已實行者，果復不少，宜依民間各種團體的協力，更期徹底。

諮詢第三號 於產業合理化之實行上特應設施之產業金融改善之方策如何？

說明——夫產業合理化之方法，欲促進企業之合同聯合，或作機械設備之改善，其有講究必要之金融之途之必要，固無待言，尤如中小工業，其大多數於資力信用均未臻充足，需要尤為急緊。

諮詢第四號 欲期國貨愛用之普及與徹底，其應採之方法如何？

說明——近時隨我產業界之發達，優良之國貨生產加多，從而其使用亦漸臻普及，惟處於金解禁後之難局，欲期我經濟界之進展，使國貨之使用更徹底普及，與防遇輸入品，實屬緊要；故欲期國貨愛用之普及徹底，宜樹立最有效而適切之方法，以期實行。

回答案

- 一、官營事業的民營化。
- 二、企業合同之促進。
- 三、企業聯合及同業者協定之勸獎。
- 四、各企業之能率之增進（規模之標準化與工作之機械化）。
- 五、政府認可事業之統制。

六、試驗研究機關之聯絡統一。

目下在日本甚囂塵上的「產業合理化」的內容，已可由上而大致看到了罷。可是我們若去追究日本經濟所以如今日那樣地撞壁的原因，則可知屬於當面問題的根幹的，實為下述各項；其包含於上述的「產業合理化」中的，不過是原因中的極小一部份罷了。

日本經濟撞壁的根本原因：——

(A) 基於資本主義的腐敗及爛熟的性質之原因；(在日本內部尚有某程度「合理化」的餘地)。

(一) 日本對於生產及統制方法的進步改良，落於美德等國之後，因之受其競爭所壓迫。

即基因於所謂「產業合理化」運動進行的遲鈍者。

(二) 名義上的勞働工銀(不是實質工銀)的暴漲。

(三) 原料品的昂貴。

(a) 基於資源之減退枯渴化的。

(b) 基於經濟政策之「不合理」的。

(四) 產業所負的資本負擔(含地擔負擔)太重。

(五) 根基於金融制度的不合理的產業負擔的增大。

(六) 根基於股份者限公司經營的腐敗紊亂的產業的衰退。

(七) 腐潤獲得方法的腐敗紊亂。

(B) 屬於全世界的原因（僅用日本內部的自己的努力，一時無「合理化」之餘地）。

(一) 後進國，尤如中國印度等國的工業發達與其競爭的壓迫的急激化。

(二) 各國的帝國主義的獨占政策，尤如高率保護關稅政策之急激化。

(三) 新領土發展政策之挫折。

(B) 的原因，暫作別論，其列於(A)項中的七項，性質上是頗有以實行克服它的「合理化政策」的餘地的。是的，若不再去謀圖此七項的「合理化」——這不單單是「產業合理化」，實是日本經濟的全面的合理化之意——則便無打開日本經濟今日的撞壁的希望。可是今日的所謂「產業合理化」運動，却祇想克服上述七大原因中的一項。且這一項，正如後述，在日本現在經濟的撞壁原因中，並非本格的性質的原因，無甯是有附屬的性質的原因。

(B) 產業合理化的成績

日本現在的產業合理化的較美德等國大為落後，因而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大為衰退，形成了今日經濟撞壁的一原因，是誰都承認的。但這却決不是說以前日本資本家的誰都全然無視了「產業合理化」運動。在能合上資本家的打算而在實行可能的範圍之內，就是以前，日本產業的各方面也曾實行過不少的「產業合理化」運動。試一觀日本產業的代表部門中的產業合理化的實績罷。

在日本產業之中，近代工業的代表，是紡織事業，此產業部門中的「產業合理化」運動，特有進步。例如依第一表看，則女工每一人的生產額，在大正十三年上半年為一捆(Bale)四六〔註〕以後漸次增加，自昭和三年上半年起大有增加，至昭和四年下半年，激增至一捆九五。若注意到自此期以降因深夜工的廢止而操業時間的已大為減少，則實際上每小時的能力的增大當在上述以上。現若以大正十三年上半年的女工一人生產能力來生產昭和四年下半年的生產額，廿五萬六千五十九捆的棉紗，則所需女工人數當為十七萬五千餘人。可是因上述的「產業合理化」的結果，實際上當時使用的女工人數，僅為十三萬人，相善的四萬四千人，即約二成五的勞働者，已因產業合理化而節省了。

第一表 紡績工廠能率實績狀

	期別												轉期 鍾末 數量		
	大正十三年上			十四年上			昭和元年			二年下			Rings	Mule	
	期別	產量		期別	產量		期別	產量		期別	產量		內	譯	
															均生產量
															一個月平均每產鍾
															生工數
															男工數
															女工數
															女工一人每萬鍾
															的生產量
															女工數
															人
															人

〔註〕本表依據大日本紡織聯合會的調查作成，次表亦同。Rings或Mule均為織機之名稱。

隨產業合理化來的能率增進的結果，其所能節省勞動者的程度，織布工廠較上述的紗廠表現得更為顯著。因織布的產業機械化的餘地，較為廣大。例如依第二表看，則織機一千架的女工數，由大正十二年的七百九十一人起，以後便陸續減少，昭和二年上半期起示現了急激的減少，至

昭和四年下半期，激減至僅僅五百〇二人。

第二表 織布工廠能率成績表

		期 別										期 末 織 機 數	織 布 量 每 月 平 均	生 每 產 機 量 的	職 工 數	的女 生 產 量 一 人	女 每 千 機 的
大	正	十	三	年	上	同	同	同	同	昭	同						
四	三	二	元	年	年	年	年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充、五八	充、四五	充、四九	充、四七	充、四六	充、四五	充、四四	充、四三	充、四二	充、四一	充、四〇	充、三九	充、三八	充、三七	充、三六	充、三五	充、三四	充、三三
八、五五	八、四五	八、四九	八、四八	八、四七	八、四六	八、四五	八、四四	八、四三	八、四二	八、四一	九、三九	九、三八	九、三七	九、三六	九、三五	九、三四	九、三三
三、〇三	一、九五	一、九四	一、九三	一、九二	一、九一	一、九〇	一、八九	一、八八	一、八七	一、八六	九、二四	九、二三	九、二二	九、二一	九、二〇	九、一九	九、一八
八、五五	八、四五	八、四九	八、四八	八、四七	八、四六	八、四五	八、四四	八、四三	八、四二	八、四一	九、一四	九、一三	九、一二	九、一一	九、一〇	九、九	九、八
四、〇六	四、〇五	四、〇四	四、〇三	四、〇二	四、〇一	四、〇〇	四、〇九	四、〇八	四、〇七	四、〇六	九、〇六	九、〇五	九、〇四	九、〇三	九、〇二	九、〇一	九、〇〇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若叫大正十三年上半期每織機所需的女工人數來作昭和四年下半期的織機數的工作，則理應

需要女工五萬三千九百四十八人。可是因了那時的產業合理化的結果，實際使用女工人數僅為三萬四千三百十三人，相差的一萬九千六百卅六人，即約三成七的失業者，是產業合理化的結果所產生的。

因此種「產業合理化」的結果，紡績事業的生產激增了起來。例如如第一表，則棉紗生產額，由大正十三年上半期的每月平均約十七萬三千捆，至昭和元年上半期為廿二萬七千餘捆，昭和四年下半期達廿五萬六千餘捆。但使用職工人數(男女合計)則以昭和元年上半期的十八萬五千九百卅五人為最高，以後便逐漸減少，至昭和四年下半期為十六萬六千七百廿三人，減少了一萬九千二百十二人。

又織布廠方面，其繼布生產額由大正十三年上半期的每月平均八千六百餘萬碼，至昭和元年上半期增至一億一千一百餘碼，昭和四年下半期顯增至一億三千七百餘萬碼。可是使用職工人數(男女合計)則昭和元年上半期的五萬九千〇十人，至昭和四年下半期便減至四萬二千八百卅七人，減少了一萬六千一百五十七人，即約二成七。

其次，構成日本工業的根幹的部門，是織物業；自大正十年前後起，該業也大大進行了「產

業合理化」例如愛知縣下的織物地方，依當局的調查則織工一人的織機架數，如第三表地增大了起來。

即闊幅力織機的平均中，織工每人的織機數，大正九年為一架九一，以後漸次增加，至昭和二年增至五架二九。和大正九年相比，實已三倍。更以之與九年以前大正五年時的完全入於箇頓狀態的相比，就可看到最近織物界的「產業合理化」進行的速度為如何急烈了罷。

狹幅力織機的進行，和闊幅相比，落後了不少。但每織工的織機數尙由大正九年的五架六三著增至昭和二年的七架六三。大致是五成的增加。

第三表 織工一人的織機架數表

年 次	種 別	闊幅力織機			同上指數	狹幅力織機
		A	B	C		
大正五年	闊幅大號力織機					
六年	A	一臺				
七年	B	一臺				
八年	C	一臺				
九年	平均	一臺				
	A	一臺				
	B	一臺				
	C	一臺				
	平均	一臺				
大正九年	闊幅大號力織機					
同上	A	一臺				
同上	B	一臺				
同上	C	一臺				
同上	平均	一臺				
大正九年	狹幅力織機					
同上指數	A	一臺				
同上指數	B	一臺				
同上指數	C	一臺				
同上指數	平均	一臺				
大正九年	總數	一臺				
大正九年	同上指數	一臺				
大正九年	A	四八九				
大正九年	B	四八七				
大正九年	C	四八七				
大正九年	平均	四八七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三年	一·三	三·四	六·六	六·六	三·五	一·一
						五年	一·五	五·四	八·三	八·三	四·六	
						二年	二·二	三·三	六·三	六·三	三·四	
						三年	三·三	四·四	八·三	八·三	四·五	
						上下	上·上	下·下	上·上	上·上	上·上	

先依足尾銅山的機械掘的普及及其事情來觀察銅鑛業的合理化運動，依著者親自對足尾銅山所調查的，則正如第四表所表明的，大致自大正十二年前後起，機械掘已漸較手掘為有利，至最近則機械採掘遠廉於手掘，同時足尾銅山的開掘，殆已全部以機械掘代替手掘了。

煤界的「產業合理化」的進行，也很顯著。關於此，以由貝島坑社社長貞島太市氏發達於時事新報上的我國煤坑經營之撞壁及合理化一文中引用其技術的改善之疏一節於此，最為明瞭。

『最近數年來開煤，礦內擡柱，運輸，通氣及其他技術上的進步，特為顯著。柱房式已參考礦內的情形，在可能範圍之內，均改為長壁法了。由此，便能集約礦內的坑穴的工作，減少坑道的延長，改良通風，增加煤塊比率，增進礦夫的能率，使坑穴的機械使用成為可能，

使之充分發揮採掘的效力；更利用地壓，以便採掘，增高煤之實收率，緩和地表的被害。尤如土砂灌填法，最為理想的方法，煤的大部份；幾可採掘至定盪為止。尤如於煤之埋藏量貧弱的我國，其母使鑛利棄遺於土中而盡力多量開掘，頗為重要。但這需要巨額的投資，故祇在這一點上，也痛感到大企業或煤鑛合同的必要。其他如免避到工作場去的往復時間及勞力的空費，根柢還為增加勞動時間的代步機關的設備的傾向，也漸臻顯著，若各人所使用的工具，也努力使之適合於工人的體格及體力，煤車的大小容量與人力或牽引力的關係，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採煤技術的研究，頗為盛行。

此等設施的結果，其省節人力，增進每個人的能率，實際上就是增加工作時間，減少疲勞，用以節省時間及勞力之所，實為不少。因之我國鑛夫一人的採炭量，逐年有增加，尤以最近二三年來，增加率頗為顯著。至最近十年間鑛夫一人的每年採煤量的消長，略如次述。

我國煤礦鑛夫的人數，目下和大正八年相比，已減少三分之二，即由卅四萬八千人減至廿三萬五千人，但煤量却有增加，由此可以想見能率增進之成績罷。但以此與澳洲、美國、加拿大等地的鑛夫一人的採煤量相比，則其間尚有天壤之差，我國坑夫每人的能率，僅及他們的四分之一乃至六分之一。惟彼我坑夫內外情形的不同，當然也是有力的原因』。

以上專從技術方面觀察最近日本產業「合理化」的進行狀態一可是其他中於企業聯合等的「產業的統制」方面，其「產業合理化」也已進行至可觀的程度。例如一視目下日本所發達的企業聯合的主要者，也已羅網着下述各種事業。

(a) 鑛業及金屬精煉業

名 稱	卡 推 兒 的 主 要 目 的	創 立 年 次	結 合 公 司
煤礦聯合會	運煤制度	大正十年五月	四五
製鋼懇託會	黃鐵(Pyrites)的共司購買及分配	同十一年十一月	一五
銑鐵共同組合	原料銑鐵信用購買	同十五年七月	六
電氣銅共販所	銅板及黃銅板的價格協定	同十五年十二月	五

關東鋼材販賣組合	圓鋼之共同販賣	昭和二年十二月	三
條鋼分野生產協定會委員會	生產協定	同三年七月	八
製鋼共同購買會	製鋼原料協定及共同購入	同三年九月	
製鋼聯合會	圓鋼之生產協定	同四年四月	
(d)化學工業			
大日本製紙聯合會	印刷紙模造紙之生產限制	△明治十三年	九
共同洋紙股份公司	共同販賣	同三十四年	
曹達漂白粉同業會	原料之運費政策，共同購入	大正七年九月	
漂白聯合會	原料之共同購入，生產調節價格協定，製品融通。	同九年一月	
過磷酸同業會			
酒精協定			
共同柏爾泊公司			
日本水泥聯合會			
同販賣			
生產限制，最低價格協定，共同			
同十三年十月			
一七	一	一	一
一七	一	一	一
一七	一	一	一
同十一年三月			
同十一年八月			
同九			
柏爾泊(Pulp製紙原料)的共同			
販賣			
生產限制，最低價格協定，共同			
同十三年十月			
一七	一	一	一

日本紙板聯合會

輸出獎勵，生產及價格協定

同十四年九月

一六

(c) 纖維工業

明治十五年

六八

大日本紡織聯合會

大正四年十月

一

蠶絲業同業組合中央會

昭和二年

八七(組合)

羊毛工業會

同九年

一

綢紡工業會

昭和二年

二

人造絲販賣協定

同三年七月

五

(d) 食料品工業

糖業聯合會

明治四三年十月

一

製粉聯合會

大正三年

七

罐頭蟹木產組合聯合會

同十三年五月

三(組合)

造冰共賣組合

同十五年三月

二一

罐頭蟹共同販賣公司

昭和二年

二

麥酒販賣協定

市價協定

同四年二月

四

(e) 金融業

國債 *Syndicate* 銀行

國債的共同承銷

★歐戰中

票據交易所組合

存款利息協定等

★大正七年十月 四七

【備考】△大日本製紙聯合會於明治十三年創立，當時作價格協定，後變為營利團體；歐戰後重又無營卡推兒活動。

★起源都很古，國債共同承銷，發源於中日戰爭當時，存款協定，發源於日俄戰爭之前。但其基礎之確立，

大改在歐戰當時。

如上的卡推兒更由卡推兒內部的一部份實力公司（大部份在大財閥的支配之下）支配一切。例如銀行界的協定等，由三井的池田，三差的串田執其牛耳，水泥卡推兒被淺野及三井財閥所支配，製紙卡推兒則由三井的王子富士二家握其主權。漂白粉過磷酸卡推兒，也經大日本人肥之手，由澤瀧糾的大川田中執其牛耳。又白糖卡推兒被三井，三菱藤山之手占了全生產的十分之六餘。其他各鑄業，差不多悉被三井、三堺住友、久原等少數財閥獨占去，因而卡推兒的也握於是等財閥之手，是狠明瞭的。又電氣銅卡推兒，則由古河與久原，鋼材卡推兒由淺野、濱澤所支配。

最近此等卡推兒的發展至更高度的共同販賣組合的結成的，也示增多的傾向。例如常盤無煙煤的共同販賣公司組織及有煙煤的共販計劃，肥料界的煤窯素的共同販賣，硫安的販賣協調，鐵鋼界中則以關東鋼材販賣組合為基礎的全國的共販組合計劃，製糖界內白糖供給組合的改造計劃，水泥界的全國的共販計劃，以及日清日本兩製粉公司間的共同販賣組合便是，今後製紙界的統一，也目前期事耳。

日本產業的統制，又因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川崎等大財閥的把各種產業悉數統率於其翼下，是大規模地行於一種康希倫式（Konzern）[註]統制之下的。

[註] 是產業統制的一種方法。是綜合費沙（E. S. F.）托辣斯卡推兒等等的複雜的統制方法。日本的康凡倫式統制情形，高橋氏於日本財閥的解剖一書中（中央公論社出版）述之甚詳，讀者如諳日文，可作參攷——譯者

（o）規格統一運動及其成績

「產業合理化」除以上的工作機械化，產業的統制化之外，尚有製品的標準化的重大之一面。由此製品的標準化，大量生產才能最有效果的成功。此標準化運動，在日本亦自早就實行，但其對象，大致限於生產用具，即世人所知的「產業規格統一」。日本規格統一運動的嚆矢，是明治三

十八年官廳購入的「波爾蘭水泥」試驗法的統一。其次明治四十五年日本電氣工藝委員會加入設立於明治四十一年的萬國聯合電氣工藝委員會，創立了電氣機械器具的名稱，格位等統一事業，定下了各種規準。其中被日本的官民所採用的，頗不在少。其後於大正二年的自來水協議會上統一了水道鐵管的標準詳細說明書。此規準格（位），是現今主要都市的自來水所採用的。

大正五年，製鐵業調查會應農商總長之詢問，作成了關於鋼質及銅材尺寸的標準規格案。

其次，大正七年，於遞信部主管之下作關於標準船型的調查，公佈其成案。是年又依工學會的發起，設日本礦業會等十三學會的聯合工業調查會，調查關於工業用材料並機械類的規準的事項。政府於大正八年六月廿四日設立度量衡及工業品規格統一調查會審議的結果，度量衡統一於「米突」法，關於工業品的規格，則認有別設常設的調查機關而作審議的必要。此調查會於大正九年度未廢止，於大正十年四月二十五日新設工業品規格統一調查會。

此調查會至昭和四年十二月止共開八屆大會，審議及決定了各種標準規格。

那麼此調查會的標準規格的決定，實際上見於實施的有那幾種呢？依昭和四年十月政府調查的結果，有如下述。（據昭和五年四月發行之內外調查資料）

昭和四年十月，調查會通知各方面，調查標準規格的實施狀況，獎接到通知的，為各部，各府縣，六大都市，主要的關係工廠約一百七十處。大部份均有回答。從回答中所得到的結果，頗為複雜，惟尙未能作詳細的數字的歸結；現僅示由使用方面及工業品的種類所看到的狀況之大要如左。

實施最完全的方面，是事業官廳，海、陸軍，鐵道，遞信，內務各部，及製鐵所等，其既已實施，或在實施的準備中的規格甚多，其他的官廳，則因規格品的使用額尙少，且向有購買普通的市場品的慣例，與市場上規格品的販賣亦甚少等理由，未曾使用者頗多。

六大都市，已相當使用規格品了；少數的府縣，頗努力於規格之實施，有十府縣則用告示等法公告管下，獎勵實施。可是一般的地方廳則自己購買使用規格品的尙不多。

民間工廠方面，規格品製造及使用的成績最佳的，為製造官廳用品的大工廠；至於製造普通市場品的工廠，則因第一規格品的推銷尙未能暢行，第二開始製造規格品時型子，工具等設備需要巨大的費用兩理由，大致未曾開始規格品的製造。

可是在大體上，則最近實施的進步顯著，與米突式度量衡之普及相依恃，其逐年在接近新

規格的統一期的傾向頗鮮明。

其次是述由品種中看到的實施狀況：成績最良好的，也是由官廳作大量的購買的品種；其由多數的小工廠所製造供一般民間的使用的品種，有實施遲鈍的傾向；又關於如試驗法，分柝法等品質，性能的規格，實施較易；關於形狀尺寸的規格，因普通尚未與米突法統一的關係，普及困難。

其次規格未能普及的主要緣由，略如下述。

一、商工部告示後，各部的部令及規程均需要改正。因規格未能照樣適用於部令及其他規則，有適當地加除及修正關係法規中的當該事項的必要，故規定的改正，需要不少的時日。（例如造船規程）

二、因度量衡尚未改爲米突法，實行乃告遲緩。——依理，自昭和九年七月一日起便應統一於米突法的度量衡的實施，有的地方雖已有準備，有的地方則未有準備，其未有準備的，就難于實行用米突法的規格。

三、定貨單在設計書及說明書中多有未曾明示規格者。——除去鋼鐵及其他金屬材料，水

泥，機械類等之外，需要者在定貨時多有不明示規格，未熟於不向是否標準規格，均應明示整然的規格的習慣者。

四、規格之逼合於市場品者頗少。——需要者並不努力去定造規格品，一方製造販賣者也不努力於製造規格品，以擴充銷路，因之市場仍各自出售向目的各式各樣不同有商品，未易達能購得規格品之域，且也不知那一個工廠能接收規格品的定貨。

此外，由各府縣，各組合之力而商品得以單純化了的，頗不在少。試示其實施於東京及大阪府下的，當如下表。（昭和五年四月發行的內外調查資料第二七頁——二八頁）

一、實施於東京府下的。

在東京府檢度課主宰之下，由府下各該組合協議之後而實施的商品單純化的種類如左。

種 類 改 定 前 改 定 後	糖 菓 業	裝盛的容量各不相同	限定五啓羅以下十二種	大正十五年
制 麵 業	一 筒的重量有十種	限定二種	昭和二年一月	同三年一月
顏 料 及 工 業 藥	容器包裝的裝盛重量都不相同	限定二百啓羅以下六種		

白米
米袋的種類各不相同

限定十五啓羅，三十啓羅及
六十啓羅三種。同三年七月

酒類
運送容器的種類各不相同

限定二一及半「立」(litre)三種 同四年七月

二、實施於大阪府下的。

在大阪府工務課主宰之下，由府下各該組合協議之後而實施的種類如左。

棉織物經絲數。

洋傘骨的尺寸。

油漆的容量。

絨氈的尺寸。

亞鉛板的式樣。

皮鞋的大小。

三、在中央度量衡檢定所指導之下，依該業的組合的代表的協議而實行的。
既已決定的。

西服領頭及襯衫的大小。

在協議中的。

手套，皮褲帶，面服吊帶，小孩用衣服及其他。(目下教育部在蒐集參考資料中)

由上我們已可不難看出製品的標準化，及商品的單純化，已實施至相當的程度了罷。

(D)「產業合理化」的限度與全面的第二次經濟整理的必要

雖是粗略，所謂「產業合理化」運動在日本也已進行至相當程度的大略，由上已可容易看到了。那麼最近日本「產業合理化」的必要重又被高唱起來的理由又是什麼呢？大致有三個理由，第一，上面所述的產生於日本的「產業合理化」，可說是自然的發生，是十分部份的，若更用某程度的政治的援助和強制，則「產業合理化」的餘地，無論是外延的或內容的，都尚存有某程度的餘裕。第二，上述日本所實行的「產業合理化」，和美德等國成了功的「產業合理化」相比，其拙劣非可同日而語。第三，日本經濟的撞壁，雖有以上的產業合理化，仍日甚一日，於是便不得不找到像美德那種的較廣汎的，輕高度的產業合理化中去求打開之策。

在今日而提唱第一意義的產業合理化，且作別論；若日本現在也欲期待第二意味的產業合理化，則真是一個完全無視了日本經濟的客觀的事情的空想。但我們却看到，最近日本產業合理化運動的第二意味上的色彩已很濃厚了。

欲產業合理化成功至美國及德國那樣的內容與程度，而舉效果，則非有能消化巨大的大量生產的銷路，與以極度的機械化為有利的經濟事情的存在，是無用的。可是在日本，則因了次述的事由，兩者的範圍都大受限制着。

(A) 日本大量生產的餘地十分有限。

(一) 國內市場及植民地市場均甚有限。

(二) 各國既均以高率關稅來獨占了國內市場及植民市場，且美國等先進國的大量生產又以「價廉物美」的招牌來作激烈競爭的國際情態之下，國外市場的發展是十分困難而有限的。

(三) 日本產業的正宗，並不像美德英那樣的是「生產用具」產業，而是直接消費用產業，故為確保大銷路，及克服如上的銷路狹少的最有力的手段的「製品標準化」，在日本其應用範圍頗屬有限，因為欲不用法律的強制手段的追訴而僅用產業方法來成功的地使日本人衣食住用品標準化，是天大的難事。此點，祇要一看(1)前項(①)的規格統一及標準化運動的對象差不多全是生產用具，以及(2)向日的闊幅織物使用促進運動雖費了許多的資金與日子仍無可道的效果兩事實，就可明白。

(四) 因以上的情形，現在形成日本產業的根幹的尚是中小工業及農業，是大家所周知的。有此具體的事實為基礎，欲望產業的大規模化和大量生產化是至難的。

(B) 日本產業機械化的範圍狹小。

(一) 因上述(一)的各情形，依藉工廠大規模化的機械應用範圍的擴大餘地，大受限制。

(二) 和美國相比，勞働工銀頗為低廉，所以以機械的利用為有利的圍範，頗受限制，因為工銀若低廉，則與其機械的利用，尚以人力的利用為價廉。

(三) 加之，無論在利息關係上，機械代價上，和美國等先進國相比，日本在機械利用上頗為不利。因為日本利率高，機械代價也很高貴。

(四) 更，日本現在惱着人口的過剩問題。用了機械化而節省許多的勞力後，把過剩的勞力如何處理呢？就此一點，日本的產業機械化已大受限制了。

(C) 產業統制的困難。

(一) 最近以來，日本的產業界中的資本集中與產業獨占化的傾向的漸形顯著，已如上述。可是日本的大部份的基本產業，却仍是由多數的中小產業構成的；故欲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來統制此等產業於卡推兒化，合同化之下，是十二分困難的。

(二) 所以若欲統制中小產業，就得不得資本主義的進展三力，——資本家相互間的自發行

爲——而用法制的方法強制助成之。但其結果，與其說是向資本主義的獨占的進展，無甯帶有大大增加向社會主義的統制走去的色彩的必然性了。

(D) 隨產業合理化俱來的所節省下來勞動者處理的困難。

(一) 日本本來已是人口過剩，已惱着失業問題。若再因產業合理化而使失業者激增起來，社會秩序的維持便將不可能。

果真爲此則日本的所謂產業合理化的效果，真不得不說是很有限的了。這是著者所以不把所謂產業合理化視爲打開日本現在的經濟的難關的本格的政策，而高唱全而的日本經濟的第二次整理與轉換的必要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呢，正如前述，日本的產業雖然已實行了不少的「產業合理化」，而現在尚在繼續其努力，日本經濟的撞壁却依然有增無減。日本經濟的撞壁的根本原因，已如本節(A)項中所述，大略有七個，而所謂產業合理化，僅能克服其一項的原因。加之日本產業合理化的效果的大受限制，也已如上述。故現今欲打開日本經濟的難關，須在產業合理化以外，更以克服前述日本經濟撞壁的七個基本原因的全部爲目的，作全面的日本經濟的第二次整理與轉換。我的所以不惜返覆

高唱此舉的必要，原因就在此，次節所述，即是此點。

(E) 為產業合理化的前提的經濟的全面的第二次整理

日本經濟的全面的第二次整理，實是把「產業合理化」的收獲再加以合理化的必要的手段。為什麼呢？因為欲真為社會的利益確保表記於產業合理化的「禁面」上的社會的效果——依一九二〇年國際經濟會議所決定的產業合理化的定義，這是「為減少勞力及原料的浪費至最少限度而思案出來的技術及工作的方法——，就非得在普通的「產業合理化」之前，生作各種日本的資本主義的合理化不可。

第一，產業合理化本來的目的，在於欲藉此攝取哺育日本的產業的發達的營養；但若在今日的不合理已達極點的經濟狀態下進行「產業合理化」，則結果產業合理化的收穫非但不能成為產業發達的肉與血，反被不義不正以至今日的董事，大股東等的濫費的填補所惡用；一片苦心的產業合理化，結做了此等不正董事大股東等的食物，肥養他們；事後欲把他們驅除淘汰，就覺困難。結局，「產業合理化」，頗有陷入僅有利於此等不正董事，兇惡大股東的救濟的狀態的危險。

第二，「產業合理化」，正如上述國際經濟會議的定義所明示，僅以「勞力原料的浪費的最小

化」爲目的，關於資本自身的合理的利用，生壁自身的合理的分配等，是全然置之不問的。例如現在日本的經濟，因生產費過高而撞了壁，而生產費過高的原因之一中，則有地租過高，（地主所得的不合理）股東的由於濫招股本的不當利得，以及由實質的保護政策發生的不正當負擔等等。現在若不用此大不景氣的壓力來徹底整理此等不合理已極的生產分配狀態，任其放置下去而專念於產業合理化，則結果僅能用從產業合理化所得之利益，免除如上的不當所得者的整理，支持此等不當所得者的現狀維持；絕對不能成爲培養產業發達的營養分的。

第三，「產業合理化」常在產業統制的名下，結果變爲了以產業的獨占化爲目的。如是，則至資本家的產業獨占化實現三曉，（就算獨占程度是階段的，獨占的作用却能從而發揮其效果）即至自由競爭的調節消滅之曉，物價，品質，工銀及其他勞動條件等的決定，如何調節呢？關於這一點，若不先作資本主義制度（自由競爭的自働調節作用已失去了）自身的合理化，則產業合理化的利益，消費者及勞動者完全未能沾染，反而因了獨占之力，加重對於他們的榨取，陷於結使少數的資本家肥大起來的結果。

總之，欲把產業合理化的「額面價值」放於社會生活之上，則在整理方法上，有先作經營主體

的合理化，生產費內容的合理化，分配的合理化等等範圍廣及資本主義全般的「合理化」的必要。非如此的產業合理化，則其愚猶之對於生回蟲病的病人的健康恢復法，不先去驅除回蟲而結然出重價攝取滋養分。費了巨大的犧牲而攝取的滋養分，却成爲了培養肝腎的衰弱的營養分，非但不能築起健康的回復，反而成爲了使回蟲肥大起來的結果。

最後，單純的「產業合理化」，其自身中又內具着二大矛盾。(一)是失業者的增大，(二)是生產力增大了，購買力却沒有，於是根基於馬克思所謂「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的撞壁的生產過剩，便激化起來。(二)之現象，是今日世界的大不景氣的基本原因。(一)則是今日世界的失業者增大——即在好景氣循環之時仍未能消滅的恆久的失業者——的基本原因。在產業合理化最發達的美國及德國所以失業者和生產的增大併行地激增起來的事實的最爲顯著，就是(一)的結果。而第二點，則在像日本那種本已苦於人口退剩問題的國情之下，問題尤爲重大。欲解決此等問題，也有在單純的產業合理化以外更作日本經濟自身的全面的第二次整理轉換的必要。

第二節 經濟的全面的整理改造

事情已很明白，日本經濟界，現在已轉入若不對向來（大致大正九年以後）的方法加以根本的大整理，已全無辦法的時代了。至於此根本大整理在事實上將取如何進展之途的具體的事實，就非得待諸今後的歷史的發展不可。現當本書將告完終之際，且再把過去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發達的結果遺留下了怎樣的根本的「必須整理」的各點加以概觀，同時預測其整理進行的方面。這，於解過去日本經濟發達的意義之理解上，是必要的。

那麼，日本經濟向日的發達在其過程中遺留下了怎樣的「必須整理」的諸種障礙，又其第二次的整理應向那一方面進行呢？其主要點除去次節所述的階級對立的激急化以外，大致可以歸結至下列七項。

(一)「幕倣」的產業發達的撞壁及其對策。

(二)資源的涸枯及其對策。

(三)產業保護政策的中毒及其對策。

(四)商工立國主義的發展的撞壁及其對策。

(五)遊食奢侈的寄生階級的增大及其對策。

(六)資本家內部的腐化墮落，無能化及其對策。

(七)資本主義組織的機能的頽廢及其對策。

關於最後的(六)(七)兩項，因本書的性質上，姑待別的機再說，以下且把自(一)項至(五)項的大要說一說。

(一)已如第一章第二節(A)項中所概述的，日本經濟向來由於「模倣」的發達，早已達到飽和點了。故打開此種牆壁之道，除向「創造」的產業之發達猛進外別無他路。可是因日本向來的經濟，政治，教育等各制度，是適應摹倣時代而發達起來的結果，故欲計劃創造的產業的發達，不便之點頗多。例如政治教育制度，是劃一的中央集權，這於「摹倣」固然便利，對於須由情形各異的各地各樣以現實為出發點的創造產業的發達，却完全是禁止的制度。又學校教育，是強灌主義，學者研究家的多數，均是翻譯本位等等，也是摹倣時代的遺風，阻止創造之物。在經濟制度中，官民的保護扶助等努力也都集中於先進國既已發達的產業的摹倣移植，創造的研究，頗被輕視。所以欲以創造打開摹倣的牆壁，很無希望。最近在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分野中「日本研究」所以大為風行，蓋是含有由「摹倣」至「創造」的轉換的意味的運動之一表現，值得我們的注意。日

本經濟根本的整理之一，今後恐必向此方面進展的罷。

(三) 日本經濟發展撞壁的第二個根本理由，爲資源的缺乏及枯竭；向來資本家對於此點的對策，爲欲訴諸武力，得到資源，豐富的新領土。可是此種帝國主義的方策在今日已屬實行不可能，已在第一章中說到過了。

但所謂資源的缺乏與枯絕，實在並非是絕對的，是常被當時的政治，經濟組織及技術之如何所左右的相對的問題。例如幕末的日本，由那時的知識看來，的確因資源的缺乏，產業大爲衰微。可是維新革命的結果，而從資本主義制度的組織與技術——雖然都是舶來摹倣之物——觀察的時候，確又存有許多資源，成就了明治大正的一大發展。更觀歐洲的資源，則例如一七〇〇年英國的產鐵額，僅不過一萬三千噸，(歐戰前一千另四千三萬噸)，當時因了爲製鐵的燃料的木炭的原料木材大告缺乏，英國的製鐵業早已撞了壁。可是由一七一三年到一七三〇年之頃，發明了用煤或骨炭(Pump)代替木炭的方法，英國遂又得到了製鐵的大資源。而煤在十八世紀之初，尙未能開掘至水平線以下；水平線以下的煤層的得行成爲歐洲的資源，尙是托了瓦特所發明的蒸氣機關的磅浦(Pump)之福。更亞爾薩斯，洛倫鐵鑄的成爲歐戰前德國的大富源，是因了一八七

八年倍希志克，貝瑞瑪法發明，得能把含磷鐵鑄製鍊成優良鋼的結果，在未發明以前，即豐富的洛倫地方的鐵鑄，也未能成為可道的資源，因此之故，從今日的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及技術說，日本的因資源缺少而產生了產業的衰微，是大家所周知的，可是若從資本主義以上的合理的經營法及技術的發達來說，則並不能說日本一定缺乏資源的。

總之，能利用一國的自然為有用的資源至怎樣程度，大致由二種事實所決定。(一)為科學及技術之如何，(二)為經濟組織之如何。在資本主義之下，大致因了資本家的營利心的追求，此兩方面均頗有發達。但時至今日，至少在現在的日本，此種能依資本家之力使之發達起來的組織與技術的發達，早已告了一大段落(雖偶也有新發明)，此上的發達的已在難於企望的狀態，已如上述。這便是有人說，從資本家的立場看，日本的資源已漸在枯渴起來的理由。

不過我們說在資本家的打算上已無利用自然為資源的餘地，却不是說本統的經濟的意味上也必如此。原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形成今日的產業經營的中心的，是股份公司制度。而握有公司支配權的股東的大多數，已沒有昔日的個人經營制度中的業主那般地對於事業的百年大計有什麼興味，他們都專念於眼前的紅利的高下，或股禁交易所的股份市價的高下的利得；是依算盤的

如何，朝上是股東，晚上即可拋售股票的全無永久計劃的人們。在資本主義那期的個人經營之時，常有父子兩代，或父子孫三代相承續，費了巨萬的犧牲而苦心發明了一種技術及組織上的改良進步的美談，可是在今日的公司組織制度下，此種爲了須在長年月之後才有成功的希望的——究能成功與否，尙屬不可知——研究和新計劃而費去巨額的金錢等事，是連一裏也意想不到的了。偶有研究，也僅限于能在最近將來得到利益的。

可是從社會進步的見地上說，我們當然不能對此資源的日益衰微下去作袖手傍觀，坐待至其破滅之日。任是作怎樣的努力，付怎樣的犧牲，我們還應謀圖能把自然利用爲新資源的科學及技術的新發見與發明進步。且應得研究的方面，也不是全無頭緒，祇要有相當的資金及歲月，其有成功——但當然不能在一定期間內保證成功——的希望的很不少。例如現在大家說日本鐵的資源貧弱，可是若是砂鐵鑄，則日本所有的何計數億萬噸。它的不能成爲資源的理由，是因爲能有利地精鍊砂鐵的方法尙未發明。其另一原因，爲歐美各國因鐵鑄石頗爲豐富，所以沒有進作精鍊砂鐵的必要；故此種研究，不得不說須全恃未得鐵鑄石之天惠而祇有砂鐵的日本了。又人常說日本無煤油；但日本能利用河川及海流的水電，頗爲豐富，能用輕便的蓄電方法的發明代替煤油。又

日本缺乏爲化學工業的基礎材料的食鹽，可是從學理上言，則用全國到處豐產的石灰來代用它的技術，尚有發達的餘地。其他，煤之缺乏，可用利用河川的水力及滿潮的電力以補之，肥料之不足，可以空中窒素之採取充之，銅鑛之不足，得因由於精鍊技術的進步的貧鑛之利用而免去的罷。其他，若叫專門科學家說起來，則當然尚殘留着不勝枚舉的研究餘地呢。

可是日本所以至今未曾作過此等研究的理由。是因爲一方既需要巨大的費用，而何時成功，却未能確保，合不上資本家的打算。——即依資本家的打算，決不會有投於此種研究的資金的。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件資源探究的大事業，已轉入不能再如從來地去委於資本家的營利心，而非由國民自己（例如國營，公營）來探究不可的時代了。現下理化學研究所不及其他的國營或公立機關發達的必要的漸被社會所承認的傾向，就是此方向轉換的反映。將來日本產業的有藉於此方面的研究之所，一定很大的罷。

(三)維新以來日本產業頗有負於政府各種保護政策之處，已講過了。可是此各種保護政策，結果却不外把必要的費用轉嫁給別的產業，因而保護政策愈大，產業的生產費也因此項負擔而愈增大。其詳細的經路，已如第一章第二節所述。

尤如以歐戰爲界期，各種保護政策由幼稚產業的哺手段變爲了少數大資本家的救濟以來，弊害更形顯著。今日日本產業的生產費所以高昂，從而競爭力的低下的一大原因，就在此。試一視名爲「產業保護」，實則反加重產業一般的負擔的主要政策，有如下列各項。

(1) 高率的保護關稅的實施。

(2) 藉借產業的國外發展及「不正之利益」的維持保護等名義的巨大的軍事費。

(3) 用各種產業獎勵的名義的助金，助成金的支付。

(4) 以國庫日本銀行存款部，及特殊銀行爲根據的各種大規模的資本家救濟。

(5) 由於賦與各種猶占權的資本家保護。

日本產業，現在已呈保護中毒病狀。好像是一個鴉片中毒的病人，戒斷了鴉片，便覺苦痛，但續吸下去，則中毒更大，便身體衰弱而至於死；日本的產業，現在也在若停止了保護，便覺苦痛，可是繼續下去，其中毒愈深，以至產業的衰弱壽終的窮境之中。可是時代却刻刻在逼迫它不能永久這麼放任不去。昭和時代以後日本經濟界的能否恢復病體，全繫於日本產業的能否治愈此保護中毒症。

(四) 土地狹小而人口過多的日本而望與世界之一等國相比肩的繁榮，已非放棄需要廣大的土地而利益薄少的農業立國政策不可了。已非得振興利益厚大的商工業而採之為立國方策不可了。且日本當東西兩洋的交通要道，與東南洋也接近，在原料輸入，製品輸出，以及中間貿易上，居於十分有利的位置。是的，遠東的日本，實占有西洋的英國的地位，正如英國因商工立國政策而招得了繁榮一般，日本也能因商工立國政策而同樣產生繁榮的罷。

此種主張，是席捲着中日日俄戰役後的日本朝野的議論；此等見解，後來竟事實上成爲了左右政府的實際政策的原動力，凡此均在上面反覆說過了。但正如在第一章第二節中所詳述的。日本商工業的國外發展，已撞了壁了。但商工立國的繁榮，無輸出產業的發展便屬不可能。故商工立國政策既一度撞壁，就不單是商工業的衰微的問題。正如上述，日本農村人口，實爲過剩，其出路向來全恃商工業的發展。現在，此出路已閉塞了，因而農村乃更苦於人口過剩。此人口問題，如何解決才好呢？

原來像英國那樣的商工美國，今日也已在商工立國上撞了壁，努力於國內農村的開發。蓋能用商工立國主義而繁榮起來的時代，僅限於未開化國家多數存在，且世界各國的工業發達之間有

巨大的差異之時。各國間工業的發達既一度普及到了現在的程度——且其程度更日在增大——，其已不能恃工業品的輸出而吸甜汁，是當然之事。

所以在商工立國策之下發達起來的日本產業向日的構造，至此當然產生了大整理的必要。那麼應得那一方面進行呢？其實現，當然應待今後的歷史的發展；但次章所述的農村與商工業的利害對立的激化化，（其政治的表現，為農林部獨立了起來與商工部相對立）。可說是最可注意的先驅的現象罷。因為商工立國政策既撞了壁，便非得注全力於如何改造人口過剩的農村經濟不可。以歐戰以後，日本農村改造問題早已在事實上成為了朝野的中心問題之一了。

(五)過去日本產業的發達，增殖了許多遊食奢侈的寄生階級。例如許多的富豪，股東，公債公司債所有者，銀行存款者，名譽董事等，以及地主，屋主等「投資」資本家的增大便是。此等投資資本家的大部份，直接均全不作什麼生產，僅僅因具有資本之故，或在利息外或在紅利，或在地租，房租，或董事賞與等名義上得到不少的收入，依此過着安裕的生活。

為了給與此等階級巨大的收入，結果便不得不由產業來負担此種犧牲。例如千坪（坪為日本土地面積尺度名，每坪合六日平萬尺）。的地租，因社會變遷的結果，（即與地主的勞働全無關係）

係)一年間由一千圓昂騰至一萬圓。地主的收入便增大，生活便奢侈起來，可是地主的遊食奢侈的生活費，却能或變爲房租的昂貴，農作物的昂貴——勞動者生活費的騰貴——勞銀騰貴等而壓迫產業的生產費，或變爲工廠地租的騰昂而減弱產業的競爭力。此種作用，雖有多少的差異，在其他的投資資本家的收入中也能發生。即他們的收入增加，在許多時候都有產業負擔增大之意。而目下此種階級的人數，已大爲增加。

日本的法律，對於此等投資階級的權利的保護，較直接從事生產的人的權利更爲優厚。例如全不從事任何工業的債權者的權利(例如公司債主，銀行的放款)，即使產業破壞死滅，尙受收回債權的法律的保護。全不從事任何農業的地主的權利，被保護得在直接經營農業的佃戶的權利以上。故日本的法律，可說以國家的產業上最必要的直接生產從業者爲犧牲，去優厚地保護遊食的投資資本家。

是的，在從前人力有餘而資本不足的時代，此種制度確也有其存在理由。可是今日產業的發達，已告一段落，今後的發展，已轉入人力較資本更爲重要的時代了。在此種時代而仍續用昔日的投資資本家偏重制度，使產業負荷養殖多數遊食奢侈的寄生階級的重擔，究非所以期望產業之

發展之道。今後日本的產業界，此方面也必有一大整理的風波的襲來的罷。如大正十四年四月以法律第四十九號及五十號所頒佈的地租法及房租法，可說是上述的傾向的已法律化了的現象，又最近佃相法的設定問題，對此點亦已被重視，其他自種農創定法案等，也有此傾向的流貫。

第四節 經濟的撞壁及階級對立的激烈化

當日本經濟尚在發展期內的時代，在過程上雖也已釀成不少的利害衝突的對立關係，但向能防止對立的激烈化。因為各產業若尚在發展之道上，常有利益增大的餘裕，故其對於與日俱增的勞資間分配上的大少之爭議，尚有易於找出妥協點的餘地。

可是既如等一章所述，經濟一度撞了壁後，利害衝突的對立關係，其所爭的已變爲了對於填補產業的損失的犧牲負擔的大小，故妥協的餘地已大減，階級間的對立乃大爲激烈化。此階級對立的激化，破壞了產業間的所謂勞資妥協，因之使向日的產業關係更形惡化：以前的產業發達更形困難起來。因果互相作用，經濟的向來的發展，遂更形撞壁，困難愈加加重起來。歐戰後日本經濟階級對立激烈化的主要斷面，可列舉下列三點。

(A) 勞資關係的激烈化。

(B) 佃戶對地主關係的激烈化。

(C) 農業對商工業的對立關係的激烈化。

即歐戰以來，日本的經濟界已轉入非對此三點加向來的關係以何種根本的第二次整理不可的時代了。

(A) 勞資關係的激烈化

產業若尚在繼續其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時期中，則資本家階級常能提出其巨大的利得的一部份，以之增加勞働者的收入，提高其生活程度，購買其歡心。自由主義的社會改良政策，就這般地在資本主義發展期內開了花。勞働條件的改善，福利設施的普及，養老，疾病失業等保險，等等，便是此時代的收穫物。但至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度撞了壁，斯種社會改良政策早就沒有施設的餘地了。因為資本家為欲收回其所虧蝕的事業「利潤」，——這是資本家的生死關鍵——便不得不藉所謂「事業整理」之名，用一切的手段來強迫勞働條件的低下。故即在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撞了壁之後，勞働工銀就減低，勞働時間就延長，工會運動就受限制。

在日本，當資本主義的發展撞壁之後，資本家階級也爲了給資本主義經濟以再活動的刺戟起見，用各式各樣的手段，加勞働階級的生活以壓迫，減低其生活程度。其詳情已在本章第一節中詳述過了。加之自大正九年日本資本主義的繁榮急轉直下地崩解以來，被解雇，失業，就職難等直接威脅着生活的最高犧牲，大部份是負在勞働階級的雙肩之上的。

以前是提高國民一般的生活的日本資本主義，至此已明瞭地成爲了壓迫及低減占國民的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的生活的兇器。陷入了除此以外在資本主資制度的組織之下，但不能持續其產業的經營的狀態。於是日本勞働階級對於資本主義產業的態度，乃不得不根本的一變。普通化是怎樣的社會制度，若其制度能使國民全般的生活向上，國民便謳歌此制度；一至此制度成爲壓迫及減低國民生活之物後，國民便加以反抗，另去追求較善的制度，這是歷史的法則。即日本現在的資本主義的產業，已因上述各事中而陷入了遇到國民的不定的命運了。這便是以歐戰後爲界期的，以打倒資本主義爲目標的大衆的無產階級運動（工會運動及無產政黨運動）勃興的根本原因。

原來所謂無產階級運動，不一定是因反對資本主義而起來的。否，在資本主義發展期內，其大多數無寧是肯定資本主義的。如在英國有異常的發達的工會運動，便是個好例。即是其主要目

的。在於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儘是地伸長勞働階級的利益。在這種時候，勞資兩方，尙能在資本主義產業的發展一點上找出其共同利害，所以在資本家階級方面，也覺得在勞働者的自覺發達至某程度以上後，還是以承認為此種工會運動的基礎的「團體交涉等」於和勞働者的交涉之時反為有利。肯定資本主義的工會運動，便如此在英國發達了起來。現在美國康伯斯流「謹」的工會運動發達的理由，亦在此。因為現在的美國，尙是一個資本主義在續繼發展的國家。

〔註〕 Samuel Gompers 為美國勞働運動的惟一指導者。

可是一至一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撞上壁後，勞働階級的利益擁護及利益的伸長，因上述的理由，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已屬不可能。以此為轉機，該國的工會運動便進轉至反資本主義的組合。如英國的坑夫工會，便是最顯著的實例之一。日本的勞働運動農民協會運動及其他無產運動在最近所以露其反資本主義運動的頭角的理由，也可用同樣的事情加以說明。

隨反資本主義的勞働運動的勃興，日本產業的資本家的經營及其運營等等，當然更形缺乏圓滑，發展更形困難。其最代表的現象，是罷工的增大。於是在資本家方面，也起了一方設定彈壓的手段，（其代表的手段，是大正十四年的治安維持法）。一方把向日的勞資關係脩改妥協主某

程度的運動。例如協調會的創始，（大正八年）工會法的起草，健康保險法，勞働爭議調停法，工廠法改訂法，鑄夫勞役法，等等勞働法規的實施（大正十五年），爲其主要者，今後日本的經濟界。恐必以勞資關係的修改整理爲中心而起不少的波瀾的罷。它將如何進行，則必待諸昭和以降的歷史發展了。

（B）佃戶對地主關係的激烈化

日本經濟尚在發展期之中，佃戶對地主的關係決不會激化至最後的階級爭鬥的，因爲其中途尚有易於妥協的餘地。例如從地主力面說，則因有以農產物的昂貴爲中心的收入之增加，尚有較易滿足佃戶的要求的餘地。又由佃戶方面說，則雖被地主取去了大部份，尚能得到農業生產中的增大以及農產物昂貴的餘惠。且更受到本編第一章第二節中所述的好影響，加之，即使不如意，也有離去農村而去做工銀勞動者，求較善的生活而流入都市的餘地。因此佃戶對他主的關係，尚不至「惡化」至最後的一點，在中途上成立妥協。

當明治維新以後農業利潤漸漸增大起來的時候，和德川時代的土地兼併禁止政策的取消相因，資本家的投資的餘地得以擴大，耕地的大部份，遂滔滔然盡化爲租田耕地。例如各下表所

示，明治十年，耕地面積共有四百三十一萬町（每町合二、四五〇七英畝），地主數有六百〇三萬六千戶，每戶地主的耕地僅不過七段一畝。〔註〕可是以後經過了如表內所示的變遷，大正十四年，耕地面積雖已增至六百〇六萬七千町，地主數却逆減至四百九十七萬九千戶，約減少五百萬戶。因而地主每戶的耕地面積便增至一町二段二畝。當時土地兼併之盛，可以想見了。

【註】一町合十段，一段合十畝，一畝合十坪。

田地租地化的趨勢表

年 次	耕 地 面 積				戶 耕 地	百 分 比
	自 田 地	租 田 地	計	自 作 一 小 作		
昭和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二五 五四 四年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一六一六一六一六 〇六〇六〇六〇六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〇六〇六〇六〇六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千町 千町 千町 七段	% % %
大正 一二 一二 一二 一二 一二 一二 一二	四三二二四三二二 八二八二八二八二 九二九二九二九二 九二九二九二九二	一六一六一六一六 〇六〇六〇六〇六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〇六〇六〇六〇六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千町 千町 千町 七段	% % %
明治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六二六二六二六二 九二九二九二九二 九二九二九二九二	一六一六一六一六 〇六〇六〇六〇六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〇六〇六〇六〇六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千町 千町 千町 七段	% % %
明治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九一九一九一九 一九一九一九一九 一九一九一九一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九一九一九一九 一九一九一九一九 一九一九一九一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九一九一九一九 一九一九一九一九 一九一九一九一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九一九一九一九 一九一九一九一九 一九一九一九一九	一町 一町 一町 一町	% % %

〔註〕×爲地租改正當時的數字，據大藏省（財政部）地租改正報告書。

明治十六年，各表所示，耕地的六三%二五均是自耕田地，租田地僅不過三六%七五。以後的田地租田地化的傾向頗大，至大正十四年耕地的四五%八三成爲租田地，自由地僅爲五四%一七。即耕地的約半數已化爲租田地了。（此後的比率，又轉減少）。

在此種狀態之下，日本經濟的發展既撞了壁，農村經濟也大大衰微了起來。（參看本編第一章第二節（C）衰微的打擊，當然佃戶及地主兩者都受到的，但打擊的苦痛最大的，不必說是佃戶了。因日本佃租制度，租費是還米制度，故農產物物價昂貴的利益，全是地主的收入增加。因農產物物價的昂貴，常引起了肥料，工銀及其他農作生產費的騰貴，故佃戶把兩者抵消之後，所得的利益已無幾，而地主則得了「淨賺」。所以因了上述的理由，到了農村衰微的時候，佃戶乃爲免避生活上所受的一大壓迫起見，集中其努力於租費減低運動。誠然，佃戶的生活程度，比從前已提高不少了，但和一般國民的一比，却尚低下不少，要再叫它減低，究非租佃者所能忍受的。而佃戶欲維持生活程度，除要求租費的減低外別無能舉迅速實效之途。而這時使佃戶的內心要求大衆運動化起來的社會的二大條件，却已告成熟。即（一）先進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運動的發展，給與了佃戶對於「勞働的人」的社會的地位的自覺，使之具備了在農民運動勃興上必要的主觀的條

件。(二)地主階級 因此特別的佃租制度之故，已完全由農業自身分離，早已化爲了在農業上全無什麼社會的機能的純然寄生蟲階級，已完全喪失了社會的存在理由。（即使一朝地主階級消滅了，農業也不會受什麼打擊的罷）即欲圖農業之發達，則非犧牲地主的利益而擁護現實從事於農業的佃戶的利益不可的合理化的客觀 件，亦已完成。

欲奪回不勞地主的所得的農民大衆運動，以歐戰後爲轉機，風靡放日本農村之間。歐戰後佃租爭議的全國的勃興，農民協會運動的擴大，以及以與此種運動作對抗^{目的}的地主聯合會運動的出現，佃及戶對於村舍，府縣會農村的加入等等，是其具體的表現。不必說，日本農村內向來的佃戶對地地主的關係，早已難於維持，早已轉入有加以根本的整理的必要的時代了。自大正八九年以來，佃租法創設，成爲了朝野的大問題，十年有名的農商部的小作法案（即佃租法案）草成，後來佃租法的調查研究，是歷代內閣所繼續的。大正十三年的佃租調停法，十五年的自作農創設維持補助的實施等，都不外是佃戶對地主關係的「第二次整理」進行之一表現。

舊日的佃戶對地主的關係，將來必有更根本的再整理的罷。現在由地主及政府之手所試行的中心方法，是想廢止佃租田地而全部改之爲自作地的運動。往日政友會田中內閣時的山本農林

總長，以已設的「自作農創設維持補助規則」爲不足一曾舉全力謀「自作農地法案」的創設。（雖然結果未能實現）又地主力面，也洞察到歐戰以來佃租地的漸漸利息減少的大勢，謀及早出售的傾向頗著。如地主方面有土地國有論的產生，就是代表的自白。而做地主方面的土地出賣策的買主的，也大部份是自作農。這是上表中佃租田至最近有漸減之勢的基因之一。

因了如上的原因，以歐戰後爲界期，耕地的佃租化增大的傾向中絕，反而發生了自耕地增大的傾向。例如依上面的表，地主至大正八年漸減至四百八十四萬五千戶；可是以後漸次增加，至昭和二年達五百萬九千戶。又農田的佃租至大正八年已增至五一%五二的，至十四年復減至五一%二三，至昭和二年減至五一%九七。今後大概此傾向還得繼續的罷。

(C) 農業對商工業的對立關係的激烈化

日本的農村經濟，昔曾因商工業的發展而作了可觀的進展。可是大致以日俄戰爭爲界期，農村反因商工業的發達而得到較大的犧牲，當時「農村疲弊」之聲，已可聽到。這已在第二編中講到過了。及至歐戰以後，更遇到本編第一章第二節所述的經濟的撞壁，農村經濟更感困難。其打開方策，則有佃戶對地主關係的「第二次整理」運動日勃興；這，也在前項(B)中概述過了。

可是前項佃戶對地主關係的「第二次整理」，却不過是打開農村經濟今日的難關的一斷面，雖然是最重要的。因為農村經濟今日撞壁的原因，除此外尚基因於下列各點。

(一) 農村經濟本來是在自給自足經濟之下發達起來的；但自維新以來，發生了顯著的商品經濟化，於是農業者的利益，多為善於營利的商工業者所壟斷。例如以廉價收買農業者的產物而高價出售農業的需要品等便是。

(二) 因了商工立國政策，租稅負擔偏重於農民，而其歲出則大部份消費於商工業者的利益擁護。

(三) 向來的耕作中心，耕作單本位的農業，早已行不過去了。

(1) 殘留為耕作單位農業所不可缺少的「農閑期」內的農民勞力的利用方法的副業，都變為了一工業家所選賸下來的清苦之業，(較有利益的均被工業家所奪去)報酬低薄，已難支持今日的生活。

(2) 農村人口過剩，照例三人已足的地方常住有四人五人。所以有利的工作不足，結果不是忍苦作無利的工作，便是半分閑遊而度窮苦的生活。

至此，農村經濟的打開策，勢必集中於根本的「再整」以上各點的方向。此種努力，結果便成爲尖銳地商工業者的利益的對立。例如欲除去上述（一）與（三）的兩項原因的農村運動，其必與商工業者作對面的衝突，是無庸再作說明的。如立腳於農業者的利益的農林部的「肥料管理案」竟大招代表商工業者的利益的商工部的反對，是個好例。加之即欲除去上述（三）項的原因的農民的努力，正如上述，結果也必激起農業者對商業者的對立。

元來日本農業自在向來的耕作單本位制度上撞了壁，加之受人口過剩問題的苦悶以來，早已在開拓各種血路，以圖打開。其主要方面，可舉下列二點。

一、向來爲農家的副業的養蠶，機織，果實栽培，牧畜等等，現在已有不少的地方視之爲與耕作有同一，或以上的重要性；無寧耕作反而變爲了副業，養蠶，機械，牧畜，果實栽培等變爲了正業的地方續有增加。

二、因之一向對耕作費了過多的集約的勞力的，近來已轉了方向，把費於耕作的勞力節省下來，改投於耕作以外的事業。

（一）的副業在事實上又變爲正業，耕作反下降至副業的地位，祇要一看養蠶旺盛的地力，機

織發達的地方，以及果樹栽培牧畜等進步的地方就可明白；其中最可注目的，是一向因了電力及煤油發動機的普及而被工廠製造打倒了的如機織之類，現在農家又能較工廠製造更為有利地生產了。及至向來被輕視的副業現在反成為了有利的農家の正業後，於是向日在稻耕中作三回四回的刈草的，現在減少至二回或一回；或利用灌溉及打穀機械，節省費於耕作的人力，以之投於新事業。此種傾向及餘地，曰有增大。因為以前農家常苦無利用餘剩的人力之途。因之用了機械而勞力得以節省後，因別無使用之途，遂不得不把它監費於利益薄少的耕作上。現在呢，如上所述，此種難關已被克服，已找到了能支持過剩的農村人口生活的工作了。

許多人的頭腦中，常牢不可破地存着此種念頭：農村無振興工業之望，即使發起了，亦決不能與都市的大規模工業相競爭。但這種念頭，祇在引動工廠的機械的動力限於蒸汽力的時代是對的。因為欲引用蒸汽，就需要蒸汽機罐室，欲利用機罐室發生的動力，除在蒸汽機罐的傍邊設立工場而大規模地引動機械外別無他法。但電力普及的結果，已完全脫離了此種蒸汽機關的束縛了。因為電氣動力，能在必要的時間中，在必要的地方自由地利用所需的電量，向日的能利用動力機械的方法僅限於工場的事實，早已消滅，已什麼地方的農家都能有利的利用它了。向來在利

用蒸汽力的碾米廠所碾的白米，因電力普及的結果，今日都能在小米店的店前各自有利的碾拍了，這是誰都所親眼看到的。同樣，將來織物，繩絲以及其他各種製品，向之已離去了農家的副業而集中於工廠的，必會更由工廠回至農家之手，歸返為電力利用的農家機械工業的罷。以之相耕作農業相配合，按照適我的農閑時期的技術基本便得成立。不必說，到了那種時候，農村必能較今日支持更多的人口，且營較今日更高的生活程度的罷。此種將來有發達的希望的，農村工業，除以上既述的紡織事業外，尚有牧畜，及以牧畜為原料的加工業，如牛油，乾酪，火腿，煉乳，罐頭食物等，果實蔬菜之栽培及以之為原料的加工業等。如鐵工業等在性質上有大規模工業的必要的，不必說是設有發達為農村工業的希望的。

所成上述的為農業對商工業者的利害對立激烈化的一大歷史的界期的，是大正十四年的農林部的獨立罷。因為在農商合為一部的時代，農業的利益常被商工業的所壓迫，因而至歐戰後農村問題重大化起來後，代表農村利益的運動的大部份，都不約而同地高唱農務部的獨立。例如第四十九次議會（大正十二年度）上政友會，政友本黨的「關於農村振興的建議」，大正十三年帝國經濟會議的關於「農村振興方策」的答案，及帝國農會的主張等都是。

及至大正十四年農林部得以獨立後，農業對商工業者的利害對立遂出現於政治之上。例如爲農林部方面的企圖的自作農地法案，肥料管理與專賣案等，均爲商工部方面所反對；同樣屬於商工部的創議的川崎造船所的救濟，及其他商工資本家的救濟計劃，也遭農林部強硬的反對；又地租問題與營業收益稅問題的常成爲政治上的對立，都是好例。向來的偏重商工業的農業對商工業關係，在商工立國政策撞了壁的今日。究已難於維持；今後此方面的整頓，必更進展至有利於農村經濟的改造方向的罷。至於它果將取怎樣的方向，在預卜日本經濟的前途時是值得深甚的注意的。

最近六十年來日本經濟發達史年表

天保九年（一八三八）

汽船初次橫斷大西洋，日本鎖國政策維持更形困難。

嘉永六年（一八五三）

六月美人浦利來浦賀求通商。國內分「攘夷」「開國」兩派，開維新革命之序幕。

安政五年（一八五八）

是年六七月井伊不待勅許，擅與英俄和蘭三國簽訂通商條約。

萬延元年（一八六〇）

三月井伊被刺。自此轉入攘夷派全盛時代。

文久三年（一八六三）

八月有所謂「八月十八日」政變，攘夷黨大敗。

慶應二年（一八六六）

正月 蔭長聯合倒幕盟約成立。

五月，勅許兵庫開港。（即今日之神戶）。

十月對蔭長下倒幕之密勅。翌日將軍慶喜奉奏大政之奉還。

十二月，宣言全國，王政復古。

明治元年（一八六八）

一月，布告「開國」。

四月，發行不換紙幣。

五月，由商法司布告商法大意，允許賣買之自由。

二年（一八六九）

一月撤廢各「關所」，恢復國內文通之自由。

二月，以向日爲幕府，各藩士所獨占之鑄業歸還民間，同時與政府直轄鑄業，示鑄業開發之

模範。

同月，於各通商口岸置通商司。

五，六月，設立爲替會社，（即匯兌公司）。

七月，發行通商司，匯兌公司錢券。

十二月，頒新貨幣法。

三年（一八七〇）

正月，回漕會社（即海運公司）設立，東京橫濱及大阪神戶間開始定期航運。

四月，政府於倫敦募集九厘息國債四百八十九萬圓。

十一月，大阪造幣局竣工，着手新貨幣之鑄造。是年，人力車發明。前橋藩聘請外人，習器械繩絲。

四年（一八七一）

三月，東京大阪間實施官辦郵政。

六月，上海長崎間海底電報開設（由丹麥公司所敷設）。

七月，廢藩置縣制定。

十月，派岩倉等至歐美視察。

十二月，認定武士階級之職業自由。

是年大藏省公布立會法則及公司辯，獎勵「合本組織」（即股份公司的前身）。

五年（一八七二）

六月，富岡織絲廠開業。（生絲器械製絲之模範工廠）。

八月，國立銀行條例發布。同月又確保農民之職業自由。

九月，新橋（東京地名）橫濱間鐵道開通。

十二月，創全國募兵之制。

六年（一八七三）

六月，第一國立銀行創立。（合本組織銀行業之嚆矢）。

同月，政府初次公布預算表。

七月，米麥輸出解禁。

同月，修正地租法。

七年（一八七四）

四月，征治戰役開戰。

五月，神戶大阪間鐵道開通。

此年小野組破產，因之金融緊急，不景氣瀰漫。

九年（一八七六）

八月，撤廢華士族之祿制，交以金祿欠債證屬。

九月，大阪堂島米穀交易所成立。（米穀文易所之嚆矢）。

十二月，郵政貯金實施。此年修正國立銀行條例，與國立銀行以紙幣發行權，製成銀行勃興之氣運。

十一年（一八七八）

五月，股票交易所條例制定。

同月，東京股票支易（股票交易所之嚆矢）創立。

八月，東京商法會議所開設。

九月，金祿公債賣買解禁。

十二月，東京海上保險公司（海上保險業之嚆矢）設立。

十二年（一八七九）

八月，正金銀行紐約分行成立。

十二月，大阪票據交換所創設。（日本票據交換所之嚆矢）。

十三年（一八八〇）

新任財政總長（藏相）松方着手於不換紙幣之整理，棄往日之產業干涉主義，定間接保護（資本家保護）之新方針。

同月，官辦工廠出售方針決定。

公募企業公債一千二百五十萬圓。（公募公債之濫觴）。

十四年（一八八一）

四月，農商務省設立。

五月，東京職工學校創立（最初之工業學校）。

七月，明治生命保險公司創立（人壽保險之嚆矢）。

十月，下廿三年開國會之詔。

十二月，大日本農會創立。

此年由華族之資本，創設日本鐵道會社。

自十一年起開始跌價之紙幣此年達其頂點。

以紙幣整理爲原因之不景氣開始，直續至十九年正月之發現開始。

十五年（一八八二）

五月，大阪紡織公司創立。（近代的大紗廠之嚆矢）。

七月，共同運輸公司設立，謀與三菱汽船公司對抗。

十月，日本銀行設立。

十二月，票據條合公布。

十六年（一八八三）

六月，下命日本銀行，使作國庫金之保管。

十七年（一八八四）

三月，肥前國東小反村與釜山間海底電線開設。

五月，兌換條例發布。

六月，商標條例制定。

十二月，正金銀行倫敦分行開業。

同月，農商務省公刊興業意見。（前田正名編。至中日戰役止之產業政策，悉從此書之方針）

十八年（一八八五）

五月，日本銀行初次發行鈔票。（兌換券）此年末不換紙幣整理大奏厥效。銀紙之差殆已消滅。

九月，三菱公司與共同運輸公司合併，新設日本郵船會社。

十九年（一八八六）

一月，政府紙幣兌現開始。（不換紙幣之整理，至此告終）。

二十年（一八八七）

一月，東京電燈公司初次送電。

三月，所得稅法公布（七月起施行）。

五月，私設鐵道條例公布。

七月，東京火災保險公司創設。（大險業之濫觴）。

十二月，東京票據交換所設立。

（自是年起，社會企業漸次勃興，至廿一、二年而達絕頂）。

三十一年（一八八八）

八月，修正兌換銀行條例，定保證準備發行之限制。（保證準備額七千萬圓）。

十二月，布示時許條例。

三十二年（一八八九）

憲法頒布。

七月，近江湖東線開通，東海道線得告完成。（新橋神戶間）。

同月，土地收用令公布。

二十三年（一八九〇）

三月，商法頒布。

四月，大阪鐵道公司募集公司債廿六萬八千圓。（公司債發行之濫觴）。

五月，保證準備發行條例修正。（增準備發行額至八千五百萬圓）。

六月，紡織聯合會初次實行停機。（一個月）。

七月，鑄業條例公布。（廿五年六月實施）。

八月，銀行條例公布。（廿六年七月實施）。

十一月，第一議會開會。

十二月，東京橫濱間電話開通。

此年，廿年以降之企業熱之反動襲來，政府爲圖財界救危之策，命日銀實施「附帶擔保制度」

(Collateral Security)

二十四年（一八九一）

九月，東京青森間鐵道全通。

二十五年（一八九二）

四月，大阪興信所設立。（興信所之濫觴）。

六月，包裹郵政法制定。（十月實施）。

二十六年（一八九三）

三月，修正商法發佈。

十一月，郵船會社孟買航路開始。（最初之遠洋航路）。

二十七年（一八九四）

七月，中日開戰。（廿八年三月休戰）。

同月，棉紗輸出稅撤廢。

同月，日英通商航海條約簽字。（最初之不平等條約修正）。

二十九年（一八九六）

三月，棉花羊毛輸入稅撤廢。

同月，航海獎勵法發佈。（十月實施）。

六十年來日本經濟發達史

同月，造船獎勵法發佈。

同月，郵船會社歐洲航路開始。

四月，銀行合併法公布。

同月，農工銀行法，及農工銀行補助法公布。

同月，勸業銀行法發佈。

(三十年八月開業)

八月，北美航路開航。

十月，澳洲航路開航。

同月，農商工高等會議創始。

同月，政府對該會作「職工條例」之諮詢。

三十年(一八九七)

二月，八幡製鐵所設立。

三月，關稅定率法，保稅倉庫法制定。(七月實施)。

同月，重要輸出同業會法發佈。

四月，臺灣銀行法發佈（卅二年九月開業）。

同月，遠洋漁業獎勵法，生絲直輸出獎勵法公佈。

十月，金本位制實施。

此年足尾銅山鏽毒事件突發。中日戰後第一次反動襲來。政府簽字于四千三百萬圓內債，
於國外。外資輸入漸盛。

三十一年（一八九八）

六月，樹業銀行第一次債券出售。

七月，民法公佈。

三十二年（一八九九）

三月，保證準備發行額第二次增額（一億二千萬圓）。

同月，商法修正，特許法，意匠法，商標法制定。

四月，肥料取締法公佈。

六月，農會法公佈。

七月，修正條約實施。（因治外法權撤去，商權收回促進，輸入稅全廢）。

九月，票據經紀人業創始，（諸井時三郎）。

三十三年（一九〇〇）

一月，銀行條例修正。

三月，治安警察法發佈。

同月，脩正土地收用法，產業組合法，重要產業組合法，電報法，保險業法公佈。

五月，安部磧雄，片山潛幸德秋水等之社會民主黨成立。

九月，立憲政友會舉行開會式。

三十四年（一九〇一）

五月，山陽本線（神戶下關間）全通。

六月，京釜鐵道會社成立。

（此年以股票暴落為開端，發生戰後第二次反動）

三十五年（一九〇一）

一月，英日同盟成立。

四月，興業銀行創立。

三十七年（一九〇四）

二月，日俄戰役開戰。（卅八年五月休戰）。

四月，煙草專賣法，貯蓄債券法公佈。

三十八年（一九〇五）

一月，遺產稅法，食鹽專賣法公佈。

三月，擔保信託法，鐵道抵押法，工廠抵押法，鑄業抵押法公佈，公司債之發展得以促進。

十二月，南美航路開航。

三十九年（一九〇六）

三月，鐵道國有法，修正關稅定率公佈。

十一月，南滿洲鐵道會社成立，時票應募者旺盛，產生戰後景氣。

四十年（一九〇七）

一月，第一次財政反動襲來。

七月，日韓協約，日俄協約，日俄通商條約，日俄漁業條約簽字。

四十一年（一九〇八）

六月，赤旗事件發生。

四十二年（一九〇九）

八月，產業組合中央會設立認可。

四十三年（一九一〇）

三月，地租等稅法修正。

四月，關稅定率法修正。（四十四年七月施行）。

六月，幸德秋水一派所謂「大逆事件」計劃被發覺。

八月，日韓合併條約成立。

四十四年（一九一一）

三月，電氣事業法公佈。

同月，朝鮮銀行法公佈。

同月，工廠法公佈。（預定四十五年實施，但遲至大正五年方始實施）。

四月，蠶絲業法公佈，（四十五年正月實施）。

五月，中央鐵道全通。

四十五年（一九一二）——大正元年。

七月，巴黎設日法銀行。

大正二年（一九一三）

四月，美國加省議會通過無市民權之外國人土地所有禁止法案。

三年（一九一四）

七月，歐洲大戰開戰，經濟界發生大動搖。

八月，日本對德宣戰。

十一月，青島陷落。

四年（一九一五）

正月，米價調節勅令公佈。（因米價暴跌）。

二月，中國因反對廿一條，各地起排斥日貨運動。此年起戰爭景氣漸勃興。

五年（一九一六）

三月，戰時利得法公佈。

四月，經濟調查會官制公佈。

七月，簡易生命得險法公佈。

九月，工廠法實施。

十一月，船橋無線電局檀香山舊金山間通信開始。

十二月，因德皇提議媾和，市場暴落。

六年（一九一七）

二月，美參加聯軍。

三月，俄國三月革命勃發。

七月，農業倉庫法制定。

同月，製鐵獎勵法公佈。

九月，禁止金幣金塊輸出。

同月，戰時船舶管理令公佈。

十一月，日銀發表擴張附帶擔保制度 (Collateral security) 。

同月，俄國十月革命。

七年（一九一八）

四月，西伯利亞出兵。

同月，因米價之調節，政府作外國米之管理。（米價暴漲）。

八月，富山縣發生米暴動，漸次蔓延至全國。

同月，政府發表收買價格，全國定期米暴跌。

十一月，歐戰休戰成立，市場暴落。

此年以後，勞働爭議頻發於各地。

八年（一九一九）

四月，懇荒助成法公佈。

同月，中國排貨運動再發。

六月，美國金解禁。

十一月，戰後大投機熱高潮。政府限制全國銀行之放貸。

九年（一九二〇）

二月，股票商品暴落，開財界反動之端。

九月，政府提出蠶絲救濟金五千萬圓。

十年（一九二一）

四月，米穀法公布，即日施行。

同月，借地法，借屋法公佈，五月十五日施行。限制土地所有權，創重視使用者之權益之立法之先驅。

同月，貯蓄銀行法公佈。（十一年一日施行）。

八月，農商務省訓令取締小販商之暴利。

十二月，華盛頓會議開會。

十一年（一九二二）

二月，石井定吉破產，米股票市場動搖。

四月，日內瓦經濟會議開會。

同月，日本農民協會結成，農村問題重大化。

同月，託法，信託業法，及健康保險法公佈。

八月，日本經濟聯盟成立。

同月，破產和議法公布。

同月，制定在外正貨，自後不能算入日銀正貨準備之中。（以物價吊下爲動機）

十一月，以日本積善銀行之破產爲端，至十二月止各地銀行均遭擠兌（二十九家）

十二月，社會局，統計局官制公佈。

十二年（一九二三）

三月，中央批廢市場法公佈。

四月，產業組合中央金庫法公佈。

五月，佃租制度調查官制公佈。

九月，關東發生大震火災，甚至施行支付停止。(Moratorium)

十三年（一九二四）

三月，帝國經濟會議官制公佈。

四月，美兩院通過排日法案。

七月，佃租調停法公佈。

八月，奢侈品輸入稅增高實施。

是年匯兌暴落跌至對美卅八圓美金。

十四年（一九二五）

二月，高田商店破產。

三月，普選法案可決。

四月，農林省獨立。

同月，治安維持法公佈。

十五年（一九二六）

三月，勞働農民黨於大阪行結黨式。

同月，商事調停法公佈。

四月，關稅定率修正會公佈。

同月，勞團會議調停法公佈。

十二月，社會民衆黨舉行結黨式。

是年秋季起因金融解禁聲浪頗高，匯兌騰漲，示四十九圓美金，生絲業者損失頗大，釀成次年

春；金融大恐慌。

昭和二年（一九二七）

三月，衆議院通過震災善後處置法案。

四月，發生金融大恐慌，佈告三星期之「支付停止」。